

大英帝国

A Short History
of Britain



【英】杰里米·布莱克 (JEREMY BLACK) 著
王杨 译

3000



战争 | 繁荣 | 变革
大英帝国从巅峰走向黄昏的重要节点

BRITAIN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委员会委员
美国军事史学会“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奖”
获得者杰里米·布莱克
全新视角评估英国历史，细述帝国的崛起与衰落。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3000年

大英帝国

A Short History
of Britain



【英】杰里米·布莱克 (JEREMY BLACK) 著
王杨 译

3000



战争 | 繁荣 | 变革
大英帝国从巅峰走向黄昏的重要节点

BRITAIN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委员会委员
美国军事史学会“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奖”
获得者杰里米·布莱克
全新视角评估英国历史，细述帝国的崛起与衰落。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3000年

版权信息

书名：大英帝国3000年

作者：（英）杰里米·布莱克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1-03-01

ISBN：97875057513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封面](#)

[版权信息](#)

[前言](#)

[第一章 英国史：前世与今生](#)

[第二章 公元1400年之前的历史](#)

[罗马人之前](#)

[罗马不列颠](#)

[公元400—800年](#)

[公元800—1066年](#)

[公元1066—1200年](#)

[13世纪与14世纪](#)

[第三章 帝国崛起：1400—1750年](#)

[对法战争](#)

[15世纪的分裂](#)

宗教改革

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

英国社会

詹姆斯六世及一世时期的英格兰

查理一世与内战

克伦威尔与空位时期

君主复辟时期，1660—1688年

光荣革命

帝国初长成

理念世界

第四章 帝国巅峰：1750—1900年

经济转型

新社会

1750—1815年的政治

改革与王室，1815—1837年

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与社会

[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

[19世纪末期的问题](#)

[民族主义](#)

[第五章 帝国黄昏：1900年至当今](#)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

[两次大战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

[1945年以后的英国社会](#)

[帝国的终结](#)

[英国的政治与经济](#)

[消费与多元文化社会](#)

[第六章 结语](#)

[参考阅读书目](#)

[索引](#)

[读史就读不列颠——《大英帝国3000年》出版后记](#)

前言

作为世界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英国的历史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除此之外，对这段历程不断进行重新审视也有其重要性，这一重要性既来自于当下世界之变幻莫测，也是由于昨日之日虽已不可追，但关于历史的新观点却还在不断涌现。本书写于2013至2014年之间，我一度面临着英国解体的可能性，因为苏格兰可能会在2014年9月通过独立公投，正式脱离英国。无论这种情况是否发生，这都反映了当下世界较之仅仅20年前便已有了很大不同。实际上，使得这次公投成为正式议题的苏格兰议会，是在1997年英国大选工党获胜后得以成立的，1999年这个议会才进行了第一次选举。不过最终，独立公投被选民否决了。

另一方面，我很清楚围绕历史的观点总是在不断变化，不只是因为这种变化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重新审视历史，它也使得作为个体的历史学家需要不断重新评估自己的观点，时时更新、跟进自己的工作。而这种认知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尤其重要：若是不了解过去，我们自然无法理解现在，更无从考虑未来。历史提供并解释了身份认同，而它既是个体性的重要组成，也是社会的黏合剂；与此同时，集体记忆也是公共教育的重要焦点。这是因为，历史既是事件，也是进程：不仅仅只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还包含当下我们如何将这一切联系起来，以及如何理解历史发生变化的原因、方式和结果。这样一

来，通过理解过去，我们便可以把历史看成是一种在时间层面上连绵不断的变化，从而将自己放入其中。

此外，以史为鉴无疑也是为当下提供指导和确证的重要方式。正因如此，英国贵族们才会在1215年起草对约翰王（King John）的要求时，将亨利一世（Henry I）的加冕宪章（1100年）——承诺放弃其前任威廉二世（William II），即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1087—1100年在位）时的所谓滥用权力行为——作为基础。反过来，1215年约翰王（1199—1216年在位）最终接受的《大宪章》（Magna Carta），在17世纪初又成了宪法反对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和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之王室特权的主张及行动基础。它的影响还在继续。坚定的辉格党人士、第十一任诺福克公爵查尔斯（1746—1815），一度打算在自己的封地阿伦德尔城堡建造一个八角形的大礼堂，以纪念《大宪章》颁布600年，纪念“约翰统治时期贵族们所捍卫的自由”。

由此，历史关乎时间，而时间则关乎与之相伴，并随之变化的空间。这种关系通常被简化为结构与结点，或者换个说法，环境与事件。这个二元对立的表述总是无法正确地反映动态变化的复杂性，但作为我们既通过语言表述自己，又受到语言制约这一宿命的产物，它只能勉力而为。

在英国历史中，关键的结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地理性和连贯性。前者显而易见，英国是一个岛国，处于大陆之外，大部分国土都靠近海洋和港口；后者则表现为在英国整个有人类登陆以来的历史中，气候总体上是良性的：雨量充沛，每年的

气温只在有限的一段时间才会降到冰点之下。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可以不受灌溉条件的制约，还可以全年进行航运和捕鱼。此外，英国还拥有丰富的建筑与能源资源，包括方便加工的木材、石材、砖块和煤。

英国历史的结构要素还包括一系列特定社会和政治文化因素孕育出来的产物。这种孕育作用是复杂的，在一定程度上存有争议，尤其是涉及关于所谓气质、可行性，以及民族例外主义和独特性的问题。尽管如此，法律、产权、家庭组成以及政治自由等独特品质及其作用，都对英国社会及政治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对自由的追求也是如此，无论它在实践中有多大的局限性。

这一点在比较的背景下显而易见。许多弊端——姑且不称其为犯罪——都被归咎于英国，尤其是帝国主义和奴隶贸易。但实际上，它们远非英国独有；许多批评是历史性的，体现了在辩论和问题意识上，现代人较过去之人强烈许多。但实际上，就拿这些特殊的问题来讲，英国本身对其政府权威和权力的限制，已经使得英国的帝国主义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尤其——但不仅仅——是在有大量英国人在殖民地定居的情况下。此外，帝国时期的大部分殖民地区，尤其是印度，先前就已经被其他国家统治。因此“帝国主义之毒”并非英国人引入，英国只是接替了其他帝国在某地的角色。此外，尽管英国可耻地成了18世纪可怕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但它在随后奴隶贸易的终结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此，

英国皇家海军还于19世纪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扮演过“海上警察”的角色。

此外，英国还在反对暴政和反侵略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它既抗击了法国贪婪的扩张主义独裁者拿破仑（1799—1815年在位），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抵抗了德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期间，英国及其联邦成员为捍卫自由不受纳粹主义侵害而贡献的人力与物力，堪称大英帝国历史的一个高潮，同时也是对其的正名，甚至是一种宿命的体现。无论人们如何轻视过去，修正主义如何入侵，我们都应当记住那些个人与社会在重大挑战面前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时刻，团结在一起的人们不仅仅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更是为了扭转人类历史的重大走向。此外，这种集体信念在1945年后的英国公共文化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到上世纪60年代，那些在上一代人心目中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因素，也在激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背景下受到了冲击。

考察英国社会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性，需要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相结合，尤其是在这种政治文化如何形成、如何确保自身发展，它为何会成为英国的政治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对英国及世界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等方面。在这样一部小书的篇幅里，挑战性在于如何最好地呈现这些主题，同时避开辉格党人的“必胜主义”（triumphalism），将这一历程看成是命运使然，简单地为所谓光辉岁月唱起赞歌。不过，这种我们需要避开的倾向本身也是英国历史的一部分。实际上，辉格党人的必胜主

义，对18、19世纪许多同时代观察者的态度都起到了很大影响。

此外，任何一部英国史，都有必要解决其中一段历史与英国本身的复杂关系。在这段历史中，有一些人并非以民族或族群群体的身份存在，他们统统被看作“英国居民”（the inhabitants of Britain）。这些人包括到英国来的移民，也更间接地包括一些离开英国的移民，他们构成了澳大拉西亚和加拿大人口的主体，以及美国人口的大部分。移民和国家结构，以及之前提到的具体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本书需要解决的问题。

受邀前往伦敦博物馆、查尔克谷文学节，以及玛丽华盛顿大学进行的演讲，让我有机会思考一些将在这本书里呈现的主题。约翰·布莱尔、比尔·吉布森、鲍勃·海厄姆、默里·皮托克、奈杰尔·拉姆塞、奈杰尔·索尔、理查德·托伊和两位匿名读者对本书前期的草稿进行了全部或部分审读，并提出了意见，还有麦克·莫斯巴赫尔允许我使用社会事务单位所有已经出版的材料，都使我受益匪浅。我也很高兴能把本书献给珍妮·福布斯，一位总是充满想法的好朋友。

第一章 英国史：前世与今生

历史总是与身份和价值问题紧密相连。随着这些问题的争议越来越大，公共历史的性质也变得越发可疑。这种质疑在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但近年来，随着国家认同在一些人看来越发漏洞百出、不清不楚，这个问题也就变得更加尖锐。这种情况导致英国（与其他地方一道）开始出现针对通过公共手段进行公民身份确认的争论。

在某种层面上，这些手段是控制性或限制性的，比如21世纪初和2010年后出现的关于身份证件和更严格的移民管理措施的建议，以及对将考试作为获取公民资格条件的进一步施压。而在另外的层面上，人们争论的焦点其实在于对身份认同的探究，这种探究的目的是引起并理解共同记忆与权力结构。历史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进程密切相关，它被认为是为这些信念和权力结构提供了背景，也为它们的表达提供了渠道，从而使身份认同得以成立。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一部关于一个国家的简短历史，如果假设它可以不受这些争论的干扰，显然是不够理智的。有许多敏感因素需要考虑进来，对英国来说，其中最明显的一些都与它漫长的过去有关。譬如《BBC历史杂志》（BBC History Magazine）就曾在2006年的6月号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为“你认为应该将哪个历史纪念日设立为‘英国日’”提供了10个选项，结果6月15日，即《大宪章》签订之日脱颖而

出。《大宪章》是贵族反对派强迫约翰王签署的文件，以书面形式对王室权利进行了限制。因此它也被视为一份自由宪章。2014年3月12日，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1]曾在广播四台（Radio Four）呼吁制定一个“类似《大宪章》的权利宪章”，保障人们在网络上的权利。但实际上，1215年的这份宪章，在对约翰的统治提出批评，并肯定了一种不同的统治要求的同时，更直接关乎的是英格兰历史，而与苏格兰和威尔士关系不大。当时约翰治下的领土包括英格兰、威尔士的一部分、爱尔兰的一小部分，以及越来越少的法国领土；但他从未统治过苏格兰，或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全境。

敏感意味着需要平衡。这本书该用多少篇幅来介绍苏格兰或威尔士的历史，或者详实地讨论过去两个世纪移民在英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更广阔的背景，尤其是欧洲的背景，与英国历史有怎样的联系。然而，为了应对针对平衡提出的批评而调整自身，这本身就存在着一种风险。对明显的吹毛求疵做出回应，往往会造成新的倾斜，比如刻意忽略本应给予足够重视的英格兰历史，反而让“四国”——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平分秋色，这便是一种明显的错误倾向。

另一种普遍误区在于对英国地方及地区发展的忽视。相应的关注需要注意到地区在角色上的变化，同时还要注意到地区自身重要性的变化，例如在18世纪末以煤炭为基础的工业兴起之前，英格兰北部、西米德兰兹、苏格兰中部地带和南威尔士的重要性都不及日后（相对而言，人口也较少）。相反，这一时期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英格兰南部，因为这里不仅拥有最肥沃

的农业土地，大多数政治和政府机构，以及海军基地、多所大学，法律和出版中心也都坐落于此。

这里便有一个单独的问题，无论如何恰当地对地域进行划分，都会分散人们对整个英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整个联合王国身份认同和经验的关注。与此同时，对地方和地域层面的变化进行考察，既可以抓住一个关键层面的经验，又可以推进英国在国家层面如何改变的讨论。因此，W. 斯坦利·赛克斯（W. Stanley Sykes）在他销量颇好的作品《失踪的放债人》（The Missing Money-Lender, 1931）中提到了巴哈文（Barhaven）——一个虚构的英国制造业小镇，19世纪无计划的快速增长显然在那里留下了印记：

昏暗肮脏的小房子背靠背挤在院落和巷子当中，丑陋到令人难以置信，完全不顾采光和空气；嘈杂、烟雾缭绕、臭气熏天的工厂随意地散布在小镇的居民区当中——所有这些工厂都竖起了迷宫般的烟囱阵，让浓烟永远遮蔽天空。

为了纠正过去50年的错误，人们正不顾一切地进行着昂贵的努力。20世纪的钟摆又猛烈地摆向了另一个极端……曾经是现代交通死亡陷阱的狭窄街道，现在正在以惊人的代价进行拓宽。

诸如此类。被改造的环境，和其本身的建筑群落一样，都反映了过去与现在、环境压力、就业机会和监管驱动。这些系统会对在当地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经验造成影响。

而在单独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作为经验的历史和作为因果进程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应该分别对这两种历史给予多少关注。

在英国，长期以来，有关国家历史和因果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由辉格史方法来解决的。这种方法以英国的一个政党来命名，其本身也与18、19世纪期间的一种重要政治与思想倾向相一致。这种方法强调这个国家的新教身份认同，强调它对个人财产、法治和议会主权的尊重，并将这些作为保障自由的手段。这种方法统合了借由本国独特性达成的爱国意识，以及时常冒头的排外情绪。历史被描述成一个注定的进程，一定會在稳步发展后收获质的提升——简而言之，这是一种目的论进步主义。

例如，1760年，高产作家约翰·洛克曼（John Lockman）就曾在他的著作《英国新史》（A New History of England）的第14版序言中写道：“我们要努力让全体国民沐浴光明，使他们对我们的纯洁的宗教及其迷人的仆从——自由——产生发自内心的热爱；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让他们对教皇（天主教）和他的仆从——奴隶制——心怀憎恨。”当时的英国观察家们谈到的奴隶制，自然指的是英国国内的情况，而非整个帝国，即政治手段——为经济目的驱使的劳动力并不在讨论当中。洛克曼的言论恰到好处地抓住了由鲜明的民族意识主导的意识形态框架，这种框架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显而易见的威胁，同时也反映了这种应对本身，对国家身份认同以及政府政策具有何种程度的重大意义。

这种辉格史方法所固有的进步观念，很容易被同时代人借用，并应用在对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现代化讨论当中。在具体的说法里，迷信被摒弃、现代性已经“大爆炸”，这些都是

“光荣革命”、宗教宽容、“理性时代”、工业革命、“公共领域”兴起——咖啡馆和报纸，以及民主理想的累累硕果；人们的生活本身也日新月异，包括享有更便捷的交通手段（运河、公路和邮政服务），生活节奏加快，新闻的传播也更加迅捷。

对先前的历史观念发起挑战，同样也是这一方法的一个方面。这些挑战表明历史观点往往都具有广泛的政治背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日后。例如，1828年11月8日《埃克塞特周报》（Exeter Weekly Times）的一篇社论开篇便谈道：

火药阴谋^[2]

11月5日的再度到来，唤起了新教徒对天主教徒所谓盲目顽固的新一轮苛责；这样一个令国家转危为安的纪念日受人利用，成了让昔日的误解再次浮上水面的借口，异议进一步散播，激起早已作古的仇恨。天主教的不容异己原则被新教徒借题发挥，现成的谩骂取代了历史真相。即便是在自由主义者当中，现在也很少有人了解这一阴谋真正的来龙去脉；至于那些庸常之辈，谁还知道除了天主教徒阴谋，火药阴谋还有其他别的名字？

这则关于1605年火药阴谋的讨论，在1828年具有特别意义。当时关于天主教解禁的争论十分激烈。辉格党提议解除天主教徒在法律上受到的限制，这一议案先是遭到托利党的强烈反对，随后在内阁方面也引发了分歧。不过最终，1829年，国会还是通过了《天主教徒解放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

在其支持者眼中，辉格主义当然是一种纯粹的进步主义，并不存在专制或应和民主的考量。但随着选举权（投票权）的

扩大，民主和民粹政治变得越发重要，这样的愿景变得不切实际。

1832年的《改革法案》或《第一次议会改革法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选举权的扩大，但更恰当的说法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即通过1867年、1884年和1918年的后续法案，这一目标才得以实现。此外，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许多社会和政治的旧秩序，而民众购买力的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主义压力也进一步带来了变革。

这些变革自然也对辉格史方法产生了影响。它的叙述方式发生了改变，先前对于稳步前进的强调也开始淡化，尽管其中一些核心内容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甚至是今天。作为另一个重大转变，辉格史方法中的目的论进步主义越来越多地从宪政、政治和帝国等主题中解脱出来，转向社会进步和赋权的概念——一些似乎更适合成为致力于社会福利的民主社会的主题。然而，这样的转向使得公共历史的宪政与政治维度变得面目模糊，这也是当前人们对于这一维度、乃至整个公共历史感到不安的一个原因。

在讨论英国历史时，辉格史方法作为一种解释基调、方法和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并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我们还需要面对技术和内容上的问题，即一本历史书应该讨论什么，应该采取怎样的历史分期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形式有关，具体来说，就是叙述的作用，以及原因和理解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历史往往是叙述性的。此外，由于材料的熟悉性和主

题的庞杂相结合而产生的压力，在相当程度上鼓励人们可以简而叙之。

但这种简化也必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挑战了过去与现在人们各种理解历史、阐释变化方法并存的必要性。前言中提到的结构与结点之间的关系便是其中一种。所以在本书中，我并打算提供一种简单的叙述。我希望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叙述中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在一个国家的历史本身，和对这种历史解释的尝试之间。

当前人们对历史的争论——2013年，随着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历史教学国家标准修订遭到反对，这一问题成为焦点——呼应了我上面提到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反对和争论恰好也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其间所涉及的具体话题，以及人们争论时状态的明显变化也同样如此。在审视国家历史时，浮上水面的话题往往都呼应了当时社会最紧迫的问题。

正因如此，在16世纪，英国建立新教教会的历史性，进而是合法性，在当时便成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争论不休的话题。1559—1575年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竭力贬低罗马教廷的重要性。他在《大英教会溯古》（*De Antiquitate Britannicae Ecclesiae*, 1572）一书中强调了英国教会悠久的历史渊源。天主教徒方面则强调597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the Great）派圣奥古斯丁到英国传教，使肯特等王国皈依一事。当时的肯特国王艾塞尔伯特（Aethelber, 约583—616年在位）很快皈依，并且支持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伦敦和罗切斯特建立三个主教辖区。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在他的戏剧《亨利八世》（Henry VIII, 1613）中为宗教改革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诗性的维度。该剧在环球剧场首演时，为宣告饰演国王的演员入场，舞台上发射了一枚炮弹，结果烧毁了剧场的茅草屋顶。这使得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没有机会说出对婴儿的颂词（出自莎士比亚之手），这个婴儿也就是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生于1553年。按照莎士比亚的剧本，克兰默要“依上天命令”，为这个婴儿献上颂词，颂词中预言这个婴儿的美德终将凤凰涅槃，在詹姆斯一世（James I, 1603—1625年在位）身上重生，令其成为一代明君：

他必将茁壮，
如山间苍松以它茂盛的枝叶
福被周遭的平野

历史以这样的方式在舞台上呈现，对当世的繁荣提供预言和正当理由，同时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合法化形式。

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历史提供的是一种示范性的叙事，不仅提供辩护，还为当代状况提供了置于历史背景下的机会。因此，对于在19世纪早期致力于推动议会及其他改革的辉格党人来说，恐吓反对改革的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60—1820年在位）和乔治四世（George IV, 1820—1830年在位），可能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但这是可行的手段。毕竟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期间推翻詹姆斯二世（他同时还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七世）一直被认为是辉格党的光荣起点。

辉格党人同样也不难从他们的前辈里找到英雄人物。在第六代贝德福德公爵约翰位于沃本的庄严大宅（堪称乡间宫殿）的名人殿中，陈列着辉格党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半身像，与他相伴的是第五代公爵弗朗西斯（1765—1802）、第六代公爵约翰本人（1766—1839），还有古典罗马时期那些著名的正直人物，如大小布鲁图斯，一道组成了对英雄与美德的纪念。出自约翰·弗拉克斯曼（John Flaxman）^[3]之手的楣饰描绘了自由，而理查德·韦斯特马科特（Richard Westmacott）^[4]的雕带则以充满英雄气概的行军图为主题。自由就这样被占用，并小心翼翼地嫁接在辉格党的族谱当中。此外，当世之人也会很快被投入到历史神话当中，如福克斯，在1806年去世后迅速便获得了标志性地位。这一点从当时的洗礼名选择和年度晚宴中便可得证。

反过来，辉格党自然也免不了遭受严厉批评。在托利党和激进分子看来，辉格党人都是寡头政治的代表。而更进一步，对于托利党人而言，辉格党人还都是激进分子的盟友，尽管实际上辉格党人根本无暇去搞激进主义。

对过去的描述不仅服务于对国家政治的不同观点，也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现实策略，比如对自己的来龙去脉十分挂心的贵族家族、镇议会以及个人家庭。例如曾有一段时间，在汤顿镇，每年5月11日，人们都会举行庆祝活动，纪念1645年英国内战期间议会军控制的据点成功破围，这一事件被看作是保皇党的失败，实属天命难违。一年一度的庆祝布道一直持续到18世纪20年代，庆祝活动则延续到了70年代。在政治层面，这些

活动都是不信英国国教者反对托利党集团（镇政府）的一种激进表达。这些地方政治行为缓和了历史分歧，并为之注入活力。

而从政治谱系的另一端来看，18世纪对斯图亚特王朝在查理二世主导下复辟的庆祝活动，是对正统主义以及第二次复辟的呼吁，即流亡的斯图亚特人对王位的要求，因而同时也是对1714—1837年执政的汉诺威王朝的批评。

宗谱是目前英国最流行的历史形式。当国家档案馆把190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放到网上时，系统一度崩溃。然而，宗谱的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风气变化的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迹象是，到了21世纪，大多数人似乎并不介意发现自己的祖辈父母并未合法成婚，或者是私生子，甚至是一些存在犯罪性质的情况。这种态度，与历史上人们对宗谱的态度大相径庭。曾几何时，人们会把宗谱当作发掘杰出的、社会地位崇高的先人，从而提升自己家族地位的手段。

家族历史的问题，关系到的是何种历史更具普遍意义。直到前不久，王侯将相仍然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但最近，情况有所不同。1999年，为迎接千禧年的到来，英国皇家邮政发行了一套共48枚的邮票，分成12组主题：发明家、旅行者、病患者、开拓者、劳动者、文体明星、市民、科学家、农民、士兵、基督徒以及艺术家。五年后，为纪念英国参战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150周年，英国皇家邮政也发行了纪念邮票，但邮票的主题并非战役场景或是高级将领，而全都是普通士兵，取材自1856年他们从战场上凯旋时的真实照片。

同样，电视真人秀节目也开始了对历史的再现，如《英国维多利亚住宅狩》（1900 House, 1999），通过让一个真实家庭住进维多利亚时期的旧宅，用摄像机记录他们的生活，来实现重现昔日日常的目的。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人们呈现的更多还是今天的观念和基于当下对过去的戏仿。历史不可能轻易再现。

有关国家历史的艺术呈现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人们自然无法想象如《金鼓雷鸣》（The Drum, 1938）《四片羽毛》

（The Four Feathers, 1939）等战时电影中呈现的当时对帝国的情感需求。后者根据A. E. W. 梅森（A. E. W. Mason）发表于1902年大受欢迎的同名小说改编，对近代大英帝国在苏丹（英国最终在1898—1899年征服了苏丹）的攻伐大业进行了再现（并非是对这个题材的首次尝试），进而对男子气概和英雄主义做出了定义。此外，理查德·韦斯特马科特1839年的浮雕作品《废黜殉节》（指印度寡妇须随丈夫一同火葬殉葬的风俗）——作为孟加拉总督（1827—1835年在任）及第一任印度总督（1833—1835年在任）威廉·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雕像的基座，和他于1829年在加尔各答大教堂为早先曾担任过类似职务的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所完成的部分纪念碑一样，都已经成为古老的回声。相反，今天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一种反帝国的自由主义，对早先认为帝国主义可以帮助其他民族实现共荣的说法嗤之以鼻。

在电影界，过于激进的声音鲜少得到支持。例如，作为有史以来少数几部得到自身历史学家认可的历史影片，凯文·布

朗洛（Kevin Brownlow）和安德鲁·莫洛（Andrew Mollo）于1975年拍摄的低成本独立影片《温斯坦利》（Winstanley, 1975），讲述了17世纪中叶激进的“掘地派”（Diggers）运动[5]领袖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的故事。这部影片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盛赞，但最终只是通过电影俱乐部进行了非常有限的发行。相反，对大英帝国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性质进行批评的影片，如成功的音乐剧及电影《仙乐军魂》（Oh! What a Lovely War），则使用了先前观众难以接受的内容及表现手法。

“掘土派”在公共记忆中鲜有共鸣，不过相比之下，1381年农民起义和1834年的托尔普德尔蒙难者（Tolpuddle Martyrs）[6]倒是仍在被人们提及。如进入21世纪后，左翼民谣歌手罗伊·贝利（Roy Bailey）和左翼政治家托尼·本恩（Tony Benn）都曾利用这两个主题进行过巡演。

除了解释的问题，关于历史的认知，以及历史当中的认知，也都并非一成不变。印刷术的普及对民众的读写能力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它的影响不止于此。对国家的视觉理解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在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四世》（Henry IV）的第一部（1597年）中，威尔士领袖欧文·葛兰道厄（Owen Glendower/Owain Glyndwr）曾对他的同党说：“来看看地图，我们要不要划分一下各人的权利。”但实际上，在1403年谋逆之时，他们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当时地图尚未普及，而且质量也有问题，不能帮他们准确地“划分权利”。然

而，对于16世纪末的观众来说，受益于印刷术的进步，他们对更多视觉图像有了认识，其中自然包括地图；这同时也反映了伊丽莎白时期人们对地图的使用更加普遍，因而三位谋逆者参阅地图这一情节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哈利·霍茨波对特伦特河道对他的那一份领土的影响感到不满：

我想你们分给我的勃敦以北（特伦特河从中穿过）这一份土地，讲起大小来是比不上你们那两份的。

到20世纪，随着大众教育普及，人们对国家地理形态的认识也更清晰，这为理解国家历史提供了清晰的空间背景。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这种认识反而被削弱了。高速公路可以轻易从崇山峻岭穿过，例如M40公路让奇特恩斯丘陵变得毫无存在感。

大众兴趣和认知的转变，影响了历史观点可以、能够被理解和表达的背景。历史、地理和文化参照的框架一直都在不断变化，这既影响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也影响了对过去的阐释。与此同时，故去之事的魅力，正在于它可以告诉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变化。

注释

[1] 英国计算机学家，万维网（WWW）的发明者。——译者注

[2] 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发生于1605年，是一群亡命的英格兰乡下天主教人群试图炸掉英国国会大厦，并杀害正在其中进行国会开幕典礼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和他的家人及大部分的新教贵族的一次并未成功的计划。后来每年的11月5日，英国人以大篝火之夜（即焰火之夜或盖伊·福克斯之夜）来庆祝阴谋被粉碎。

[3] 英国雕塑家和插画家，以新古典主义作品成名。

[4] 英国雕塑家，曾主持大英博物馆的壁画装饰工作。

[5] 该运动主张贫民开垦公用地（common pasture），土地共有，人民共同耕种土地，带有现代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及农业社会主义色彩。

[6] 指一群名为“托尔普德尔蒙难者”的英国农民由于组成农业联盟而被发配到澳大利亚的历史事件。

第二章 公元1400年之前的历史

一种对英国历史有效的认知，认为这个国家的基本要素在公元1400年之前便已经完成确立。如果从长期的地缘政治、政治和宪政角度来看，这些基本要素存在于独立的英格兰（包括威尔士），与独立的苏格兰并立同行。在这两个国家中，王权和威权都受到了有效限制。在英格兰，以议会为形式的代议制十分发达，各种自由主张为普通法奠定了基础。这种对起源和早期发展予以关注的路径，可以同美国史将早期共和制历史，特别是开国元勋视为重点的方法相对应。然而，美国史的这种路径在近来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来自另一种路径，即聚焦于后来的移民、民权运动，以及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

虽然时间尺度和背景迥异，但在英国，传统的国家历史讲述方式同样遇到了类似的挑战。这种挑战同样选择把关注焦点放在后面的一个时期，从17世纪末期国家认同和体制建立开始，尤其是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以及1707年英格兰（包括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议会合并。扩张、工业转型以及随后的社会和政治变革，都在这一叙述中显得至关重要。还有一种挑战选择了更晚的时期，即起始于19世纪末的大众民主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发展。

尽管这些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侧重于1688年后的历史，或1884年后历史的叙述，其实都低估了之前几个世纪的重要性。此外，作为历史，这类叙述对19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苏

格兰或英格兰，都无甚意义。事实上，19世纪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把早期历史看成英国诸种自由之缘起，是这桩伟大事业的背景，因此自然与它密切相关。这里的“英国”很大程度上会被理解成英格兰，但同时也存在一套独立的苏格兰叙事。

韦塞克斯王国国王阿尔弗雷德（871—899年在位）与可能面目更加模糊的6世纪早期军阀亚瑟王一道，成为代表英国自由的伟大祖先，扮演了令英国人引以为荣的角色。不过随着“诺曼桎梏”（Norman yoke）这一概念的出现，人们认为昔日的光荣被1066年的诺曼征服蒙上了阴影，必须重新磨洗。1215年的《大宪章》，为这一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些画作，例如丹尼尔·麦克利斯（Daniel Maclise）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在丹麦营》（Alfred the Great in the Camp of the Danes, 1852）反映了人们在画布上重塑国家历史的诉求。这种诉求在麦克利斯的另外两幅宏伟壁画《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在滑铁卢》（Wellington and Blücher at Waterloo, 1861）和《纳尔逊之死》（The Death of Nelson, 1864）中亦有表现。这两幅作品是为1834年议会被意外烧毁后重建的威斯敏斯特宫而作的。1873年，在韦斯特伯里附近的一个山坡上，一座白马雕塑被修复，被视为对阿尔弗雷德在爱丁顿对丹麦人赫赫战功的纪念。直到最近，乘坐在伦敦和英国西部之间往返的大西部铁路线的乘客仍能够看到它。在苏格兰，作为中世纪反英格兰独立运动的领袖，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卒于1305年）和布鲁斯的罗伯特（Robert the

Bruce, 1274—1329) 仍以英雄身份被人们铭记。他们的功绩, 被描述为令英格兰和苏格兰以两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合并成为可能。

类似的纪念活动由来已久。15世纪中叶, 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1421—1461年及1470—1471年在位) 就曾支持将阿尔弗雷德封为圣徒, 以便为英格兰王权永固的观点提供佐证。另外, 18世纪, 尤其是18世纪30年代末, 阿尔弗雷德被乔治二世的批评者们奉为英格兰人国王的典范——乔治二世是来自德国的汉诺威王朝成员。

无论我们随后的重点是从公元5世纪至17世纪围绕独立和自由展开的政治活动和战争, 还是近三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 在讲述英国历史时, 都有必要考虑到为适应环境的可能性和种种阻碍而展开的长期斗争。在这场斗争中, 整个英国都取得了广泛的发展, 而这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起点。

罗马人之前

目前，有关这片土地人类活动的最早证据，来自大约9万年前^[1]。2013年，在诺福克的一处泥滩，人们发现了一些脚印（几周后消失）。目前人们假设，早期人类或许并未在这里长期定居，而是有若干个定居时期：与极地冰层退缩有关。在气候允许的情况下，早期人类从南欧向北欧移动，探索在北极圈附近的苔原地带生存的可能。在英格兰南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早期智人生活的痕迹，以及他们曾使用过的工具组合，如目前属于现代伦敦的斯托克纽因顿。2014年5月，同样是在伦敦的沃克斯豪尔，考古学家宣布发现了一个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包括一个鱼篓、一个挖掘土坑、一个砍伐工具、一个刮削工具，若干烧焦的动物骨骼碎片，以及地面烧焦的痕迹，表明有人生过营火。这被认为是早期人类曾在泰晤士河畔以及河中的砾石丘露营的证据。

尼安德特人被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取代，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5万—1.2万年前）；在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和石刀技术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最后一个冰河期结束时，森林和野生动物一起向北移动，使橡树、榆树、白蜡和椴树等落叶树在英国生根发芽，动植物数量增加，为狩猎采集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随着冰雪融化，海平面开始上升，预示着现今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后果。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横跨北海南部、连接英国与欧洲大陆的陆桥被切断，这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

件，当然也是英国历史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时间点。作为一个岛屿，或者说是一组列岛，英国更难被入侵，而海上贸易将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约公元前5000年，具体来说是在公元前4200年前后，开始有农耕作物出现在英国，同时也出现了以作物为中心更加稳定的人类定居点，这种生活方式可以比狩猎采集获得更多食物，反过来也鼓励了更发达的物质文化与更多贸易行为的产生。家畜(牛、羊、猪、马)开始普及，随之而来的则是轮式车辆的出现。随着人口的增加，定居点的证据也在增加，同时交通道路也在发展，例如约在公元前3800年建造的“斯威特古道”

(Sweet Track)，横穿萨默塞特平原。公元前2000年，农业的发展导致大量林地被砍伐开垦，尽管林地本身也是一种主要资源。木材是当时主要的燃料，也是建造房屋的原料。2013年，人们在迪恩森林的利德尼附近发现了一组小金手镯，据推测可能属于当地族长的孩子。这反映了公元前1500—公元前1100年间，该地已经出现的社会等级分化程度。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历史遗迹当数巨石阵。这是一个祭祀中心，分阶段建成。它可能总共花费了200万个工时（按照公元前1550年单位劳动力的标准），其中的蓝色石块可能来自威尔士。这样的工程所需付出的劳动和组织努力无疑都十分巨大。巨石阵所服务的宗教信仰尚不清楚，但它显然与天文观测有关。最近的考古研究表明，巨石阵可分成两个中心，一个属于死者，一个属于生者，有证据显示在生者的部分曾举办过多次

宴会。这一点也说明了人们对于过去的认知在不断变化。今天巨石阵主要是由被堵在A303公路上的人们欣赏。

公元前3000年，金属加工技术传入英格兰南部，这可以被视为英国与欧洲大陆共享文明进程的一个部分。铜器时代由公元前2300年的青铜器时代为开端，而公元前700年，人们进入了铁器时代。

铁制工具，如锄头和钉子，给农业和建筑带来了新的可能，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英国铁器时代的社会与其死敌罗马帝国的社会不同。英国有一些被罗马人称为奥必达（oppida）的原始城镇，但并未发展出发达的城市文明——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但并没有成熟的政府体系。

这一时期的英国人并没有书面文化，也不具备统一的语言，而是操着各种语言，但发展也是很明显的。许多林地，尤其是英格兰南部的林地，都已经被清理用作开垦。不断壮大的农业支撑着人口增长、社会定居和贵族阶层的兴起。此外，钱币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不过，在这个很大程度上还是部落社会的地方，没有迹象表明英国、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身份认同已经出现，也没有几个部族并立，或是存在最终统一成今天的领土划分的证据；当然，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情况并不存在。在这一时期，固定的领土边界并无用处。现存的堡垒、城墙和沟渠数量表明，当时这里冲突频繁，人们的生活并不稳定。公元前400年的芬科普（Fin Cop）和公元前100年的丹伯里（Danebury）等屠杀遗址，则进一步表明了这种冲突的频繁。

目前还不清楚，如果没有罗马人的征服，英国历史会怎样发展。没有被罗马征服的爱尔兰和德国、苏格兰的部分地区，基本都发展出了一些小型王国。这些王国以农业为主，但也会参与到贸易当中。在罗马征服之前，英格兰南部已经通过贸易与欧洲大陆邻近的一些地区建立了联系。实际上，在某些方面，除了基督教以外，公元7世纪后罗马时期的英国与铁器时代后期的英国颇为相似。

罗马不列颠

不过，通过公元43—83年的征服，罗马人占领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南部，这使得英国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变化。先前，在迅速征服高卢（法国）之后，恺撒便把目光投向了英国。因为他觉得，高卢之所以不断抵抗罗马，是因为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同时出于个人原因：他需要获得更多荣誉，还要保持自己麾下部队的活力。在公元前55—前54年的远征中，他本打算利用英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却不曾想遭遇了激烈抵抗和恶劣天气的阻击。公元前54年，恺撒率军强渡泰晤士河，攻下了部落首领卡西维劳努斯（Cassivellaunus）的都城，可能位于今天的惠特汉普斯特德（Wheathampstead）境内。

然而，恺撒的这次远征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结果，因为罗马在当时先是受内战所扰，随后又面对来自莱茵河边疆更大的威胁。而英国与其他地区的贸易以及政治关系，反而在此役过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不过，到了公元43年，声名远不如恺撒的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再次发动远征，反而实现了对英国的征服。他这么做的原因，一是为了获得军事声誉，二是由于英格兰南部的罗马追随者失势，罗马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英格兰东南部在当年即被占领，南部和中部也很快被罗马人收入囊中。然而，在公元60年，受压迫的爱西尼（Iceni）部落女王布狄卡（Boudicca）在今天的东盎格利亚地区揭竿而起，向罗马人发难。当时罗马人在英国的定居点——主要位于今天的科尔切斯

特、圣奥尔本斯以及伦敦等地——纷纷被摧毁，居民遭到屠杀。布狄卡后来被罗马总督盖乌斯·苏埃托尼乌斯·保利努斯（Gaius Suetonius Paulinus）击败，具体地点不详，可能是在米德兰兹某地。

随后，罗马人继续推进，占领英格兰北部，并侵入苏格兰。不过他们只征服了苏格兰南部，而且占领时间非常短暂。罗马不列颠的北部边境反而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依靠哈德良长城提供庇护，这是一道由堡垒构成的石墙，从索尔韦河口一直延伸到纽卡斯尔附近的北海。这道墙本可能造成英国长期分裂，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罗马人在英格兰的统治终究要终结。

在城镇以外，包括那些后来完全基督教化的地方，当时却正是罗马权威、消费和文化的中心，因此，罗马不列颠并不像法国和西班牙等其他外省那样，被彻底罗马化。外来定居者和他们的文化直接嫁接在本地社会之上，而这个社会仍要忠于它的农业基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罗马人尤其需要的那种市民联结。因此，虽然被罗马人长期统治，罗马不列颠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改变可能并不及预期。

然而，在罗马统治下，英国却得以共享更广泛的繁荣。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更多的贸易机会方面。采矿业和农业都得到了发展，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量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生产和消费的商品数量远多于之前的铁器时代。交通改善和城市需求——尤其是伦狄尼姆（Londinium，伦敦的古名），它可能是在公元50年时建成——带来了经济专业化的可能，其前提自

然是英国商品交换网络的形成。这一网络在大伦敦地区（the Greater London area）表现得尤为突出，内陆农村，如斯泰恩斯（Staines）、布伦特福德（Brentford）以及尤厄尔（Ewell）等这一区域的小型城镇，为伦敦提供食品和其他资源。伦敦则成为这一罗马行省海外贸易的中心。从伦敦出口的商品包括谷物、羊毛制品和猎狗；进口商品则主要是消费性商品，尤其是葡萄酒、玻璃、陶器、大理石、橄榄油，以及对罗马人的饮食很重要的一种腌制鱼酱（garum）。

在交通方面，罗马人修建的道路以伦敦为起点，辐射整个罗马不列颠。这些道路体现了罗马人的工程和规划水准。由于无须考虑任何土地所有权问题，它们通常修得笔直，水准很高，采用了石基和碎石路面。在这些道路中，华特灵古道（Watling Street）通往切斯特（Chester），白鼬大道（Ermine Street）通往约克（York），斯坦恩大街（Stane Street）通往奇切斯特（Chichester）。伦敦同时也是一座河港，就像约克、林肯（Lincoln）、切斯特和格洛斯特（Gloucester）等其他建成于罗马时期的城市一样。这些城市反映了罗马统治时期城市建设的基本状况。

基督教的到来和传播，延续的是这一时期英国与欧洲大陆文化、制度同步联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罗马人统治下的早期宗教，特别是奥林波斯神崇拜和密特拉神崇拜中便已显现。神龛、寺庙和教堂在城市中多有分布。实际上，宗教活动的城市属性也是罗马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4世纪时，由于“蛮族入侵”——主要是在公元342—343年、360年，以及367—368年——罗马帝国的危机日益严重，英国也受到波及。在英格兰南部，主要的威胁来自德国西北部的撒克逊人。3世纪时，这些人的进犯已经导致在目前被称为撒克逊海岸的地方，建起了一系列沿海堡垒。此外，伦敦等城市的城墙也有所加固。

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出现了明显的衰败迹象。比如4世纪末，伦敦发现的古钱币数量较之前明显减少。此外，根据罗马统治末期遗址分布的情况来看，伦敦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或多或少都已经被遗弃了。

公元400—800年

罗马统治在公元406—410年画上了句号。终止的原因并不是戏剧性的“野蛮人大入侵”，而是帝国内部的分歧，切断了这里与罗马的政治联系。罗马不列颠人推翻了僭主君士坦丁三世（Constantine III）在这里的管辖，呼吁正统皇帝霍诺里乌斯（Honorius）恢复合法统治。但迫于匈人入侵的压力，皇帝自顾不暇，只能嘱托罗马不列颠人自己巩固边疆。欧塞尔主教圣日耳曼努斯（St. Germanus）于429年造访英国，打击否认原罪学说的异端伯拉纠派（Pelagian）。他指出，城市仍保持和平，但具体的防务已经掌握在地方势力而非罗马军队手中。然而在这个世纪中叶，由于“野蛮人”的侵袭，情况似乎有所恶化。事实上，公元446年，曾有人向罗马发出过求援请求，但并未得到回应，显然是因为罗马方面无力驰援。

罗马统治崩溃后，英国又回到了自给自足的状态，社会中可能充斥着暴力行为，这一时期的考古记录中，陶器和钱币都鲜少出现。但陶器和钱币资料的缺乏却也可能是材质本身，尤其建筑方面对木材的依赖造成的。这并非是原始社会的标志，但它确实让这一时期的建筑遗迹很少能够保存下来。在20世纪30年代新技术得到发展之前，古代木制建筑的发掘工作一直很受限。此外，分布在城市中的遗迹还受到后来建筑工程的影响，以及深埋地下数百年的自然破坏。

然而，通过对埃克塞特（Exeter）及伦敦考古记录横断面的分析，我们却不难看到定居时断时续的明显证据。其中的原

因，可能来自英国内部冲突的冲击，而非外族入侵的影响。5世纪社会动荡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更多在开化程度上不及罗马化城市的高地居民的冲击。他们在战斗意愿上更加强烈，仍在以传统方式使用武器。因此当皇权崩溃后，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罗马化的低地人当成了攻击对象。

至于低地人，他们可能已经在晚期罗马城区和教区的基础上，获得了市民身份以及对城市政治组织的认同；但这种身份和政治组织可能缺乏延续性。有关英国社会受罗马影响的具体程度，目前尚未可知。

对于入侵者来说，更大的抵抗力量自然来自那些并未被罗马化的英国人。来自丹麦的盎格鲁人和来自德国的撒克逊人不断对英国发难：盎格鲁人入侵了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麦西亚（Mercia）以及东盎格利亚；撒克逊人则在南部登陆。朱特人在肯特（Kent）定居。基督徒一蹶不振，尽管他们已经占据了一片开化程度较高的土地，确保了相当程度的延续性。虽然在大约公元500年，英国人的抵抗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个叫阿托利斯（Artorius，即亚瑟王）的勇士，在巴当山（Mons Badonicus）取得大捷，但他们还是被逐步赶回了威尔士、坎布里亚（Cumbria）和康沃尔（Cornwall）。至于留在原地的英国人，则大多作为奴隶或农民生存了下来，适应了军事实力占优的入侵者的统治。

英国有人定居的部分最终回到了罗马统治前几个世纪的状态，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大大减少，贸易对这里的重要性远不如

前。盎格鲁 - 撒克逊移民们专注于农业，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而统治者们也无意造墙围城。

DNA证据显示，苏格兰人来自爱尔兰。他们可能长期生活在北海峡（North Channel）两岸。这些人在苏格兰的地位越发重要。到8世纪末，他们已经和曾经成功抵抗罗马人，在福斯湾（Firth of Forth）以北定居的皮克特人融合。

然而，英国的入侵者们，无论是罗马人还是非罗马人，都是经过争战才获得成功的，他们也从未所向披靡。康沃尔直到838年才被撒克逊人征服，威尔士诸王国始终屹立不倒，尽管后来来自麦西亚的压力影响了威尔士的领土范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下罗马不列颠”或“后罗马不列颠”与罗马之间的联系逐步恢复。事实上，由于现代考古技术的进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资金支持的大规模考古活动兴起，填补了记录上的空白。这一时期的考古活动证明在伦敦等城市，当时的人类活动要比原本估计得更多。

此外，在来自罗马和爱尔兰的传教士努力下，很多人改宗基督教，这一趋势主要发生在7世纪，对英国在文化上与欧洲大陆接轨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这一阶段，传教活动主要依靠肯特王国和诺森布里亚王国在意愿和财富上的支持。与欧洲大陆的文化联系则主要依靠肯特王国和东盎格利亚王国来实现。

基督教的传播，同时也意味着教育和识字的普及，以及成文法的出现，后者主要在土地转让方面发挥作用。与5世纪和6

世纪相比，英国社会正局部趋于制度化，城镇生活也有所恢复，或者说更加活跃。地名和其他证据表明，人们定居和耕作的范围不断扩大。除城镇以外，还出现了一些集市或商贸中心。

基督教化是自公元590年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具有分水岭式的意义。其他可见的变化包括非常奢华的王室墓地，最突出的是萨顿胡 (Sutton Hoo)，以及以伊沃灵 (Yeavinger) 为代表的王室宫殿的出现。这二者可以概括为财富集中化和社会阶层化的表现。考古记录表明，财富和生产资料突然开始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贫富差距迅速拉开。这可能与经济模式的变化有关，尤其是对欧洲大陆的进口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定居点的出现。羊毛织物、铅和奴隶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出口物。这一时期的出口贸易与拜占庭于6世纪末在法兰克王国获取的黄金供应有关，这些黄金大量被用于购买英国货物。黄金也就由此传入了英国，出现在萨顿胡的墓葬品当中。

华丽的王室陵寝和王宫大殿，呈现的是既富足又充满竞争性的社会缩影。大多数公元600年之后的墓穴都没有墓葬品，但王室墓穴就不同了。对罗马文明的模仿成为统治者之间竞争性展示的另一方面，这种模仿使得基督教文明落地生根。盎格鲁-撒克逊统治者对传教活动的积极反应，与5世纪和6世纪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社会处于混乱且高度分散的状态，自然对来自罗马的传教活动提不起兴趣。

当然，英国羊毛出口的规模和重要性都在不断增加，显然也带来了可观的社会财富。通过20世纪90年代和进入21世纪后

广泛进行的金属探测活动，我们获知8世纪初分布在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的钱币非常多。大约在公元720年，英格兰流通的钱币数量约为3000万枚，这些钱币在乡村地区的分布十分广泛。钱币在当时已经不再是被贵族垄断，或是受官方控制的交易筹码，许多人都开始利用它在当地进行交易，并参与到海外贸易当中。

大约在7世纪和8世纪左右，伦敦、伊普斯维奇（Ipswich）、肯特郡的桑威奇（Sandwich）和南安普顿（Southampton）陆续成为港口。21世纪在考文特花园的考古活动，发掘出早期撒克逊时期，即最早可追溯至6世纪末或7世纪初的遗址，但大多数发现为公元650年之后，以8世纪初的“全盛时期”遗迹居多。8世纪30年代左右的诺森布里亚僧侣比德（Bede）曾将伦敦描述成一个“人头攒动的集市”，而早在7世纪70年代，伦敦就已经在一份文件中被描述成“船只停靠之地”。这种扩大仍与金银供应和贸易联系的变化有关。由于欧洲大陆政治势力和贸易路线的变化，到7世纪末，黄金供应已经枯竭。取而代之得到发展的是白银经济，白银的供应来自德国的哈茨山脉（Harz mountains）。由此，低地国家和莱茵地区的贸易得到发展，在英国，则带动了商贸港口的出现。

7世纪末，北海南部成为一个统一的地区，这导致英国内部的进一步分裂。东部地区与北海对岸的经济联系越发紧密，而西部地区虽由盎格鲁 - 撒克逊君主统治，但在许多方面却仍沿袭了不列颠式的做法，其社会显示出诸多“后罗马不列颠”的延续性。

在8世纪，贸易的主要发展带来了定居点和农业实践方面的变化。后者包括一些重要的创新技术的传播，特别是更先进的除草、施肥技术，玉米烘干机，以及水磨的使用。

交通问题不断形塑当时那个与今天完全不同的国家。山谷地区很容易招致水灾，其土壤黏重，排水性差，行人难以穿越，因而大多数道路都沿着干燥的山脊修建。架桥点（如伦敦）和渡船在当时的交通系统中起着核心作用，从8世纪40年代起，桥梁建造和维修的劳务服务成为契约文书中的重要内容，说明了桥梁变得更加重要。陆路运输的困难，尤其是运输大宗货物需要大量畜力，使得人们对水力运输更加重视；主要陆路与水路交通的交汇地区变得越发重要。在盎格鲁 - 撒克逊时期，羊毛的运输主要是通过泰晤士河水系，由科茨沃尔德运往东南部。

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最初获胜幸存的战争部落联合成为小型王国，这些小王国最终形成了较大的王国。这一过程同时也与社会制度发展，以及等级较高的定居点出现有关。特别是大约公元700年以后，诸如以汉普郡（Hampshire）和西南各郡（the West Country）为中心的西撒克逊王国“韦塞克斯”（Wessex）^[2]的统治者，其区别与一般地主越来越大。王室司法开始区别于亲族、世仇和担保人的司法。司法也需要与强权划清界限。

分化出来的王国中，一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肯特王国和东盎格利亚王国。肯特王国的影响，确保了其首都坎特伯雷成为人们早期改宗基督教的重要场所，同时也使得后来坎特伯雷

——而非伦敦——成为英格兰大主教教区。然而，盎格鲁 - 撒克逊各政体之间对于等级次序、统治地位的竞争，导致了战争和政治变革。经过一系列冲突和变革，肯特王国不复当年之盛。

诺森布里亚国王统治着英国东部的亨伯河和福斯河之间以及西部的默西河和艾尔河之间的土地。它在整个7世纪的大大部分时间里都占据主导地位，有时被英格兰及苏格兰的其他统治者视作霸主。然而，685年，皮克特人在奈克坦斯米尔^[3]击败并杀死了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克弗里思（Ecgfrith），这成为确立未来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关系的关键事件。

诺森布里亚王国的霸权，被米德兰兹地区的王国麦西亚取代，尤其是在奥法国王（King Offa，757—796年、784—796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一时期，英格兰的边境随着以他名字命名的奥法堤的建成而确立。这个土方工程网络既巩固了当时已有的防御工事，又继续延伸。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显示，这些土方工程最初建设年代在公元432—652年之间，换言之即奥法统治之前。“威尔士”（Wales）一词来自古英语中对罗马人的称呼“wealas”，后来更多用于指代麦西亚以西的不列颠土地，这片土地构成了当时英国诸王国中最大的势力集团。

奥法将他的势力扩展到英格兰东南部。伦敦的语言/方言，亦如牛津和南米德兰兹地区，都源自于麦西亚英语。伦敦当时的角色可能也对麦西亚王国造成了影响，其位于西北米德兰兹的大本营并没有广泛使用货币，但进入伦敦就意味着控制了一个货币广泛应用的富裕地区。奥法的霸权在其继任者岑武夫

（Cenwulf，796—821年在位）治下得以维持，后者在798年严厉镇压了肯特王国的叛乱，在伦敦降下几道诏书，并暂停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夫雷德（Wulfred）的职务。然而随后，麦西亚王国受到韦塞克斯王国崛起的挑战。825年，在埃兰敦（Ellandun）击败麦西亚人后，韦塞克斯国王埃格伯特（Egbert）征服了英格兰东南部。

同时，教会进一步促进英格兰人身份意识的形成。赫特福德主教会议（672年）确立了教规，并适用于整个英格兰教会。诺森布里亚的僧侣比德在731年撰写了《英格兰人教会史》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提出英格兰人乃基督之民。随后教会作家们还对这一主题做进一步发挥，使之随着维京人的异教攻击进一步深化，而这种异教攻击引发的感受，在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心的修道院中尤为强烈。

在这一时期，英格兰性也开始被用作一种身份认同的形式，将一个以现代眼光看来由不列颠人、罗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组成的多元文化社会，转变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民族血统远不如在英格兰共同生活的经历重要。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内部，不列颠人不再拥有独立的特殊身份：他们大多成了农民，但也有一部分与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婚。尽管这样的比较可能有悖历史，但在第一个千禧年之前的民族融合，与今日之情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有趣的平行关系，尽管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当基督教化

成为常态之时，宗教问题显然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种族融合造成极大阻碍。

公元800—1066年

奥法在位末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海盗已经抵达英国。虽然最初只是零星的骚扰，但他们很快便构成了比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更大的威胁。维京人开始在英国各处征战：挪威人主要在苏格兰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活动，而丹麦人则征服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东盎格利亚王国（865年）、约克王国（866—867年）以及麦西亚王国（877年），但随后，他们在爱丁顿被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击败。879年，丹麦人离开英国，到欧洲大陆寻求机会，阿尔弗雷德的这一战功得以延续。他开始在英格兰东南部作战，攻占了伦敦。

阿尔弗雷德和他出色的继任者，尤其是长者爱德华（Edward the Elder, 899—924年在位）以及埃塞尔斯坦（Athelstan, 924—939年在位）统治的这段时间，对英格兰身份认同的形成尤为重要。他们击败并赶走了丹麦人，征服了米德兰兹地区，更在经过艰苦的战斗后一统英格兰北部。因此，埃德雷德（Eadred, 946—955年在位）可以算作第一位英格兰国王，而随后，在973年加冕的埃德加（Edgar, 959—975年在位）则可以看成是第一位加冕成为英格兰国王的人。先前丹麦人对其他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攻伐掳掠，使得阿尔弗雷德及其继任者被描绘成奋起反抗的英格兰人，而非仅仅是韦塞克斯王族——尽管如果换个角度，麦西亚王国和北部诸国，其实是被他们武力征服的。

阿尔弗雷德对发展宫廷文化十分热心，热衷于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他把自己描绘成基督徒及所有盎格鲁 - 撒克逊人反抗丹麦异教徒的领袖。他是迈向新的政治形态、新王国——古英格兰王国——这一转变中的关键人物。这是一个不需要明确种族定义和地理范围界定的王国。在它发展的过程中，麦西亚和韦塞克斯不断融合的趋势尤为显著。由于远离韦塞克斯的权力中心，诺森布里亚倒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差异性。

这个不断扩张的国家，其内部也在不断发展，这个过程得益于阿尔弗雷德及其继任者的大力推动。最重要的发展，包括郡县制度的进一步巩固，作为统治者和自由民之间纽带的公共法庭建立，以及有效的税收和兵役制度的形成。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任者兴建了一批“自治市”（burh），这个词的本义是堡垒或围墙，但此时这些自治市不再仅仅是军事基地，而同时具备了城镇的功能。它们的建立既拱卫了王权，又促进了经济活动。这些自治市的选址和发展也与交通系统的发展相呼应。例如牛津的建立，便与泰晤士河上一座桥的建造息息相关。城市活动从整体上看较以往更加活跃。到1066年，约有10%的英格兰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地区比农村地区更明显地处于王权的管辖之下。

铸币制度也有进一步的调整。阿尔弗雷德重新规定了铸币标准，表明此时王国已不再仅仅依靠武力统治，其政府已经臻于成熟。与此同时，对于古英格兰王国的性质、权力和稳定程度，目前还存有较大争议。强调古英格兰王国的稳定性，意在表明现代英格兰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发，从而进一步强调英

格兰国内的长期安定，其制度——自古英格兰王国起便已存在的公共法庭参与制——源远流长，且发挥了有效作用。至于相反的观点，则可以对这两点提出质疑，尤其是古英格兰王国当时对北部地区究竟有多大统治力，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让反对势力望而生畏。

古英格兰王国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重新定义为一个基本上覆盖了现代英格兰疆域的远古王权，但我们尚不清楚，这个远古王权在多大程度上孕育了这片土地上的英格兰身份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诞生。古英格兰王国的政治语言，的确对背景各异而且还曾在不同身份的统治者治下生存过的诸民族起到了作用。这种已经统一化的民族情感，可以在纪念991年与丹麦人作战的马尔登战役（一次光荣的失败）的诗歌中看到。它也出现在将一些圣徒当作民族英雄的具体做法中；但这些情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共有，目前也不得而知。同时，一个没有限定、还在事实层面存在矛盾的民族，将其作为共同体的观念必然有些牵强。按照当时的标准，在君主统治下，古英格兰王国运转有效且国力强盛。因此，英格兰的政治、宪政和政府渊源完全可以追溯到9世纪。当时有效的王室司法与法院制度相结合的做法，对英格兰法律的影响，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此后，都可谓深远。

另一个相关的争论，集中在这个王国军事权力的性质上，不仅仅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权力，还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令英格兰成为一个拥有防御机制的国家，而不再是一个高级战斗集团。理论上，当时所有自由民都有义务在民兵或军队

里服役，这当然是公共权力的体现。然而，领主的权力、扈从，以及土地所有权也十分重要，以郡县为基础组建的军队，其核心很可能来自地主阶级。从10世纪90年代开始，还产生了一个传统，即通过税收来支付训练有素的佣兵的酬劳，来为王室服务。

肯尼思·麦卡尔平（Kenneth MacAlpin，卒于858年）在大约843年时成为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的统治者，这个家族的统治延续了数代。和英格兰的情况一样，教会为苏格兰君主统治的确立提供了思想和行政方面的支持，政府也变得更加系统化。然而，苏格兰较之英格兰，经济相对落后，其政府发展程度也有限。此外，现代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以墨累河河口为中心的地区，更不必说更北部和更西部的地区，都对其统治进行了抵抗。这个王朝更希望向南扩张，它在10世纪初占领了斯特拉思克莱德（Strathclyde），还在那个世纪稍晚时间占领了洛锡安。这一进程得益于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也没有民族区隔。最终构成苏格兰的人口包括苏格兰人、皮克特人、盎格鲁人和不列颠人，而且直到12世纪中叶，坎布里亚和诺森布里亚究竟该属于英格兰还是苏格兰，都还没有尘埃落定。当时的苏格兰国王需要为自己在英格兰北部拥有的土地，向英格兰国王宣誓效忠和致敬，这让情况变得复杂。直到1237年，苏格兰才通过签订《约克条约》（Quitclaim of York），放弃了英格兰北部的土地。

在平庸的“仓促王”埃塞尔雷德二世（Aethelred the Unready）统治时期，英格兰在10世纪90年代和11世纪初再次面

临丹麦人的挑战，最终在11世纪第二个10年被丹麦人的大举进攻击溃。覆灭的主要原因在于贵族分裂，同时埃塞尔雷德二世的文韬武略也远不及阿尔弗雷德，但丹麦人的强大却不容忽视。和英格兰一样，他们同样得益于政治和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发展。1016年，丹麦国王“八字胡”斯韦恩（Sweyn Forkbeard）的小儿子克努特（Cnut）成为英格兰的统治者。这一年早些时候，后者刚和埃塞尔雷德的儿子“刚勇王”埃德蒙（Edmund Ironside）议和。埃德蒙尚且控制着韦塞克斯，克努特则把麦西亚收入囊中，但随后埃德蒙便去世了。

克努特对英格兰的统治十分精明，直至其1035年去世。从1019年起，英格兰成为包括丹麦和后来的挪威在内的复合王国的一部分。此时的统治是“盎格鲁 - 丹麦”式的，与先前的侵略者不同，克努特直接掌控了整个王国。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培养支持者，但没有大规模征用盎格鲁 - 撒克逊地主的土地。他甚至还小心地与势力强大的修道院维持着关系。

然而，克努特的儿子们，同父异母的兄弟“飞毛腿”哈罗德（Harold Harefoot）和哈德克努特（Harthacnut），尽管战功赫赫，却连家族团结都无法维持，更无力维系这个本就处在分裂状态的“盎格鲁 - 丹麦”王国了。于是在英格兰方面，韦塞克斯家族于1042年轻松复辟。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

（King Edward ‘the Confessor’）恢复了原本的君主制，在伦敦众望所归的氛围中坐上了王位。伦敦市民对王位继承看法的表达，在克努特和“飞毛腿”哈罗德死后便已显露端倪，表明了市民团体的存在。

接下来，1051—1052年，爱德华遭到当时最为强大的贵族——韦塞克斯的戈德温伯爵（Earl Godwin）的挑战。尽管内战并未爆发，但爱德华缺少子嗣，注定了他的王朝难以为继。1066年，在他去世后，继承权问题引发争议，爱德华的亲戚诺曼底的威廉公爵（Duke William of Normandy）与爱德华的姐夫、戈德温伯爵的长子韦塞克斯的哈罗德伯爵（Earl Harold of Wessex）争执不下，同时挪威国王“无情者”哈拉尔（Harald Hardrada）也提出了要求。在本该成为又一个“三王之年”（如1483年和1936年）的这一年，哈罗德最终获得了大部分英格兰贵族的支持，并在爱德华此前的钦定下成为继任者。

然而，威廉和哈拉尔却不肯就此作罢。针对威廉的蠢蠢欲动，哈罗德将军队部署在南部海岸。然而率先发难的却是哈拉尔，他率军在约克附近登陆，于9月20日在富尔福德击败当地守军。但哈罗德也不甘示弱，立即挥师北上，在9月24日于约克城外爆发的斯坦福桥战役中突袭得手，杀死了哈拉尔。然而4天后，威廉在南部海岸登陆。哈罗德又立即南下，两军于10月14日在黑斯廷斯狭路相逢。

这是一场在两支精锐部队之间爆发的遭遇战。尽管诺曼人在弓箭手和骑兵方面占据关键优势，但究竟鹿死谁手其实很难判断。不过最终，人数上占优的英格兰军队在山脊建立起的盾牌防御阵地，被诺曼人真实或佯装撤退时发动的袭击打乱。英格兰军队的阵地随即被冲开。

哈罗德的战死成为转折点，既使得诺曼军队完成了这场战役中的致命一击，又确保了战役的结果。在这场战败导致英格兰军队节节败退的趋势下，威廉迅速向伦敦推进，成功登上王位，加冕为威廉一世，并以“征服者威廉”的名字被载入史册。当英格兰人在威斯敏斯特的修道院教堂欢庆新国王加冕时，教堂外的诺曼军队却始终警惕着叛乱的发生。他们过度的反应导致几座建筑物被烧毁，一些旁观的市民被杀。这说明此时的局势仍然高度紧张。

公元1066—1200年

诺曼人统治之后，英格兰也随之诺曼化。来自欧洲大陆的强权政治、社会、教会和文化新气象活跃在新政权的阴影之下。英格兰人的反抗不断被镇压，北方的情况尤为惨烈，1069—1070年，作为对一次叛乱的回应，北方叛军遭到“清剿”。最后一次大规模叛乱发生在1075年。此外，为巩固新秩序，许多城堡被建立起来，其中就包括了后来成为伦敦塔的白塔

（White Tower），泰恩河畔建立的新城堡（new castle）则成为后来的纽卡斯尔（Newcastle）。诺曼帝国早期的城堡多为土木结构，工期较短（虽然日后还花了许多时间来修缮），能够有效地镇压当地的不满情绪。不过也有些采用了石材建造。城堡设计的初衷往往倾向于宣示主权，向当地社会宣告新权威的到来，同时也象征着新的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等级次序。威廉一世（1066—1087年在位）还保留了埃塞克斯和诺丁汉等郡县（包括伦敦）的旧城堡，将它们纳入其王室政权框架之下。

新的土地秩序的原则，是王室将土地授予诸侯，然后从后者那里换取军事服务。诺曼领主有义务根据自己名下庄园的规模，提供相应数量的骑士（他们既可能骑马作战，也可能充当步兵）为王室效力。历史学家将这种制度描述为封建制，尽管当时并没有人用这样的术语来称呼它。封建制度看似与以往的土地制度大相径庭，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与之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方式仍有共通之处。此外，土地和贵族地位的授予，也是对担任公职和提供军事援助的回应。

内容详尽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 1086—1088）的问世，是英格兰君主首次尝试对全国范围内的土地财产所有权及其价值进行清查，成为王室权威及其权力的一大佐证。这份文件参考了当地人的证词，以及诺曼征服前当地行政长官开出的土地所有权文件。因此，《末日审判书》可以看成是从口述证据到书面文件证据的一大步跨越。在这一发展中，遗嘱的出现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859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热衷于现代化的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年会的开幕致辞中还提到了《末日审判书》。

新的教会秩序也开始施行。坎特伯雷大主教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威廉的重要顾问兰弗朗（Lanfranc）。然而这种革新的影响，却由于教会和修道院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减弱，正如土地问题上，诺曼贵族通过跟英格兰人通婚，建立起新的联系一样。教会文化也有类似的发展，例如兰弗朗提拔了僧侣坎特伯雷的奥斯本（Osbern of Canterbury），此人曾是1012年被丹麦人杀害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圣艾尔夫赫亚克（St Alphege）的门徒。王室政府可以照顾到英格兰人的情绪，入乡随俗远比破旧革新事半功倍。

与镇压英格兰人反叛的相对顺利不同，诺曼上层的矛盾导致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其中包括贵族与贵族之间、贵族与王室之间的矛盾，而最严重的要数王室内部的明争暗斗，尤其是斯蒂芬国王（King Stephen, 1135—1154年在位）统治时期爆发的内战。在普遍渴望得到帮助的情况下，强势的国王才能赢得

贵族的尊重，从而压制和击败反对者，维持一个稳定的政权。威廉一世和他的次子威廉二世（William II，1087—1100年在位），以及最小的儿子亨利一世（Henry I，1100—1135年在位）皆是如此。三人都把精力放在巩固自身以及强化自己在法国的势力上。亨利于1106年在诺曼底击败了自己的大哥、诺曼底公爵罗伯特（Robert），从而使英格兰和诺曼底再度统一。

与此同时，英格兰国王也开始在英国谋求更大的权力。他们一方面试图巩固对北部的控制，一方面也有意增强自己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威慑力。威廉二世是个骁勇善战的国王，他亲自率军征服了卡莱尔（Carlisle）地区。但随后，他在新福里斯特（New Forest）中箭身亡，这可能是狩猎过程中的一个意外，但也不排除暗杀的可能。

虽然1072年威廉一世率军北上，迫使苏格兰的马尔科姆三世（Malcolm III）为占有洛锡安的土地宣誓效忠，但苏格兰实际上仍保持着独立。诺曼人并没有对苏格兰发起征服，但开明的苏格兰国王，尤其是大卫一世（David I，1124—1153年在位）却主动加入到诺曼化的进程中，鼓励诺曼贵族移民苏格兰；诺曼人的军事机器——骑士与城堡，则成了苏格兰国王扩大王权的基础。大卫铸造了第一枚苏格兰硬币，并按照盎格鲁-诺曼模式组织起中央政府。苏格兰也与英国其他地区一道，迎来了一个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黄金期，这为基督教的传播、国家的发展，以及国家主导的战争进行提供了充分条件。

政府发展的重要一步发生在亨利一世统治时期。王室司法活动的扩大开始与国家财政的发展相适应，后者定期有条不紊

地为王室征税，同时控制开支。书面记录变得更加普遍，这对政府的发展及其协调性意义重大，而它本身则需要一个稳定的执行基础。这一进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训练有素的专业行政人员的出现。这些“廷臣”^[4]大多是出身低微的“新人”（new men），为出身高贵的贵族所不齿。这样的社会流动机制，往往被追求更有效、更强大运作效力的政府和新体制反复利用。

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要涉及英国国内控制权的争夺。苏格兰国王试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高地、加洛韦和列岛地区，而英格兰国王也试图在威尔士开疆拓土，同时还有意在法国寻求更大的领土范围和控制权。从1154年亨利一世的孙子亨利二世（Henry II，1154—1189年在位）作为金雀花王朝（在法国被称为安茹王朝）的第一个国王登基开始，英格兰诺曼统治者的利益便得到了扩大。亨利二世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其母亲，即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她嫁入了法国的安茹家族。随着亨利一世的儿子在英吉利海峡的一次海难中丧生，她成了亨利一世唯一的子嗣。但她要求继承权力的请求遭到威廉一世的外孙斯蒂芬（Stephen，1135—1154年在位）的反对，于是导致了一场惨烈的内战。虽然玛蒂尔达的军队在1141年的林肯战役中生擒了斯蒂芬，但双方都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王室政府陷入混乱，部分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这场战争最终以斯蒂芬接受玛蒂尔达儿子的继承权告终，在他去世后，亨利二世即位。

连年征战使得王室付出了沉重代价。王室诉求的膨胀，凸显出影响法律与政府的一个核心问题，即王室意志与合法秩序

之间的矛盾。战争支出作为一个问题，在政府政策和发展方向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驱动作用。解决问题的需求渐渐盖过了按部就班的改革思路。

与此同时，在12世纪，盎格鲁 - 诺曼身份认同得到确立，并开始延续。英格兰性和不列颠性并未因此衰落，反而成为光荣的当下不可忘却的基础。这种历史观很大程度上是由跟盎格鲁 - 撒克逊时代英国有个人联系的教士构建的。可能是在1091年从法国来到英国的教士达勒姆的西米安（Symeon of Durham），写了一本小册子——《论达勒姆教会的起源与发展》（Tract on the Origins and Progress of this the Church of Durham），强调了盎格鲁 - 撒克逊时期的历史，还回顾了当时包括比德在内的一些作家。赫克瑟姆（Hexham）一位牧师的儿子艾尔雷德（Ailred, 1109—1166），曾担任熙笃会（Cistercian）在里夫斯比（Revesby）和里沃兹（Rievaulx）的新修道院的院长。他先后为比德曾称颂过的诺森布里亚伟大圣徒圣卡斯伯特（St Cuthbert）——他的遗体于1104年被正式迁入在达勒姆新建的、风格大胆的诺曼大教堂——以及英格兰唯一被封圣的国王“忏悔者”爱德华撰写了悼文。爱德华的遗体也于1163年被隆重地迁入威斯敏斯特教堂。

和对修道院及教会历史的强调一样，对圣徒的崇拜，也必须要与盎格鲁 - 撒克逊的历史看齐。教会不仅为英格兰提供了国际事务中的成员资格，以及以主教辖区、执事长辖区和教区为单元的国家结构，还带来了促进地区和国家认同感的手段。在历史学家中，坎特伯雷的艾德默（Eadmer of Canterbury）

和伍斯特的约翰（John of Worcester）都拥有纯正的英格兰血统，而奥尔德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则是半个英格兰人。

12世纪初，出现了一些对诺曼人先前历史的追溯，意在强调现任国王并不只是跨越海峡实现了征服，他同样也拥有英格兰身份。在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约卒于1155年）的作品中，盎格鲁-诺曼帝国也参与到英格兰的历史中。他在《不列颠诸王史》中（*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约成书于1136年）中追溯了特洛伊的埃涅阿斯（Aeneas of Troy）的孙子布鲁图斯（Brutus）建立不列颠的说法，并着重叙述了亚瑟的传说。亚瑟的父亲在当时被认定为君士坦丁的后裔，还一度征服了法国和罗马。

由于在法国占有领土，还在爱尔兰取得了一番功业，此时亨利二世统治的疆域比任何一位前任丹麦国王都要广大。在亨利的统治下，政府对君主个人的依赖性有所下降，同时司法执行和王室收入状况也有所改善。后面两点的实现，主要依赖于王室的举措，通过制度进行表达，再由王室的巡回法官（在全国各地巡回）负责具体落实。普通法的力量越来越大，进一步巩固了英格兰这个以欧洲的标准来看非常同质化的国家。重视法律是增强公共权力的一种方式，对扩大英格兰的治理广度也大有裨益。领主们行使其影响力，也要通过继承自古英格兰王国的百户及郡县公共法庭制度，而非私人司法权。这成为政治、地理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基础，人们不会对政府嗤之以

鼻，自然有利于确保政府的影响力，政府的发展也有了动力保证。

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一般情况下，事情总是存在不止一种解释方法。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亨利和其他君主对自己在法国领土控制权的关注。英格兰人往往需要为这项开支买单，有时还要应付君主缺席的状况。而从结果上看，尽管王室权力被赋予了为国王补缺的功能，但古英格兰王国的行政发展却也得以恢复，尤其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公共权力，这一点要比法国更好。法国政府不过是一个由贵族势力组成的联合体，国王的势力位列首席。而英格兰却不会出现这样的分庭抗礼。

英格兰的法律也为世仇争端的解决提供了途径，因此它也对王室垄断暴力，以及利用公共司法途径解决私人争端至关重要。致力于控制与惩罚的王室权威占了上风。法律和司法都成了政府的定义和手段。这既是长期以来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斯蒂芬统治时期无政府状态的回应，还对以复仇和暴力为主要态度和手段的社会现实表明了立场。法律拉近了中央和地方的距离，使司法的应用变得日常化、专业化。从12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地方的作用得到了加强，更多的指控开始由地方陪审团提出，而非王室官员。于是强调陪审团作用的普通法应运而生，令官方和社会都从中受益。

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的争执，反映了国王维护政府利益反对教会的决心，而贝克特——他本是一介宠臣，平步青云当上了坎特伯雷大主教，但因触犯圣怒丢了性命——却一心希望保护神职人员的司法地位，尤其是他们

向教皇法庭上诉的权利。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6世纪的新教改革。1170年，亨利的一番怒言令他的四名骑士在坎特伯雷大教堂杀死了大主教，这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贝克特在1173年被追认为圣人，对他的崇拜既提高了坎特伯雷的地位，也令相关的圣人传记不断问世。相关的作家，尤其是本尼迪克特（Benedict）和坎特伯雷的威廉（William of Canterbury），充分体现了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人们对过去的改造可以到何种地步。贝克特迅速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圣人，他的墓地也成为朝圣者的目的地。杰弗里·乔叟

（Geoffrey Chaucer）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成书于约1387年及以后）中记录了这一朝圣之旅的长期吸引力。后来被称为“狮子”的苏格兰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Scotland，1165—1214年在位），死后葬在阿布鲁斯修道院（Arbroath Abbey），这个修道院正是他为纪念贝克特而建的。贝克特还代表了反对暴政的神圣性，这一思想也成为英格兰政治的一部分。

亨利与贝克特的争执不仅讽刺地展现了两大权威之间的竞争，还展示了官僚程序与个人意志之间的紧张关系。随着信息的生产和保存越发广泛，官僚程序也被越来越多地记录下来。从12世纪中叶的《财税卷宗》（Exchequer Pipe Rolls）和13世纪初的《大法官机密卷宗和专利卷宗》（Close and Patent Rolls of the Chancery）都可窥一斑。税收清单可以提供数据，但汇编、整理数据，给政府带来了必须加以克服的问题。如14世纪将居住区域划分为村落就对税务评估非常重要。虽然政府的官僚程序发展经历了一段时间，但这些程序渐渐变得固

定和重要。16世纪，即所谓“都铎政府革命”时期的政府结构，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13世纪与14世纪

在强调法律和司法的同时，王室也可以变得专横。政府的强制权力不断加强，使其成为实现暴政的有力工具。这是霸道的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就已经出现的问题，同样也有助于解释他的儿子约翰王引发的巨大不满。约翰同样为人霸道、令人生厌，但最重要的是，他没能赢下任何功绩。他缺乏自己的兄长“狮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 I，1189—1199年在位）那样的号召力，尤其是在军事才能方面。理查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英格兰更广泛地融入基督教世界中的有力例证。他在十字军从伊斯兰领袖萨拉丁（Saladin）手中夺取阿卡城（位于今天的以色列）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还亲自在战场上击败了后者；但他并没有趁势夺回被萨拉丁征服的耶路撒冷。

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归来的途中，理查一世被神圣罗马帝国扣押，后者要求英格兰方面缴纳高额赎金，由此导致了苛刻的税收评估，所有宗教和世俗的财产的四分之一都被要求上缴，进而引发了1196年以威廉·菲茨·奥斯伯特（William Fitz Osbert）为首的城市贫民的反对。理查的首席司法官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认为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命令军队围剿躲在伦敦齐普赛街（Cheapside）上的圣玛莉里波教堂里的菲茨·奥斯伯特等人，随后将他及九个追随者一并绞死。

“软剑”（Softsword）这个称呼，充分表明了约翰糟糕的名声。他在海外的惨败，包括1204年诺曼底被法国的腓力二世

(Philip Augustus) 征服，令王室威望和财政状况都遭受了巨大打击。这使得国内的约翰反对者们有机会发起行动。1215年，约翰被迫接受了后来被称为“大宪章”的条约。这份自由宪章对约翰动用封建、司法和其他政府权力的不当行为加以谴责，并对王权进行了界定和限制。实际上，《大宪章》是一份洋洋洒洒的清单，罗列了约翰的种种过错，尤其是对司法观念的冒犯，以及王室专横的行动。进而，通过《大宪章》，贵族们的自由得到了保护，自由民也获得了一些保障，可以免受王室任意行事之苦。王室不可再单独决定自己的权利，《大宪章》主张将王权置于法律框架之下。

1215年6月15日，《大宪章》在温莎附近的兰尼米德的签署，可以看作是新政治制度与君主制实践的新法律框架的媾和仪式。《大宪章》实际上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它在国王和法律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从而解决了国王该如何受法律约束的问题。《大宪章》的第40条写明，任何人不得违背、拒绝和拖延司法公正的执行。因此，《大宪章》也就拥有了象征意义，它被视为英国历史上重要的宪政文件和解决方案，屡屡被认为政府权力出现滥用问题的反对者援引，尤其是在13世纪和17世纪。

将王权置于法律框架之下的这一原则，在约翰的儿子、继任者亨利三世（Henry III，1216—1272年在位）那里便得到了贯彻。他被摄政的时期（1216—1227年）对于将同意原则作为政府行为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时期，《大宪章》成为法律的精神内涵：实际上，它在1225年重新发行，但并不是

1215年的那一版，而是1217年（它正是在此时得名）的版本。这份原本逼迫约翰签署的文件，去掉了其中最具攻击性的内容（大部分是针对约翰的），并作为新国王的礼物免费发放。但随着亨利的被摄政期结束，他的威望便因对法作战失利蒙上了阴影，同时他也被质疑为政不善，尤其是纵容王室宠臣对自己施加影响而受到非议。

为了让王权的执行符合自己的预期，许多贵族试图从亨利手中夺取权力。1258年，一个贵族集团获得了政府的控制权，开始推动改革，尤其注重遏制王室权力滥用方面。这一系列改革决议被称为《牛津条例》（Provisions of Oxford），旨在重新团结社会力量，贵族会议对议会负责。1258年，具体的改革内容以英文、法文和拉丁文公之于众。

但贵族改革者们之间的争执，给了亨利重夺政权的机会。他在1261年成功夺回主导权。但西蒙·德·蒙德福特（Simon de Montfort）拒绝接受这种局面。1263年，以他为首的贵族集团率先发动叛乱，决心恢复《牛津条例》。蒙德福特控制了伦敦，但未能阻止内战爆发。1264年，贵族军队在刘易斯（Lewes）击败并俘虏了亨利三世。然而，1265年，德·蒙德福特却又在伊夫舍姆（Evesham）被亨利三世的儿子，即后来的爱德华一世（Edward I，1272—1307年在位）击败。亨利复辟成功。

在苏格兰，君主维持自身利益比较成功，没有出现内乱或宪法斗争。此外，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末，他们成功地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从中部低地扩大到加洛韦、莫雷（Moray）、

阿盖尔（Argyll）、罗斯（Ross）、凯斯尼斯（Caithness）和西部群岛（Western Isles）。得到发展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凝聚力。随着王室中心地带的种种社会活动扩散到其他地区，“苏格兰”这一概念越发得到强化。此外，独特的苏格兰教会形成，也对民族认同感起到了很大帮助。

亚历山大二世（1214—1249年在位）与英格兰方面反对约翰的贵族结盟，后者承认了苏格兰对诺森伯兰、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的主张，而当时有意与亨利三世争夺继承权的法国王子路易也承认了这一主张。1216年，亚历山大向南进军，最远抵达了多佛（Dover）。然而，随着亨利在林肯击败了法国军队，他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权威，打击了法国人的企图，还削弱了亚历山大的势力。1217年，亚历山大与亨利议和，放弃了自己的主张。1237年签订的《约克条约》确认了这一点。随后的二三十年代，亚历山大专注于苏格兰境内的战争，把王室控制权扩展到阿盖尔、罗斯、凯斯尼斯和加洛韦。

亚历山大三世（1249—1286年在位）统治期间，苏格兰坎莫尔王朝（Canmore dynasty）的势力达到顶峰。但由于后继无人，王位只能由三岁的“挪威少女”玛格丽特一世（Margaret I）继承。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已经通过1277—1282年的征战征服了威尔士北部，终结其独立。他认为这是个解决政治问题的机会。1289年，根据《索尔兹伯里条约》（Treaty of Salisbury），玛格丽特将与未来的爱德华二世结婚。苏格兰方

面的权利和法律会得到保留。从本质上说，这可以看作是1603年王室联合的预演，但1290年，玛格丽特却意外离世。

爱德华一世随后试图直接统治苏格兰，但因为和他自己选择的苏格兰国王约翰·巴里奥尔（John Balliol）反目而受到抵制。作为一个天生的独裁者，爱德华同时还在担心苏格兰人会跟法国人联手。苏格兰的抵抗^[5]在1296年和1298年福尔柯克战役后被挫败。然而，1291—1292年间王位竞争者之一的孙子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在1306年发动叛乱，加冕成为罗伯特一世（Robert I, 1306—1329年在位）。起初，爱德华一世的军队占据主动，但随后即位的爱德华二世（Edward II, 1307—1327年在位）对苏格兰并不关心，罗伯特因此节节获胜，夺回了苏格兰大部分区域。1314年，他在斯特林城外的班诺克本击溃了爱德华二世的军队。1318年，主要的边境要塞伯威克（Berwick）落入苏格兰人手中。

1320年的《阿布罗斯宣言》（Declaration of Arbroath），宣告了苏格兰的独立。这份宣言是一封致教皇的信，信中追溯了苏格兰独立的古老渊源。这封信也出现在今天的爱丁堡新博物馆入口，这个博物馆极力试图降低英国在苏格兰历史上的影响。1328年，根据《北安普顿 - 爱丁堡条约》（Treaty of Northampton - Edinburgh），苏格兰的独立和罗伯特的王权都得到了承认。

但这些成果迅速受到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 1327—1377年在位）和爱德华·巴里奥尔（Edward Balliol）的挑战。作为苏格兰王位的候选人，巴里奥尔于1332年起兵，并

1333年以牺牲年轻的大卫二世（David II，1329—1371年在位）为代价夺取了王位。1334年，巴里奥尔代表自己的王国，向爱德华三世致敬，后者在1333年为他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援助。然而，巴里奥尔却无力维持统治。1341年，大卫从法国避难归来。

与苏格兰的纠葛被归入到与法国的冲突当中，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对法作战掩盖。由于在被称为“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的漫长战事初期阶段的胜利，爱德华三世从1340年开始对法国王位提出主张。这一主张一方面是法国王位更迭所出现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对爱德华三世的安茹王族先人，尤其是亨利二世曾经拥有的领土的主张。尽管凭借长弓手的优势，英军在克雷西（Crécy，1341年）以及波伊特（Poitiers，1356年）两度奏凯，但爱德华也发现决定性的胜利迟迟无法到来。同样，尽管1346年，英军在达勒姆附近的内维尔十字（Neville’ s Cross）地区战胜了前来进犯的大卫二世，并将这位站在法国阵营的苏格兰国王一直囚禁到1357年，但也未能实现对苏格兰的实际控制。

爱德华一度打算通过1360年的条约^[6]来保住自己在法国的胜利果实，但此举并未奏效。1369年，战事再起。到1375年，他手里只剩下几个沿海基地，主要是加来（Calais，经过1347年的围攻之后夺取）以及法国西南部的几个据点。

战争，尤其是在不成功的情况下所导致的代价，让统治者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其中很多纠纷都是关于贵族对王室的赞助问题。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的情况尤其如此，他是

一个缺乏自信的君主，也从未获得他人的认可，对赞助权问题处置不当，导致很多贵族都对他敬而远之。1297年，英格兰便爆发过一次重大政治危机，爱德华一世的高额战争税要求受到贵族们的强烈抵制。而1311年，爱德华二世则被迫接受了对自己权力进一步限制的法令。他的宠臣皮尔斯·加韦斯顿（Piers Gaveston）被贵族们视为眼中钉，于1312年被他们处死。1318年，爱德华与贵族之间的纠纷，在其大权在握的堂兄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主导下，以《利克条约》（Treaty of Leake）暂时得到解决。他被迫接受了议会的管制。1319年，爱德华二世再次在苏格兰栽了跟头，而1321年，由于支持野心勃勃的德彭斯父子，爱德华二世再次招来了内战。兰开斯特伯爵起初占据优势，但1322年，爱德华的势力开始复苏，在巴勒布里奇（Boroughbridge）战胜了兰开斯特伯爵，随后将其处死。

但随后，爱德华在苏格兰和法国继续一败再败，进一步加剧了贵族对独断政治和苛捐杂税的不满。1326年，被爱德华疏远的妻子伊莎贝拉在低地国家的埃诺特伯爵（Count of Hainault）的支持下起兵反攻英格兰。政府随即崩溃，爱德华被俘，他的支持者纷纷被处死。

1327年1月，爱德华二世在议会上被解除王位，不久在伯克利城堡惨死。这不能看作是《大宪章》框架下对王权的约束。实际上，处死爱德华二世，意味着13世纪对国王的约束最终以失败告终。英格兰的王权仍然过于强大，宪法的力量暂时难以与其匹敌。1330年，当爱德华三世推翻了他的母亲伊莎贝拉和情人马奇伯爵罗杰·莫蒂默（Roger Mortimer）主导的政府

时，同样意味着这种控制再次以另一种方式失效。伊莎贝拉被囚禁，罗杰·莫蒂默则在接受议会审判后被处决。

尽管爱德华三世比爱德华二世更有力、更成功，也更受欢迎，但他统治的末期同样充满坎坷，对政府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最终在1376年的“贤明议会”（Good Parliament）上，对政府腐败的抨击和对税收要求的拒斥达到了高潮。而在苏格兰，大卫二世也面临着以罗伯特·斯图尔特（Robert Stewart）为首的敌对贵族的反对。后者后来成功上位，加冕为罗伯特二世（Robert II）。

英格兰和苏格兰议会的发展，反映了人们对这样一种政治实体的需求，无论它的出现有多偶然，都足以成为国家政治的焦点。这种需求，实际上是国家——而非地方——政治认同感具有更大吸引力的产物。在英格兰，议会的发展是和平与稳定所需要的微妙的政治契约的一部分，它需要在原本贵族的国王议会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大宪章》中并没有提到议会，这个概念直到13世纪30年代才出现，但《大宪章》可以看作是议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议会是通往宪政的一条路径，实际上要比君主立宪更加有效。

《大宪章》的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尤为重要。第十二条规定，未经共同协商，国王不得征收兵役费（以钱代兵）或援助费（税），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罗马法的格言，即涉及所有人的事务，应该得到所有人的认可。第十四条则规定，税赋需从大佃户和小佃户处获得的，需要由地方治安官负责召集宣讲。实际上，这些条款都表明，如果未经同意，国家便不得征税。这

些条款在重新颁布的法律中被遗漏了，但同意权的概念已经作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在当时深入人心。

亨利三世统治时期，郡骑士开始通过选举进入议会，而从1265年起，选定城镇的代表也可以参与议会讨论。在1295年召集神职人员、郡县和自治市镇代表参加议会的令状中，代表的概念被重新界定：他们代表他们所在的社区出席会议，有权提供建议、参与表决。与之对应，贵族代表的则是他们自己。

在14世纪，议会的作用扩大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需要为战争敛集税收。与法国和苏格兰的长期对峙、部署守军，包括在克雷西的3万多人，意味着需要比以往更多的税收。征税的理由是“共同利益”，这成为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英国秉持的一种长期模式：由国家的庞大需求与议会对批准税款和借款之间的分歧所造成的国家贫困。征税的需求需要与平冤昭雪和巩固个人自由进行交换。因此，1362年的《供应法案》（Statute of Purveyors）将王室滥用权力的行为——强制购买供应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同理，1672年，《人身保护法》

（Habeas Corpus Act）对审前拘留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因此，宪法和权利的确立成为维护议会主权的议题，而非像其他国家那样作为基本法出现。这种对议会主权的强调，确保了议会可以以渐进的、连贯的形式推动发展，而非像美国那样建立在一纸创立文件之上。实际上，《大宪章》在美国历史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普通律师，如在17世纪初在发掘《大宪章》全新政治作用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后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北美英国殖民地的

宪章起草工作。1775—1783年对乔治三世（George III）的否决，便可看作是反对约翰这一情节的再次上演^[7]。同样，在苏格兰，议会也是从由主教和贵族参加的国王议会发展起来的，随后各区代表开始获得了定期进入议会的机会。

国家认同不仅得到了议会发展的促进，也得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历史书写的促进。苏格兰方面着重强调自己与英格兰的不同，把重点放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上。在英格兰，对冲突的记录同样在发展国家认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诺曼君主试图继承古英格兰王国王权的历史遗产，这一点也部分依赖于跟教会历史书写者之间的交易。后来的国王们，尤其是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三世，也对这种活动十分热衷，还不乏创新之举。

爱德华三世充分利用了亚瑟王的传奇故事，通过历史的权威性强调自己对骑士思想的欣然接纳。这一点从他在1348—1349年建立嘉德骑士团（Order of the Garter）以及建立圣乔治学院（College of St George），为温莎城堡的皇家教堂提供服务便可看出。这个皇家教堂被重新献给了圣乔治，爱德华选择他作为骑士团的守护神。这种将圣人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自然是为了带来声望与荣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白魔法”^[8]。

但1290年，爱德华一世下令驱逐英格兰的犹太人社区，则可以看作是增进国家认同手段的另一面。1130年起，英格兰便出现了犹太人社区，容纳的移民可能来自诺曼底的鲁昂（Rouen）。然而，犹太人资助王室和其他领袖人物方面的表

现，却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这最终演变成了暴力，在1189年的伦敦和1190年的约克先后发生了屠杀事件。随后，公众对犹太人的敌意明显增加。直到17世纪50年代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上台，政策才有所改变。

在苏格兰，热衷于表现苏格兰是一个拥有自己历史的独立国家的作家们，有力地肯定了苏格兰的国家认同。约翰·巴尔伯（John Barbour）于1375年用苏格兰语创作的诗歌《布鲁斯》（Brus）是一部以罗伯特·布鲁斯为主角的民族史诗。而在14世纪80年代，约翰·福尔敦（John Fordun）的《苏格兰人民纪事》（Chronicle of the Scottish People）则延续了这一主题。

对原型民族主义、议会和国家政治的强调，为这一时期提供了一个颇具现代性的基调，尤其是围绕这一时期发展和进步所展开的思想与主题研究。这一做法抓住了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忽视了他主题，尤其是教会的重要作用。教会对身份认同发展的影响具有其独立性。

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国际身份，其一系列发展也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具有国际性（由法国人领导）的克吕尼（Cluny）和熙笃修道院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表现。同样重要的是在12世纪由教皇主持，在欧洲大陆形成的教会法规。这与英格兰教会在面对整个教会时，相对于大陆教会议会的弱势有关。英格兰的大学，以及稍后苏格兰的大学的建立，都是国际性知识进步的一部分。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顿（Stephen Langton）从1207年到1228年一直在巴黎大学学习和任教。他在

导致《大宪章》签署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大宪章》的内容里，他对于《旧约》中“昏庸国王”的论述也有贡献。

赫里福德的《世界地图》（Mappa mundi）生动地体现了当时人们对教会的看法。该地图的复制品在赫里福德展出，制作于1290—1300年，是教士理查德·哈尔丁汉（Richard Haldingham，卒于1278年）绘制的地图中的一件。这幅地图的顶点处是审判日端坐着的基督，位于地图边框之外。基督高于创世是确定无误的，其目的与性质于上帝而言是明确的，但人类只能部分地理解。而作为创造的象征，圆圈里囊括的则是人类全部的短暂活动。地图中使用了盎格鲁-诺曼语和拉丁语，这表明它所提供的信息既是给教友的，也是给神职人员的。在这个时期的英格兰，信仰仍是一种需要在散落于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教堂里登记注册的行为。新修道院和教士团建立对人们的影响，可能跟国王的行为一样重要。

在强调变革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这一时期的英国仍是乡村化的。旅行，尤其是陆路出行十分困难（因此，沿海交通要便捷许多，人们出行也更多）。交通问题令大多数人只能待在自己的街区，黑暗、潮湿和寒冷都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地形，和人们生活本身的拮据与焦虑一道，使距离问题的影响进一步加大。尽管到13世纪，人们生产的粮食中有三四成进入市场，但这仍导致全面农业生产的需求相当大，到19世纪末，甚至直到今天，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因此，土地具体的

使用模式，远比所谓“高地牧场”“低地耕地”的说法更复杂，也更具依存性。在高地地区，谷物作为一种自给自足的作物，只能被少量种植，体现了农业的困难性。牧场地区的特点是人们分散而居，经常以孤立的农庄为单位。耕地地区人口较多，有核心（村庄）聚居区。

在单个农庄或村庄的层面上，人们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这对于今天的农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这种自力更生反映了在冷藏技术与机动车出现之前的年代，农作物的保存与运输都非常困难，但也体现了非常地方化的交换系统在当时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这种自给自足与地方依存，要比通过比较利润率划定的现代专业化生产更具经济效率。

14世纪的经济环境较之以往恶化了许多。此前诸多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农业和人口方面，一同构成了整个社会更为广泛的变化。在整个欧洲，自10世纪以来支撑社会发展的人口和经济扩张已经结束，而这种扩张导致耕地面积通过牺牲森林、沼泽和荒野的情况明显增加。人口增长也导致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活动增多，社会结构进一步扩大：新的城镇、村庄、道路、桥梁和市场不断涌现。

这一进程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可以看到，并且体现在货币经济的传播过程中。13世纪流通货币的数量明显增加，有人认为当时的流通货币量已经达到11世纪的20倍。货币广泛使用促进了贸易，推动了信贷，还鼓励了人们的经济机会意识与社会流动意识。教会也参与其中，修道院纷纷清理未耕种的“荒地”，生产出售商品——尤其以方廷斯（Fountains）修道院和

廷特恩（Tintern）修道院等为代表的熙笃会羊毛生意。从12世纪起，英格兰的羊毛出口量开始显著增加。1334年的平信徒补助金税务评估显示，按照单位面积，英格兰最富裕的五个郡依次是米德尔塞克斯郡、牛津郡、诺福克郡、贝德福德郡和伯克郡，它们都位于东南地区。

从12世纪晚期开始，英格兰境内主要交通路线上的浅滩处都建造了桥梁，桥梁也越来越多地架设在石拱上，并且可以承载马车通行。发展中的固定交通路网有助于形成全国性的运输系统。商业信贷对这个系统的建成至关重要。

然而，经济增长和人口扩张都走到了尽头。最戏剧性的一根稻草来自黑死病。1348—1351年，英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黑死病，这严重破坏了经济活动和公共财政，并可能导致人们对生存本身失去信心。苏格兰和威尔士从1349年开始受到冲击，不过由于人口密度较低，它们受到的影响可能不太严重。就像1315—1317年，由于恶劣天气造成歉收而产生的大饥荒（Great Famine）一样，瘟疫确实使得人口锐减，但无论如何，此时的人口水平已经面临瓶颈。早期资源扩张的影响显而易见：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农业扩张的进程。瘟疫在1361年、1369年、1375年以及随后的年份里接连爆发。到14世纪70年代，伦敦（包括南华克和威斯敏斯特）的人口可能减少了一半，只剩下约4万人。

黑死病也使得劳资关系变得紧张，人们开始试图控制劳动力，因为瘟疫使劳动力变得稀缺。这样的举措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压力，而为了资助对法作战而征收的人头税则使得压力进一

步增加。1381年的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标志着压力达到了顶点，或者我们干脆可以称呼这一事件为“大起义”，因为起义者并不只有农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城市元素。除生活艰难以外，起义的原因还包括下层人士的期望越来越高，从而与政府和地主阶级的压制性政策产生矛盾。实际上，佛罗萨尔特（Froissart）便对英国下层阶级的富足状态做出过评价，认为造成叛乱的原因是“英格兰平民的安逸与富裕”。

当时英格兰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起义，但混乱主要集中在首都地区。示威的农民占领了伦敦，攻进伦敦塔，杀掉不受欢迎的大臣，尤其是负责征收饱受诟病的人头税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兼大法官萨德伯里的西蒙（Simon of Sudbury）。叛军希望废除农奴制，同时还把矛头指向外国人。他们无意建立新的政府制度，而是向年轻的理查二世（Richard II，1377—1399年在位）施压，强迫他改变政策，以符合他们心目中的良好王政。

1381年6月15日，随着危机的持续，理查来到伦敦城下的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与领导叛军主力的瓦特·泰勒（Wat Tyler）会面。会面期间，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思（William Walworth）认为理查有性命之虞，于是上前刺伤了泰勒的脖子，接着国王的一名骑士刺穿了泰勒的腹部。机智的理查宣布他将代泰勒行叛军领袖之职，答应他们的所有条件，从而避免了暴力升级。农民们认为大功告成，于是打道回府。但理查很快撕毁自己的承诺，幸存的叛军头领纷纷遭到迫害。

这次起义显示了英格兰社会民众与政府的严重疏离，这一点与苏格兰的叛乱截然不同。

理查二世成功解决了农民起义危机，但他还要面对充当少数派的贵族们的反对。理查试图克服反对意见的举措，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腥风血雨与不稳定性，凸显了他的专制倾向。在理查统治时期，权力的表象与实质并不匹配，而对法作战的失败进一步降低了他的威望，这使得理查统治的危机进一步加剧。1399年，叛乱爆发，先前被理查剥夺继承权的表兄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将理查俘获，迫使其退位。前者则加冕为亨利四世（Henry IV，1399—1413年在位）。

这场政变反映了爱德华三世众多后裔之间的争斗所带来的王朝和政治问题。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都是王族的重要支系，而理查二世则是爱德华长子的儿子。爱德华的长子即“黑太子”爱德华，在1356年战胜法国人的普瓦捷战役中居功至伟，但不幸比他长寿的父亲更早去世。1400年，理查二世在他先前就曾被囚禁的庞特福克城堡（Pontefract Castle）死于非命，从而免除了新诞生的兰开斯特王朝的后患。

就这样，14世纪在重重危机中落幕。人口和经济上遭受的打击使农村人口锐减，乡村凋敝，其中一些村落的破败遗迹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这一时期的变化，比18世纪的圈地运动、19世纪末的全球粮食生产竞争，或是20世纪下半叶大规模机械化都要巨大。这种变化的影响也更为显著，因为相对而言，在经济和人口方面，这一时期的农村社会比起后来要更加重要。

此外，在14世纪90年代和15世纪初英格兰在法国屡遭败绩的同时，威尔士也爆发了反英大起义，即欧文·葛兰道厄起义，而苏格兰则在此时陷入了王室内斗。同时，在英格兰，由激进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Wycliffe，约1329—1384年）引导产生的罗拉德运动（Lollard movement）则对教皇和牧师的地位发起了挑战。1414年，在约翰·奥德卡斯特尔（Sir John Oldcastle）的领导下，曾发生过一次并不成功的罗拉德派起义。这一教派强调权威在《圣经》，而非教会。到16世纪初，罗拉德派专注于伦敦、肯特和诺福克的新教活动。

然而，也有相反的力量出现。在宗教方面，教区被大量划分，有助于确保人们通过信仰获得地区归属感，教堂成为地区身份认同的中心。这种地区认同感，伴随着教堂钟声传递到各个角落，并通过频繁的游行活动来维持。而作为人们婚礼、洗礼和葬礼的固定场所，教区教堂还将人们世代相连。家族传承所依赖的记忆，集中在教堂中。这一角色重要性的升级，有助于解释16世纪新教改革所带来的混乱。

此外，政府和更广泛的政治文化也得到了发展。王室的行政管理变得更加精细，确保日后历史学家可用的记录更加丰富翔实。除了赫里福德的《世界地图》之外，还出现了《高夫地图》（Gough Map），一幅大约诞生于1375年的实用英格兰地图，可能是为了行政用途而作。它提供了一份有效的路线指引，展示了总长度近3000英里的道路。而作为另一维度的记录，计时制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发展。圣奥尔本斯的修道院

院长沃林福德的理查德（Richard of Wallingford, 1327—1334年担任此职）改进了摆动式时钟，发展出了双托盘擒纵装置等功能。他的圣奥尔本斯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报时装置之一。

布匹出口的增长对交通发展、贸易平衡和政府财政都至关重要。议会的发展为政治和政府提供了讨论场所和工具，人们越发把英格兰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

英格兰的本土语言文化进一步兴起，出现了像威廉·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的《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 写于1362—1392年）以及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 约1343—1400年）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约1387年或更晚）这样的文学作品。乔叟是酒商的儿子，1374年成为伦敦港的海关主计长，1389年成为王室工程的主事，负责监督伦敦塔的码头建设。苏格兰也出现了类似的作家，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约翰·巴布尔（John Barbour）。本土语言的使用代表了对随诺曼征服而来的法语文化的拒绝。拉丁语和盎格鲁-诺曼语（或诺曼法语，即英格兰法语）的角色越发淡化。

由于政府机关也鼓励本土语言的使用，如1356年伦敦地方法院的诉讼程序开始采用英语，本土语言的发展得到鼓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社会团结加码，可以作为跨越社会分歧的政治行动的基础。这种行动的意义在于拒绝那些被视为不可接受的权威，无论是昏庸的君主，还是独断的教会。罗拉德派则支持采用英文《圣经》。

在1400年，英国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大国，或是政治发展方面的典范，还尚未分明。法国同样处在两派与君主联系紧密的贵族的撕裂中。这并不意味着英格兰或是苏格兰的情况更好，但也确实体现了一种普遍的不稳定性。而对于少数有幸前往亚洲的欧洲旅行者来说，西欧此时的局限，在与亚洲主要国家（尤其是中国明朝）的对比之下，则显得尤为明显。

注释

[1] 原文如此，疑有误，或为90万年前。参见中国新闻网，《英国发现80万年前人类足迹 脚印来自三至五个人》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2-09/5814512.shtml>)。

[2] 韦塞克斯即西撒克逊王国之意。

[3] Nechtansmere，可能位于今天的斯特拉斯佩（Strathspey）。

[4] curiales，即“宫廷的人”（men of the Court）。

[5] 这一时期，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揭竿而起，率军在1297年的斯特林（Stirling）战役中取得大捷。

[6] 《布雷蒂尼和约》（Peace of Brétigny）。

[7] 指美国独立战争。

[8] 指对人有益处的魔法，与“黑魔法”相对。

第三章 帝国崛起：1400—1750年

1400年，被废的国王理查二世在庞特福克城堡死于非命。1746年，在因弗内斯（Inverness）以东爆发的卡洛登战役（the battle of Culloden）中，为支持雅各布党人（Jacobite，即被流放的斯图亚特人）而组建的苏格兰军队被政府正规军击溃。用接连不断的内战来填满这短短一章实在太过容易。实际上，在这一时期，15世纪有英格兰的玫瑰战争和苏格兰的王朝/贵族战争，16世纪有英格兰各地因宗教改革导致的种种冲突，接着便是1638—1652年英格兰各地的内战。然后是一场我们可以称之为“英国王位继承战”（War of the British Succession）的长期战争，其中大部分战事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进行的。这次冲突的起因是1685年新教徒蒙茅斯公爵（Duke of Monmouth）和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试图推翻詹姆斯二世兼七世（他是英格兰的詹姆斯二世、苏格兰的詹姆斯七世）。蒙茅斯是查理二世（Charles II）的私生子，他对王位提出了继承要求，但最终在塞奇高沼（Sedgemoor）被击败。这场战争的经过可谓一波三折，最后以詹姆斯二世兼七世的孙子“小王子查理”——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在卡洛登战役中被乔治二世（George II）的次子，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威廉击败而告终。这一系列波折在任何政治性记述中都被适当地加重了笔墨，因为它们可以有效地说明事态的发展往往充满不确定性。从根本上说，战争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内战则突出了政治分裂的恶果，而这往往是由于王室方面缺少才能，至少

是运气欠佳造成的。战争还与英国历史上一些重大的长期主题相互影响，如英格兰南部统治权频繁易主，以及对王权的限制。但另一方面，长时段的考察却难以起到作用：战争的不同走向，尤其是反宗教改革的叛乱、17世纪中叶的内战，以及1688—1746年英国王位继承战的不同结局，很可能对这些主题造成限定，或是时段上的缩短。

在讨论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空间尚且有限的情况下，还要去涉及“反事实”或是“如果”式的思考，似乎有些让人恼火。然而，设身处地地考虑过去的人们曾经设想过的可能性，显然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此外，很多政府决策也都是来自过去人们的设想，无论是像亨利八世（Henry VIII，1509—1547年在位）那样热衷于对潜在的叛乱者处以监禁甚至是死刑，还是像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那样，在全国设下随时准备挫败叛乱阴谋的间谍网络，抑或是军事上的筹备。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国际方面的动向。仅仅把焦点放在英格兰、不列颠或是英伦四国（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会导致我们无法将问题放置在欧洲和全球层面进行综合考虑。欧洲层面的重要动向，当然是对英国造成最重大影响的两大变革：新教改革，以及远洋贸易和殖民化的发展。英国在这两大变革之初都没有走在前列。然而，这两大变革对英国的利益以及身份认同的形成都至关重要，而且直接奠定了英国直到20世纪末的定义。虽然这个定义已经随着英国的不断变化烟消云散，但宗教改革和海外扩张的后果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尤其是在英国公共文化的形态，以及与遥远世界的联系方面。

对法战争

鉴于这两大变革都是在16世纪发生的，人们很容易将15世纪匆匆略过。这是一个经济停滞、政治严重分裂、宗教发展亦驻足不前的年代。或者说，这一时期的经济和宗教发展，至少较后来的都铎时期大为逊色。实际上，15世纪的重要性很大程度在于其失败。尤其是亨利五世（Henry V，1413—1422年在位）的失败。他是个好战的王子，当上国王后也本性不改。他试图重申自己的曾祖父爱德华三世对法国王位的主张。亨利并未意识到，他应该把英吉利海峡作为自己权力的边界。虽然他崇拜圣乔治，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五世》（Henry V，1599）也是作为英国人登场，但他本人的夙愿其实是追随自威廉一世以来的所有前任，建立一个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王国。诺曼底似乎比英伦三岛的外缘地区更接近他在英格兰南部的权力中心，也在行动和扩张前景方面更具吸引力。另外，他还背负着光荣的传统，需要进一步光耀自己的名望。

亨利的名望的确在1415年10月25日的阿金库尔（Agincourt）大捷后大大提升。在这场战役中，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长弓手让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法国军队伤亡惨重。此役后两年，亨利着手征服诺曼底。其首府鲁昂于1419年陷落。为平息贵族的不满，软弱无力的查理六世（Charles VI）只得将女儿凯瑟琳许配给亨利，并在1420年的《特鲁瓦条约》（Treaty of Troyes）中将亨利列为自己的继承人。

如果亨利五世可以活得更久，他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但要控制整个法国，显然是个艰巨的任务。最终，他在1422年撒手人寰，死因可能是痢疾，留下了一个不到一岁的继承人。在亨利六世（Henry VI，1422—1461年及1470—1471年在位）统治时期，英国人在法国的领地只剩下加来和英吉利海峡群岛。以查理六世之子查理七世（Charles VII）之名出征的圣女贞德（Joan of Arc）在15世纪20年代末召集法国人抵抗英国，尤其以奥尔良的抵抗行动最为活跃。英军在法国渐渐陷入泥潭，而英国在法国事业最重要的支持者，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约翰也在1435年抛弃了亨利六世。随后查理七世的军队乘胜追击，而英军在福尔米尼（Formigny，1450）以及卡斯蒂永（Castillon，1453）的两次失败则分别决定了诺曼底和加斯科尼（Gascony）的命运。法军的大炮在这两次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加来直到1558年玛丽女王统治时期才最终陷落，对法国王位的要求甚至一直持续到乔治三世（George III）在位时期，而诺曼人最后的遗产——英吉利海峡群岛则始终由英国人保有，法国人已经放弃了。随后爱德华四世、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又接连发兵法国，但他们最终都未能得偿所愿，这对英国国家和政府的发展非常重要，并且有助于凸显英国后来在欧洲身份的孤立性。实际上，英国无法在法国长期维持自己的势力，反倒成了日后其海外野心的基础。

15世纪的分裂

在法国的失败暴露了亨利六世作为国王的不称职，让他成了人们眼中的失败者，而这最终催化了玫瑰战争，即兰开斯特家族（王室正统）和约克家族之间斗争的爆发。这一系列战争始于人们从15世纪50年代起对政府的不满，这些不满包括贵族对王室偏袒的反对，以及凯德叛乱（Cade's Rebellion, 1450）中民众表现出的敌意。这次叛乱也反映了民众行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更广泛的政治世界当中。忠君爱国可能体现在公民仪式当中，但到实践之时却常常失灵。

凯德叛乱的起点是肯特郡，直接原因是对采邑官员敲诈勒索的反抗，根本上则是由于民众对政府的普遍敌意。叛军在塞文欧克斯（Sevenoaks）击败皇家军队，攻进伦敦，杀死不受欢迎的官员。然而，和1381年起义一样，王室赦免摧毁了叛军的凝聚力。失去支持的凯德在伦敦被俘。面对叛乱，亨利一度走为上计，这种临阵脱逃的反应也助长了日后约克方面的信心。

武装反对亨利的宠臣是玫瑰战争的开始。1455年，约克公爵理查德攻击最亲近国王的领主，引发了冲突。在“变态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的发展之下，领主开始每年以金钱而非土地的形式奖励自己的追随者，同时换取他们的服务，这使得英国国内的权力关系和军事力量都发生了动态变化。由此产生的是一种保护关系，由有权势的贵族主导，他们是否愿意养兵，是否有能力为统治者派遣军队就变得非常重要。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会导致国内冲突，但一旦国王与贵族之间，或贵

族彼此间的关系破裂，贵族更容易集中和调配自己的力量。经济形势的恶化加剧了这个问题。白银的大量丧失（其中大部分都被运到了法国，维持战争开销）导致流通货币总量的急剧下降。

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都曾迅速镇压反对他们的势力。亨利四世挫败了强大的珀西家族，先后在1403年、1405年和1408年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亨利五世则在入侵法国前夕挫败了一场叛乱。相比之下，亨利六世对反对派就有些束手无策。他患有精神疾病，无力应对危机，而他的儿子爱德华尚且在襁褓之中。15世纪50年代的危机演变了王朝斗争，1460年约克公爵理查德（爱德华三世幸存的第四个孩子的孙子）加冕，同年即在韦克菲尔德（Wakefield）战败被杀。然而，他精力旺盛的儿子在1461年成功夺取政权，年仅18岁即加冕为爱德华四世。爱德华不久后又在汤顿击败了兰开斯特军，巩固了自己的胜利。这场战役的参战人数可能多达6万人——可能是英国本土爆发的战役中参战人数最多的一场。

爱德华四世之所以能在15世纪60年代初始终压制兰开斯特方面的反扑，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国际背景。法国和勃艮第对兰开斯特的支持成为关键因素。因此，1463年，爱德华与法国的路易十一（Louis XI）进行了停战谈判。路易答应不再支持兰开斯特家族，同时还中止了与苏格兰达成的“老同盟”

（Auld Alliance）。这迫使苏格兰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与英格兰签订停战协议。双方同时商定，都将不再为对方的叛军提供支持。这样一来，苏格兰人也放弃了兰开斯特军。结果孤立

无援的他们在1464年于海德里高地（Hedgeley Moor）和赫克瑟姆落败，亨利六世也在1465年被俘。

然而，当“立王者”（Kingmaker）沃里克伯爵理查因失势而与表弟爱德华反目，转而投奔兰开斯特家族时，约克家族陷入了分裂的泥潭。结果，爱德华在1470年被推翻，路易十一扶持亨利六世再度上位。

这样的结果，导致1471年，爱德华与路易的主要对手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Charles the Bold）结盟。在他的帮助下，爱德华重夺主动权，同年即在巴内特击败了沃里克，在特克斯伯里击败了兰开斯特军，重新登上王位。这两场战役导致沃里克和亨利六世的儿子爱德华毙命；亨利六世本人则死于伦敦塔。爱德华终于在无人反对的状态下安稳地做起了国王，直到1483年去世。

继任者是他12岁的儿子爱德华五世，但这个孩子很快下落不明，可能是在他的叔叔、继任者理查三世（1483—1485年在位）的指示下，在伦敦塔被杀害。尽管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关于谋杀的流言还是让这个暴戾的人威望扫地。这一系列变故造成了无政府的氛围，一个佐证是这一时期，上流人家的家宅通常都有加固的迹象。政治动荡自然不利于良好政治的发展。实际上，玫瑰战争也为各地区——如德文郡——贵族之间的争斗提供了背景，与斯蒂芬统治时（1135—1154年）的内战时期如出一辙。

尽管规模不及英格兰，但苏格兰也处在动荡之中。苏格兰面临的不仅仅是王朝斗争，从1384年起，王室内部便有两个派别开始为控制权大打出手。苏格兰还面临着边境地区的骚乱问题，规模较英格兰更甚。这一问题在12世纪和13世纪就已经成为苏格兰历史的重要主题，但随着与英格兰之间的独立战争的进行，一些强大的豪门，如边境地区的道格拉斯伯爵（Earls of Douglas），其财力和势力都得以大大增强。这个过程显然对王室权力造成了限制。

国王们不得不花大气力重整山河。詹姆斯一世（1406—1437年在位）重新在高地实行强权控制，处死不服从的豪门领袖。但在1429年和1431年，他不得不与更强大的对手——（西部）诸岛领主作战。这一势力在14世纪和15世纪逐渐崛起。詹姆斯二世在1452—1455年间挫败了道格拉斯家族的主要势力，而詹姆斯三世则在1472年夺取了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1476年攻下罗斯。詹姆斯四世乘胜追击，于1493年粉碎了诸岛领主的势力，将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张到了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

即便如此，国王们的日子仍不好过。1437年，詹姆斯一世遭遇政变，政变虽被镇压，但他本人却被刺死在寝宫。詹姆斯三世一直饱受贵族的挑战，1488年，由于无法争取到足够的支持，他在绍奇本（Sauchieburn）被叛军击败后不久就被杀死。随后叛军接管了政府，但次年又被叛乱推翻。

由于经济问题造成的压力，这一时期的英国上上下下都很艰难。黑死病后，人口数量并没有很快恢复，而是进入了一个

普遍停滞的时期。1361—1362年、1369年以及1375年，又有新的疫情爆发。这段时间的停滞使得国内农业和工业市场规模锐减，经济状况迟迟无法恢复。人口的减少也导致了很多人村落荒芜或萎缩，在很多现代牧场仍能看到垄沟的痕迹，显示这里曾经被人类开垦为耕地。大多数市场和集市的交易量都在下降，冲击着城镇生活。长时段的背景则是气候的恶化。随着天气变冷，农作物的生长季节也受到限制，产量随之降低。苏格兰受气候影响格外大。

但与此同时，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使一些人从中获益。人口增长停滞令农民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农奴制的衰落和由此导致的租佃关系流动性大大增加，也进一步帮助他们从中获益。他们付出的劳动力被折算成货币支付，这一进程加速了货币对农村方面的渗透。较高的工资水平令他们获得了更多闲暇时间：在酒馆进行的社交性饮酒变得更加普遍。同样的趋势推动了政府对赌博活动的立法。畜牧业也在这一时期兴起，意味着肉食在社会上更加普及。

此外，布匹贸易的增长成为英国在这一时期重要的经济优势。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部分地区，特别是东盎格利亚和苏格兰南部高地，长期以来一直是羊毛出口中心，为低地国家重要的布业提供了基本原料。14世纪的约翰·特雷维萨（John Trevisa）所翻译的希格登（Higden）《编年史》

（Polychronicon）中，将英国描述成“盛产优质羊毛的地方……为佛兰德斯人所爱”。这种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非常重

要，一是因为这个时代尚不存在合成纺织品，二是当时工业生产的范围与后来相比也十分有限。

在14世纪和15世纪，出现了从羊毛出口到粗纺羊毛织物出口的转变，因为织物生产也开始在英国进行。这一转变带来了相当大的繁荣，至今还可以从拉文纳姆（Lavenham）和朗梅尔福德（Long Melford，两地均在萨福克郡）等城镇的教堂中窥见一斑。但东盎格利亚北部的发展速度有所放缓，林肯郡的重要性下降，让位给了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到16世纪40年代，英国出口的织物约有88%要经过伦敦，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首都的财富，也提升了其影响力。

布匹贸易也成为英国王室重要的收入来源，这就使得政府需要在海关服务和贸易保护方面投入更多力量。政治方面也需要有同步发展，以适应商业利益上的进步。布匹贸易还促使人们对低地国家的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行业与王朝和政治战略相互影响，导致外国对英国内战的干预。

玫瑰战争在1485年的博斯沃思战役达到高潮，最终以约克派的理查三世战死沙场，王位被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1485—1490年在位）取代告终。尽管都铎王朝通过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关系提出的王位主张十分牵强，但亨利七世却得益于理查三世的不受欢迎，后者在当时已经被很多贵族抛弃。实际上，在博斯沃思的战场上，决定战局走向的仍是理查身边人的叛变之举。

即便如此，亨利七世也仍要面对约克派的反扑，包括1487年的大规模叛乱。直到约克军在斯托克战役（Battle of Stoke）中被击败，玫瑰战争才正式落下帷幕。表面上，约克军打出的旗号来自爱德华四世的侄子沃里克伯爵爱德华六世，但实际上，这个伯爵却是兰伯特·西姆内尔（Lambert Simnel）冒充的，此人可能是一位牛津商人之子。爱德华四世的外甥，首任林肯伯爵约翰，在这次叛乱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最终在斯托克战役中阵亡，而西姆内尔则被俘虏，最后得到赦免，成了皇家厨房里的一个卑微角色。

这次入侵/叛乱成为从1399年兰开斯特的亨利反对理查二世开始一系列事件的尾声。然而，对阴谋和统治的焦虑，却在这之后持续了数十年。在始终惴惴不安的亨利八世的领导下，很多可能对王位造成威胁的人都被早早处决。不过，通过迎娶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为妻，亨利七世为都铎王朝的合法性打下了坚实基础。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将他的兰开斯特旁系血统，与约克家族血统紧密相连。

英格兰内战告一段落，再加上苏格兰王权在精力充沛的詹姆斯四世领导下得以巩固，都给加强中央政府提供了契机。这种加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新制度的出现，但也有将权力与互惠互利的主导权集中在君主一人身上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对贵族私人武装力量的坚决限制，亨利七世还设置了“公债”（财务担保），以表彰人们的良好行为。1470年威廉·伯克利勋爵（Lord William Berkeley）与莱尔子爵（Viscount Lisle）之间

爆发的尼布利·格林战役（The battle of Nibley Green），成为英国本土最后一场私人之间的战役。

君权集中有利于王室司法有效性的提高。但同时，前几个世纪的剧情再度上演，即司法成为王室攫取利益的手段，引发众人不满。这种情况导致了亨利七世刚一去世，人们便行动起来，处死了两位不受欢迎的大臣：理查德·恩普森爵士（Sir Richard Empson）和埃德蒙·达德利（Edmund Dudley）。这也是新国王亨利八世“六亲不认”式治国方略的一个戏剧性例子。

然而，在亨利八世治下，同样的敛财过程又再度上演。很大程度上，这是为了给他对法国、苏格兰开战买单。这些战争的昂贵代价激起了民众的怒火。1525年，随着税赋增加，征税的名义变成了极其不受欢迎的“善行捐”（Amicable Grant）。这个词本身就表明了，“倾向性解释”（spin）并不是20世纪末的发明。

宗教改革

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也大大影响了政府对自身的强化。它是一场欧洲运动的一个部分，从16世纪初在德意志各州展开，以英格兰形成了一个独有但并不独特的教会告终。起初，英格兰和苏格兰都试图以标准的实践方式，成为普世教会的一部分。在实践当中，地方性不可避免，主要体现在对特定圣徒的崇拜和本地神职人员的招募方式。但这些并不会影响到它们对教会的广泛服从。此外，虽然也存在教士滥用职权的现象，但民众对已有的宗教习俗的虔诚并未受到影响。

随着英格兰和苏格兰都从普世教会中分离出来，宗教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教义、礼仪和组织上的变革。它还导致了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其他国家内部出现了宗教异端，因为有很多人接受变化，而另一些人却在寻求全新的变化。异端的出现，被视为对王室权威和权力的挑战，宗教宽容则被当成是软弱的表现。同时，能够从教皇手里夺回教会的领导权，也令王权得以进一步大大拓展。

在英格兰，亨利利用议会来维持王室对教会的控制。起先，亨利响应教会号召，把新教徒当作异端施以惩罚。但当教皇拒绝应允他与自己的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Katherine of Aragon）离婚——实际上是宣布他们的婚姻无效——时，亨利被激怒了。凯瑟琳为亨利育有一女（玛丽），但没有生下儿子。尽管法理上并没有这样的要求，但亨利认为只有得到一个儿子，才能保证都铎王朝江山永固。他把没有儿子归因于自己

娶了哥哥的遗孀，尽管他们的结合得到了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批准，但亨利越发在意《圣经》中的禁令，即一个男人不应该与他兄弟的妻子发生性关系。他真心爱上的女人安妮·博林（Anne Boleyn）拒绝做他的情妇的坚定意愿，也在一定程度上推波助澜。这导致亨利下定决心要正式迎娶她，而在此之前，他就必须想办法，让自己目前的婚姻宣告无效。但教皇对于凯瑟琳的外甥查理五世意见的听从，导致这场离婚官司以亨利失败告终。这一失败则使得亨利的心腹、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下台，他在1529年被解除了大法官之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历史因素，即沃尔西被指控犯有蔑视王权罪（praemunire），这是在1351年和1363年确立的限制教皇在英格兰权力的法规。

1531年，亨利在限制教会独立性方面更加强硬。他对国王乃神赐王权，因此不应受教会管辖的观点印象深刻。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废除婚约也不需要由教皇批准。1532年，亨利的理论得到议会支持，因为下议院对神职人员滥用权力的行为积怨已久。

亨利最终公开拒绝了教皇的管辖权。1533年的《禁止（向罗马）上诉法案》（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 [to Rome]）宣告了英格兰的司法权独立，而日后苏格兰的詹姆斯五世将采取更坚决的姿态实现这一步。亨利于1533年和安妮·博林秘密结婚，同年她便生下了后来继承王位的伊丽莎白一世。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则由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宣告无效，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和安妮·博林婚姻的合法性。

玛丽公主则降级为非婚子嗣。1534年，根据《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亨利成为英格兰国教的“最高元首”，而同年颁布的《叛国法案》（Treason Act）则规定任何否认这一最高地位的言行都将被视为叛国行径。这一法案的要求已经从行为拓展到“信仰”。根据这一法案，前大法官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和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等著名的批评者都在1535年被处决。

这一时期，英格兰对政策及其辩护的强调，导致了很多顺应时代要求的民族主义表达。这种民族主义不仅关注当时的政治，无论是世俗还是教会层面，还关注对过去的阐释，而政治方面也鼓励对过去进行重新阐释。1533年《禁止（向罗马）上诉法案》的序言中宣称“根据各类古老的正统历史及编年史，英格兰王国无疑是一个帝国，也以这样的身份为世界所接受，由最高领袖和国王统治，并拥有与帝国之冠同等的尊贵与富饶”。亨利的这一论述，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时期韦塞克斯家族对英国霸权的主张。在都铎时期，关于本国古代史的作品开始涌现，人们对昔日的荣耀大加强调，如1544年，约翰·利兰（John Leland）就曾为蒙茅斯的杰弗里在他的《不列颠诸王史》中对亚瑟王的描述进行了辩护。利兰在积累英国历史资料方面充满热情，于1533年被任命为“国王的文物学家”。他游历广泛，写了很多东西，例如《论著名人物》（De Viris Illustribus/On Famous Men），但鲜有作品出版。

亨利并非新教徒，他不希望看到任何对天主教信仰的摒弃——在与罗马决裂后，1539年颁布的《六条法案》（Act of

Six Articles) 中对异端的抨击便体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他也决心亲自执掌教会。1536年的法令规定了要向公众传播的教义。亨利打造了一种独有的基督教，宣称要把英国教会从教皇非法篡权的邪恶中解救出来。拒绝神迹和圣物是其中一个重大变化。亨利此举的影响，导致英国教会的运行要依赖于英国政治。此外，摧毁修道院、女修道院、圣祠的举动，则沉重地打击了民众的虔诚，破坏了宗教制度的稳定性。

修道院为政府提供了丰富的资产，因为它们先前占有了大量地产。在1536—1540年间，它们纷纷被遣散（镇压）。但战争的花销和与贵族之间互惠互利的压力，令这些土地并没有落入王室手中，也无法为王室提供永久收入，使王室有机会摆脱议会在财政权上的控制。相反，尽管有一部分土地被捐出，用于建设六个新的主教区，但大多数修道院土地最终都被拱手相让，或是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了王室的支持者。

地主和王室官员们有机会增加自己的财产，但遣散修道院和随后的土地分配还是造成了诸多破坏与混乱。修道院是朝圣等昔日宗教活动的中心，如今圣祠被毁，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掠夺，还是为了表达对昔日崇拜的破除。最突出的就是对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贝克特）的处置，充分体现了亨利希望通过摧毁旧价值观，来获取历史肯定的努力。

被拆毁的修道院建筑经常化为石料和铅材，为新的地主所用。因此，沃尔辛厄姆修道院（Walsingham Abbey）为清教徒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提供了修建斯蒂夫基大堂（Stiffkey Hall）。很多著名修道院，如里沃兹（位于约克

郡）、圣埃德蒙兹伯里(Bury St Edmunds)、廷特恩都沦为废墟。实际上，从18世纪开始，这些修道院废墟开始成为旅行者、艺术家和作家心仪的旅游目的地。对修道院的破坏有力地展示了亨利的意志与权力。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他为自己修建的宫殿，尤其是所谓的“无双宫”（Nonsuch Palace）。

同时，破坏本身也成为关键因素，从中攫取的财富被大量用于军事准备和战争当中。16世纪40年代对法国和对西班牙的战争最终代价不菲，导致政府不断征税，贬值货币。这些措施，加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造成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压力。

作为曾经的地方社区中心，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一度成为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的重要提供者，这部分功能此时都被大大削弱。由此产生的缺口，则由新的公共事业来填补，其中一部分由新创建的文法学校解决。此外由此也产生了公共供给上的压力，结果则是催生了1531年、1536年、1572年、1598年和1601年的连续立法，这些立法最终构成了《都铎济贫法》（Tudor Poor Law），尽管它所应对的社会问题更为广泛。

这部《济贫法》在2012年关于英国现代政治的讨论中再次被提及。小说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1]对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的心腹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抱有深深的同情，在她看来，克伦威尔1536年的立法，比2012年由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在态度方面更显开明。她声称后者的做法是“重返中世纪”，即回到了克伦威尔之前的状况。这是个未经深思熟虑的比较。

遣散修道院引发的关注，令亨利在1536年面临严重的挑战。对他的政策——尤其是在教会方面——的反对，以及对传闻中将要开征的新税种的焦虑，在英格兰北部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叛乱，即“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这场叛乱体现了民众对政治和宗教变革的关注程度，以及宗教在凝聚民众力量方面的作用。“巡礼”大军聚集在达勒姆代表团带来的圣卡斯伯特神圣大旗周围，他们将“整个王国”与国王议会中“邪恶的个体”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在中世纪拥有悠久的传统，但此时因为宗教问题而变得更加复杂。

在考虑何为暴政之时，人们将真正的信仰作为判断的要素，从而赋予宗教异端以颠覆性的力量。与后面的情节类似，如1638—1642年爆发的内战，反对的普遍原因往往与具体的政治议程相结合。因此在1536年，人们的不满大多针对《叛国法案》和1536年的《继承法案》（该法案赋予君主决定自己继承人的权利，从而解决亨利和凯瑟琳非法婚姻的“遗留问题”），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政府做法而来。

和1381年农民叛乱的进程类似，王室的让步令局势大为缓和，但随后又进行了镇压，因为亨利从未真正考虑履行这些让步承诺，而这些承诺则因为进一步的叛乱而变得遥不可及。最终，并没有特别议会在约克召开，以解决人们的不满。“求恩巡礼”也未能阻止修道院被遣散，也没能让同时出现的对圣徒崇拜的攻击得到抑制。相反，亨利还借镇压叛军的名义，处死了除自己直系亲属以外大部分皇室血统拥有者。而这还只是亨利对于那些自己无法信任的人普遍暴力的冰山一角。在这样的

情况下，法律很容易被一个多疑且缺乏安全感的国王利用，让他有机会瞒天过海，解决自己的眼中钉。

与此同时，亨利的多疑也被其他人操控。比如1536年，宫中的保守派——托马斯·克伦威尔亦有参与——指控（实际上是诬陷）安妮·博林不忠。最终安妮被处死，她所生的女儿伊丽莎白的继承权也被剥夺。克伦威尔本人则在1540年被处死，保守派利用了他对国王迎娶凯瑟琳·霍华德（Katherine Howard）的反对意见，而就在处死克伦威尔当天，亨利便再度大婚。但只过了两年，凯瑟琳·霍华德也因为被指控通奸命丧黄泉。不过凯瑟琳确实曾不顾后果地向亨利年轻的廷臣示好。

亨利的为政之道与猜忌之心，带来的不仅仅是一颗颗人头落地。由于对伦敦之外的领土控制感到不安，政府在1536—1543年间推动了与威尔士的联合，使后者的政府、议会和法律制度全部被英格兰同化。

亨利领导的宗教改革，在民众层面带来了心态上的转变：炼狱不再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不再需要为死者祈祷，破坏了生者与死者的联结。相比之下，1537年官方英文《圣经》的诞生，以及随后每个教区教堂均需要购买一本的指令，体现了印刷品权威性的显著延伸，给读者和听众带来了自己思索结论的可能，同时还鼓励了识字。国家对教会进行指导，也有赖于新印刷技术带来的条件。1611年的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令其权威性大大提升。印刷技术也减少了各地语言差异所带来的影响。

在亨利唯一的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1547—1553年在位）统治时期，宗教改革被进一步推动。爱德华六世是亨利第三次婚姻——与简·西摩（Jane Seymour）结婚后生下的孩子。爱德华和他的大臣们非常积极地将英格兰导向新教的方向，结果导致1549年在西南各郡发生了一次不算严重的叛乱——“祈祷书叛乱”（Prayer Book Rebellion）。爱德华9岁登基，他的统治始终建立在贵族议会的明争暗斗之上。起初，主要摄政者是爱德华六世的舅舅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亨利死后，他成为护国公。他支持新教，也在一定程度上乐于推动政府对社会问题进行回应，尤其是地主对公有土地的圈地行为引发了诸多批评，萨默塞特公爵也对此有所同情。然而，当反对圈地和反对高租金的呼声在东盎格利亚导致了凯特起义（Kett's Rebellion, 1549）时，这种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无疑影响了他的名声。

1549年萨默塞特公爵被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取代，他是一位成功的军人，1551年被封为诺森伯兰公爵。诺森伯兰公爵处死了他的竞争对手萨默塞特，将英格兰推向了更激进的新教方向，尤其是在1552年颁布了通用版本的《祈祷书》（Prayer Book）。此外，教堂也在改变。它们的内部被重新装潢，雕像和壁画等元素全部被去除。这些举措有助于彻底取缔那些曾给许多人带来价值感的虔诚仪式。

然而，新秩序的推行却因爱德华六世的体弱多病，最终在1553年7月病故而中止。面对王位可能被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即亨利第一次婚姻（与阿拉贡的凯瑟琳）中所生的女儿玛丽继

承的前景，诺森伯兰公爵选择支持简·格雷夫人（Lady Jane Grey）登基。作为亨利七世二女儿的孙女，简·格雷夫人的继承顺位并不高，但她却有机会让新教改革和诺森伯兰公爵的摄政继续，因为公爵已经让自己的儿子娶了简·格雷。但爱德华死后，贵族支持者们纷纷转向玛丽，而非不受欢迎的诺森伯兰公爵。玛丽果断行动，并在争取到一部分民众支持后登上王位，诺森伯兰公爵和简夫人则都被斩首。

玛丽（1553—1558年在位）统治下的天主教复兴，最终也随着她的无嗣而终戛然而止。这也导致玛丽在人们心目中多是以迫害者的形象出现。在她统治期间，有将近300名新教徒惨遭火刑，其中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等著名人物。伦敦、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的新教殉道者人数格外多，因为这些地方在地理上离新教的策源地欧洲大陆最近，于是受到王权的格外关注。

因玛丽的迫害而被迫逃往欧洲大陆的约翰·福克斯（John Foxe）的著作《对教会中最特殊和最值得纪念的事件的记录与纪念》（Acts and Monuments of Matters Most Special and Memorable Happening in the Church），通常被称为《殉道者之书》（Book of Martyrs），于1563年出版。这部经常被翻印再版的宗教史包含了一份殉教史（martyrology），极力宣扬了天主教的残忍和新教徒的勇敢，对延续了超过250年的反天主教传统影响深远。福克斯将英格兰描述成一个一直走在向基督教信仰迈进的最前线的王国，并且不再需要听从罗马教士的教导。这种对宗教身份的独立主张，鼓励了英国人作为“天选之

民”的自我意识。这似乎是一种消极的、排他性的民族身份定义，但鉴于国际天主教的真实状况，以及它明显的敌意，这一立场也具有一定合理性。在1571年的一项法令颁布后，各个大教堂都获得了《殉道者之书》的副本，许多教区教堂也自发追随。

除了宗教问题，玛丽统治时期还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主题值得关注。作为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她重要的西班牙血统帮助她嫁给了她的哈布斯堡家族亲戚，西班牙的腓力二世

（Philip II of Spain）。这段婚姻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西欧，以及遏制法国扩张计划的一部分。然而，由此引发的与法国的战争，却导致英格兰王室在1558年失去了百年战争最后的成果——加来。

随后即位的是玛丽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1558—1603年在位），她是亨利第二次婚姻所生，即安妮·博林的女儿。新教徒在这一时期得以安定下来，而按照爱德华六世的标准，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显然是温和的。她维护了主教的权威，选择了“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

（Supreme Governo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的称号，比此前“最高元首”（Supreme Head）谦逊了几分。尽管这可能是她身为女性的姿态使然，但日后的继任者都将沿用这一称号。

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在1569年受到“北方天主教徒起义”（Catholic Northern Rising）的冲击，但并无大碍。这次起义本身表明了英格兰北部民众对天主教的广泛支持，伊丽莎白

本人被逐出教会，并在1570年被教皇废黜。天主教的威胁集中在伊丽莎白的表妹，苏格兰女王玛丽身上。鉴于她的祖父詹姆斯四世与亨利七世的女儿玛格丽特在1503年的联姻，如果伊丽莎白无嗣而终，玛丽将获得很靠前的继承顺位。

在苏格兰，苏格兰女王玛丽试图扭转1560年苏格兰议会推动的新教改革——但并未奏效，使得她在1561年正式入主爱丁堡时，不得不处在新教的氛围当中。尽管背景焕然一新，但在这次早期王室与贵族对抗的重演当中，玛丽再次受到贵族集团的压制。他们迫使她在1567年退位，由她尚在襁褓当中的儿子詹姆斯六世即位。1568年，她逃到英格兰，遭到软禁。面对伊丽莎白的种种举动，她并未做出回应，最终在1587年被斩首。

1567年玛丽倒台，终结了新教英格兰可能会拥有一个天主教邻国的危机。反过来，尽管重大分歧尚存，但英格兰与苏格兰还是通过新教达成了一定的情感联结与合作，为17世纪的联合埋下伏笔。这种结局也与英格兰长期以来试图统治苏格兰的种种行为形成对比，尽管这一企图在16世纪40年代获得了新的推动力，但由于军事问题、苏格兰本身政局的动荡，以及法国的干预而最终失败。

在伊丽莎自治下，英格兰有意转变策略，寻求确保一个友好的（即新教）政府在爱丁堡掌权，而不是直接统治这个国家。为此，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曾四次派遣远征军进入苏格兰，但他们从未试图越过福斯湾。1560年，如果没有英格兰军队——尤其是海军——的参与，贵族集团不可能推翻法国摄政

王的统治。此外，每当苏格兰政局不稳之时，英格兰大军都会在北部集结，确认苏格兰政权能取得对英格兰有利的结果。

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

1588年，西班牙试图派遣一支大型舰队沿英吉利海峡航行，以掩护从西属尼德兰（今比利时）发起的对英格兰的入侵，这是对英格兰一次更为明确的挑战。尽管英格兰舰队规模较小，但具有优越的航海素质。当西班牙舰队来到英吉利海峡时，他们随即对其发动了袭击。随后，西班牙人在加来附近的无敌舰队（Armada），遭到英格兰火船队的夜袭，阵脚大乱，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遭受重创。西班牙人的入侵计划只得偃旗息鼓。在绕过不列颠群岛返航的途中，无敌舰队还因风暴遭受了进一步的损失。

这场胜利在英格兰人的身份认同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被看作是“天佑英格兰”的结果，尽管西班牙海军自身有问题，运气以及有利的风向，再加上英格兰海军的英雄主义与战斗素质才是胜利的真正原因。这一结果促使人们更加坚信英格兰的新教主张得到了上帝的支持。1688年的“新教飓风”（Protestant Wind）同样被看作是因天意而起，帮助奥兰治的威廉（后来的威廉三世）推翻了詹姆斯二世。尽管在今天我们看来，伊丽莎白的政权一度岌岌可危，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上帝的认可足以令它不可撼动。

虽然内外交困是客观事实，但伊丽莎白一世在她漫长的统治生涯中一直保持着控制力。这一时期的英格兰并没有爆发像法国（法国宗教战争）、爱尔兰，或是近在咫尺的苏格兰那样的国内冲突。伊丽莎白的秩序随其长期存在而越发稳固，宗教

方面尤其如此。成年后经历过先前政策的人不断过世，越来越多的人在基督教新教的教育中成长起来，而经历过天主教不可撼动时期的人则越来越少。伊丽莎白是第一个无意拷问民众良心的统治者，她只追求他们外在的顺从。此外，新的宗教落地生根，与英格兰的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前者帮助后者得到进一步的定义。同样的进程也在苏格兰发生。在近代世俗英国，王室与教会之间反复变化的独特关系所造成的影响难以把握，但它成功地确保了宗教改革得以在这个国家深深扎根。

与西班牙的战争始于1585年，一直持续到1604年，主要是为了挫败西班牙对（新教）荷兰起义的镇压。尽管西班牙对爱尔兰反抗英格兰控制而发生的叛乱进行的干预，随爱尔兰人的失败一同徒劳无功，但事实证明，想要取得对西班牙作战的胜利同样十分困难。由此带来的财政负担也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压力。议会的反对声音在16世纪90年代达到了顶峰，这种反对是不容忽视的。由于需要利用议会来实现自己的王朝与宪法目标，亨利八世增加了议会发起的频率，也赋予它更多权力。尽管出发点是亨利的一己之愿，并且是在爱德华六世的摄政者主导下进一步发展，但议会管理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升。随着王室开始扮演议会中的权威来源，议会立法也变得越发普遍。

这一时期的政治压力还来自于其他方面，尤其是宗教和继承问题。在教会内部，出现了清教主义（Puritanism）的倾向，它要求进行更激进的教会改革，从而导致更加严苛的加尔文主义式组织与神学精神成为主导。不满情绪集中在主教角色

和教士法衣的性质上。同时，政治和宗教制度的越发成型，以及王位还将继续由新教徒继承的前景，令天主教徒积怨愈深，其中一些人开始策划暗杀女王。她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也就解释了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一个失宠的前王室宠臣，为何要谋划取女王性命，以维护自己的地位。但由于阴谋未能得逞，罗伯特在1601年被梟首示众。

诸如此类的震荡，成为这一时期戏剧的背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仅仅是公共政治越发激烈，其中一部分是针对宫廷和议会事件的反应，同时公共文化也越发发达。大众对戏剧的欣赏成为这个时代的高潮之一。在苏格兰，戏剧得到了发展，涌现出大卫·林赛爵士（Sir David Lindsay）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但主要仍是在宫廷环境中上演。相比之下，在英格兰戏剧业，公共赞助和商业市场的需求与机遇都变得非常重要。1576年，伦敦开设了英国第一座专门建造的公共剧院——大剧院（Theatre），随后1577年的幕布剧院（Curtain）、1599年的环球剧场（Globe Theatre）接踵而至。宗教改革令表达上的限制大大降低，使得戏剧发展获得了新的契机。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表达了这个新兴民族国家的愿景与矛盾，而其中诞生的词汇与短语表达则对英语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英国社会

这一时期的社会是怎样的？在欣赏现代演绎的电视剧和电影作品时，人们很容易产生这个社会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大致差不多的错觉。但事实远非如此，尤其是在生活经验和人口预期的基本细节方面。在经历了1500—1650年人口的明显增长后，英格兰的人口由不足250万提升到500万左右，苏格兰人口增加到100万左右，而人口增长也就此放缓。英格兰的人口在1660—1690年间，可能因肠热病和胃部疾病有所下降，而苏格兰的人口下降则主要出现在17世纪90年代。在许多地区，先前的人口增长随着1696—1699年、1727—1730年以及1741—1742年的人口锐减而抹平。但尽管如此，人口预期寿命在这一时期却出现了重要的上升趋势，从17世纪80年代出生者的30岁，提高到18世纪50年代的42岁。虽然直到1801年，英国才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但这一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可能从1666年的507万，上升到了1751年的620万。随后，由于人口制度的变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迅速增加，在1801年达到了866万。

虽不及今天，但当时英格兰的人口便已经在整个不列颠群岛占据了多数。1689年，英格兰人口约490万，而爱尔兰约200万，苏格兰约120万，威尔士约30万。尽管大部分人仍住在村庄、村落和农庄里，但城镇人口也越来越多。

农业的重要地位，保证了大多数人居住在土壤肥沃的地区，如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南威尔士肥沃的低地（如格拉摩根谷）和苏格兰中部低地。但农业的主导地位也意味着，和今天

相比，更多的人可以住在农业吸引力较小的地区，而依旧可以从土地中赚取生计，如高地牧区。在乡村，吸引外来者定居的往往是那些能够为家庭手工业提供机会的教区。在这些地区，公共土地的可用性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为新增人口提供空间方面。然而，整个英国的地方发展差异极大，表明全国人口制度需要叠加在地方的生活模式之上，并需要通过地方生活模式加以调节。

这一时期，人口与家庭结构之间的关系也与现代英国大相径庭。除了偶尔发生的因重婚、卖妻和贵族离婚诉讼导致的婚姻终止外，婚姻关系牢不可破。除非在其中一方死亡，或遭到遗弃，包括对方主动逃离社区的情况下，婚姻关系才会结束。婚姻同时是性关系以及生养子女的核心，这一点在今天的英国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多数生育都发生在婚姻关系当中，尽管没有有效的避孕手段和安全——更不用说合法——的堕胎机构，但记录当中的非婚生子女还是寥寥无几。

与现代英国不同，当时很多人终生不会拥有性伴侣，而其中一些人会寻找“露水情人”——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买春。很多男女终生都不会结婚，结婚年龄一般也都很晚。17世纪末，英国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在28岁左右，女性是27岁左右。因此，平均的生育年龄大约也会在青春期后十多年，而这一时期人们的青春期本身要比现代人来得更晚。

法律和社会习俗赋予父亲和丈夫权力。然而在实践中，他们的权威往往会因家庭生活中的动态平衡、个性的发挥，以及家庭应对挑战时的合作需要而被削弱。社会政治也有其等级划

分。在弗朗西斯·博蒙特（Francis Beaumont）的戏剧《燃杵骑士》（The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 1607）中，社会政治被演绎成了幽默主题。在剧中，商人学徒贾斯珀跟自己主人的女儿露西两情相悦，但商人却想把女儿嫁给另一个求婚者。于是商人夫妇把露西抓走，关押起来。贾斯珀假装自己去世，被装进棺材带进屋里，然后装成鬼魂现身，吓唬商人，从而迫使他同意把女儿嫁给自己。而在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的喜剧《鞋匠的假期》（Shoemaker's Holiday, 1599）中，一位贵族为了追求鞋匠的女儿，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鞋匠。

现实总要惨淡许多。困境中的年轻爱侣遭到父母或监护人权力的粗暴干涉，也成为戏剧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如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和托马斯·德克尔的《咆哮的女孩》（The Roaring Girl, 1610）。地位和权威都涉及其中，在菲利普·马辛格（Philip Massinger）的戏剧《还旧债的新办法》（New Way to Pay Old Debts, 约1622年）里，反面角色吉尔斯·奥弗里奇爵士贪婪地专注于通过家族联姻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失败则让他同时也失了心智。

对人们来说，当时社会抵御瘟疫的能力仍然很薄弱，尤其是因为医学知识依然有限。现代人总会假设有一个能够治愈一切的医疗体系，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相反，民间疗法和虔诚的祈祷成为广泛采用的治疗手段。不过，现代医疗的实际情况和现代人的安慰剂效应表明，这些手段也并非一无是处。实

际上，考虑到当时人们对这些手段的信赖，即使没有实际疗效，它们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不过，医疗手段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尤其是在预防天花这种最严重的疾病方面。据说1694年它曾取走了玛丽女王^[2]的性命。1665年后，“大瘟疫”（Great Plague）来袭，仅伦敦便有近10万人丧命。天花取代鼠疫成为最可怕的疾病。由于天花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日益增长的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数量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幸存者身上也往往布满天花疤痕。在主要的城市地区，这种疾病成为地方性及流行性疾病，对婴儿和儿童尤其致命。

和其他许多疾病一样，天花也体现了社会选择倾向。穷人的居住密度往往比富人更高，因此也更易感染。此外，由于天花病毒能存活一年之久，可以通过衣物或被褥传染，而感染天花的穷人死后，其私人物品往往不会被销毁，而是由其他穷人继续使用，从而导致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起初，接种作为预防天花严重发作的手段，价值十分有限。不过从1768年起，由于广泛采用更加安全的“萨顿方法”（Suttonian method），即只接种尽可能少的传染性物质后，情况大为改观。进一步提高安全性的种痘法，直到1796年才投入应用，不过接种切实地对天花起到了遏制作用。

但在防治其他严重疾病方面，人们没能取得太多进展，包括一些对今天的健康西方人来说已经不会致命的疾病，如肠道疾病。在18世纪和19世纪，斑疹伤寒、伤寒、流感、霍乱、痢

疾、水痘、麻疹、猩红热和梅毒都是严重的问题。人口流动和国际贸易越发频繁，令流行病传播更加容易，不过对于某些疾病来说，接触也让人们获得了一定的抵抗力。其他一些今天可以治愈或抑制的疾病，在当时却让人们身体衰弱。营养不良阻碍了生长，影响能量水平，人们的抵抗力也随之降低，尤其是在16世纪90年代。饮食问题增加了结肠寄生虫感染、肝炎和沙门氏菌感染的概率。酒精和鸦片是当时仅有的止痛药，廉价的鸦片酊是万能药，也是标准处方的基础。

这一时期并不存在保健服务体系，技术成熟的医生很少，而且一般都在城镇，出诊费用令平民难以承受。一些诸如发疱疗法和水银疗法的医疗手段可能疗效有限，而且往往会带来痛苦、危险，甚至是令人遗憾的后果。外科手术非常原始，没有麻醉剂可以使用。

此外，当时的社会还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除工厂工人外，许多工业生产对其他人也会带来危害。制革、鞣革污染了供水，而砖瓦厂的窑炉则带来大量烟雾。对于个别污染问题，例如工业生产对供水的污染，社会层面会有一定限制，但并没有系统监督或是改进的驱动力。直到18世纪，尿液仍被广泛应用于清洗布料的过程中。

居住条件也是一个主要问题。拥挤的住房条件，特别是共用床铺，助长了疾病的传播，尤其是呼吸道感染。大多数住所既不暖和也不干燥，晾晒衣物十分困难。这导致衣物清洗方面的困难，也使得衣物往往有很厚的多层布料构成，这样即便无法彻底晾干，人们也还是可以继续穿着。外出工作和徒步以及

骑马运输的增加，大大延长了人们暴露在恶劣天气中的时间。按照现代标准，人们的呼吸、牙齿和皮肤状况都很糟糕，住的房间也一定是臭气熏天。

火灾造成的破坏会非常严重。最明显的是1666年的伦敦大火，这场大火持续了四天。木头和茅草都非常易燃，消防工作则面临诸多限制，德文郡的蒂弗顿（Tiverton）在1726年、1730年，尤其是1731年连续遭到火灾重创，最后那场大火促使当地议会颁布了一项法案，规定该地所有房屋的屋顶都必须用铅、石板或瓦片建造；而在德文郡的其他城镇，克雷迪顿（Crediton）在1743年因一场大火失去了460间房屋，汉宁顿（Honiton）的大部分地区都在1747年和1765年的大火之后进行了重建。

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争斗也很激烈。能够导致人类死亡的动物——熊和狼——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狐狸对家畜的骚扰，以及狗群中的狂犬病传播仍是不小的问题。鼠患的问题更大，而臭虫、虱子、跳蚤和绦虫则会带来真实而广泛的恐怖。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现当时人们生活环境中的气味与污染了。通风受到限制，排水管也时常堵塞。人类生活在畜群和粪堆之中，这对健康状况无疑会造成很大影响。在建筑物周围堆肥存在危险，因为这很可能会对生活用水造成污染。没有排水管路的厕所和动物畜栏污水直接流向街道，甚至会在经过普遍多孔的墙壁时渗入屋内。露天厕所直接建在住宅旁边和卧室地下。不过，除了穷人的情况格外糟糕以外，疾病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社会平衡，如第五代普利茅斯伯爵（The 5th Earl of

Plymouth, 1751—1799) 被描述成一个“胖得像球的英国老爷，很喜欢吃东西”，但到了1794年，他“情况非常糟糕，双目几乎失明，而且腿肿得厉害，人们认为他得水臌病了”。作为继承人，他的儿子寿命更短（1789—1833）。营养不良降低了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以及对不利局面的心理承受能力。水果和蔬菜都是季节性的，而且价格昂贵。

对穷人来说，人们对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社会机制了解甚少，因此只能把贫穷的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社会救济的标准被认为是区分应该被救济和不应该被救济的人。这一宗教道德原则考虑的是年龄、健康状况和性别，并不参照就业形势或收入状况。因此，体弱者、老年人、孩童和需要抚养子女的妇女成为贫困救济的主要受益者，而身体健全的人，无论是从事低薪工作，还是根本找不到工作，都无法得到救济。

不过，政府在许多方面的行动，都在谋求社会的共同福祉。例如英格兰政府自1586年起，便一直在通过《命令书》（Books of Orders），敦促谷物市场规范交易。为应对粮食短缺危机——这势必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挑战——治安法官有义务保证粮食供应情况，确保有充足的粮食流向市场。对分配问题及其解决的关注，也使得政府对信息十分看重。

詹姆斯六世及一世时期的英格兰

在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他同时也是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1567—1625年在位）统治时期，围绕议会角色出现的紧张关系成为主要问题。1605年针对詹姆斯的天主教徒火药阴谋便是证明。这次阴谋中计划的爆炸，与威斯敏斯特的一次议会会议密切相关。

阴谋失败后出现的周年纪念活动，是新教方面创造的纪念日，目的是替代先前的圣徒纪念日。这一进程在伊丽莎白时期便已经展开，尤其是与西班牙的战争（1585—1604）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发展，也为纪念民族历史提供了新的焦点。民族历史在一些作品中得到了阐述，最著名的是拉斐尔·霍林舍德（Raphael Holinshed）的《编年史》（Chronicles, 1577）。印刷地图，如约翰·斯比德的地图，提供了国家的另一种形象，并通过印刷手段固定下来。

此外，与西班牙的战争还鼓励了英格兰的另一种定位，即它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尤其是在跨大西洋地区，英格兰似乎必须且不可避免要发挥作用。随着民众对新教忠诚度的提高，回顾新教近代历程的全新国家纪念日也变得流行起来。每年11月17日，教堂的钟声都会响起，庆祝1558年伊丽莎白的入主，进而也是庆祝天主教统治的结束。挫败无敌舰队则提供了另一个纪念日。

尽管詹姆斯一世也是新教徒，但事实证明，他却是个很难被纳入这一英雄主题叙事中的人物。作为先前的苏格兰詹姆斯六世，他必须适应身份的转变，并为自己的弱势出身采取权宜之计。他是都铎-斯图尔特王朝联姻的受益者，由于亨利七世的女儿玛格丽特和詹姆斯四世成婚，再加上亨利八世的三个婚生子女都无嗣而终，他才得以登上英格兰王座。1603年，詹姆斯南下加冕。过渡时期的治理并没有预想的那样困难，除了一次外出访问外，他一直留在英格兰，因此要比先前在苏格兰时更少受到苏格兰贵族之间争吵的折磨，也不必承受他们对王权的蔑视。

不过，苏格兰仍是个独立国家，由枢密院代为管理。尽管詹姆斯希望英格兰和苏格兰可以建立一个“友爱联盟”，或者至少在行政和经济方面有所联合，但最终只停留在共主邦联（personal union）^[3]的状态。英格兰人担心法律和宪法会受到影响，而威斯敏斯特议会则拒绝了议会或法律上的结合。

作为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统治者，詹姆斯缺乏魅力，难以赢得尊重和爱戴。他的政策不被信任，同时也无法避免债务的增加。但他在管理议会和宗教政治方面倒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就像他在处理苏格兰派系问题方面一样。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并没有出现类似于17世纪初与20年代初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那样的失控或动荡状态。此外，王室的控制权还扩展到了爱尔兰。英格兰法律和习俗被强制执行，阿尔斯特（Ulster）的大部分地区被纳入英国版图，随后这一区域大多成为苏格兰移民的定居点。

1603年，英格兰和苏格兰边界实现了去军事化，这一区域先前很难控制。这成为公共权力主导军事力量的一个表现，一个佐证便是防御堡垒越发破败，尤其是在英格兰方面。

不过，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时期，许多贵族仍保留了军事力量。大地主们的军火库里不仅拥有火枪、长矛和长戟，甚至还有火炮。伊丽莎白的宠臣，第一代莱斯特伯爵罗伯特（约1532—1588）是1553年被处死的诺森伯兰公爵的儿子，1510年被处死的达德利的孙子。此人的封地肯尼沃斯城堡

（Kenilworth Castle）里藏有大量火炮。就连诺里斯勋爵这样的小贵族，在他位于伯克郡的封地也存有一批火炮。对许多贵族来说，囤积家兵仍是自身地位的重要组成，而通过王室权威招募军队仍是17世纪早期国家增兵的主要手段。然而，在詹姆斯统治时期，国家方面的军事力量严重衰退，到20年代与西班牙和法国开战时，这一状况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样，当查理一世面临苏格兰方面的叛乱时，他也因此陷入窘境。

查理一世与内战

由于查理一世的施政，英格兰和苏格兰被詹姆斯称为“大不列颠”的共主邦联，最终走向破裂。查理是个缺乏常识的人，既不够灵活，也不够务实，生性狡猾，却无法取得信任。对尊卑次序和王权尊严的偏执，令他对异见置之不理，十分傲慢。由于异想天开的财政要求，尤其是“造船税”（Ship money）^[4]，以及过于明显地暗中支持天主教政策，令他在英格兰的支持率岌岌可危。但叛乱最终爆发在苏格兰。在那里，查理推行宗教改革，尤其是建立更加集权的主教制度和新的教礼，以及他对苏格兰方面批评意见的压制，最终酿成了主教战争（Bishops' Wars, 1639—1640）。这是内战的开始，也是这一时期冲突的表征：查理无力控制局面，而宗教再次扮演了重要作用。不列颠群岛的各个地区都因宗教分歧陷入分裂状态。

危机导致查理不得不向英格兰议会求助，但自1629年起，他便开始越过议会，进行“个人统治”，这无疑使得议会积攒了诸多不满，同时人们也对他的意图感到恐惧。议会愤怒而绝望地试图重建政治制度，将矛头对准了查理的大臣和他的政策。查理不得不丢车保帅，放弃了他最不受欢迎的大臣，第一代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托马斯在1641年受审并被处死。查理还在一些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包括废除特权法庭。然而，他对攻击教会政府的行为态度依旧强硬。

在山雨欲来的氛围中，1641年11月，爱尔兰发生了大规模天主教起义。武力镇压势在必行，这使得局势两极分化。关于由谁来掌控军权的争论，加剧了议会改革教会政府的诉求。王室和议会都剑拔弩张，并且明显地相互对立。查理诉诸武力，于1642年4月1日强攻议会，打算抓住主要反对他的“五君子”，但他们已经沿河边逃进了伦敦城，那里是反查理势力的中心。

于是双方都做好了战争准备。英格兰南部和东部、海军，以及许多大城镇都支持议会，而1642年1月10日离开伦敦的查理，则在威尔士以及英格兰北部和西部的农村地区争取到了最大支持。双方都在每个地区和社会团体中争取力量，宗教、政治差异，以及经济团体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在经济发达地区，支持议会的力量获得了压倒性优势。信仰，尤其是宗教忠诚，是解释支持率差异的关键。查理代表着荣誉、忠诚和王权至上，但许多议会支持者对他的天主教倾向，以及当权教会中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William Laud)暗中的天主教信仰抱有强烈敌意。劳德的举措引发了一系列暴力回应，包括破坏教堂设施，如祭坛栏杆等被视为属于天主教的物件。

1642年7月，内战在英格兰爆发。10月23日，查理在伊奇希尔(Edgehill)以微弱优势战胜了议会军主力。但11月13日，他在特恩汉姆格林(Turnham Green)的又一场恶战后败北，未能挺进伦敦。1643年，国王军占领了英格兰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攻下布里斯托尔(Bristol)；但是，1644年，已经在苏格兰控制住局面的长老会派出的一支军队，驰援英格兰议会军，

攻入英格兰北部。1644年7月2日，在约克附近的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苏格兰 - 议会联军击败国王军。此役中指挥议会军骑兵的，是原本身为亨廷顿郡贵族的奥利弗·克伦威尔。随后英格兰北部被国王军攻占。

再往后，1645年6月14日，克伦威尔再次率领议会军的主力骑兵“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在纳斯比歼灭了国王军野战部队的主力。三个月后，第一代蒙特罗斯侯爵詹姆斯率领的苏格兰国王军被击败。节节败退使得国王军的控制范围不断缩小。1646年5月5日，查理投降。

议会军的胜利，部分要归功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最富裕地区的支持，同时，查理的愚蠢也“功不可没”；但这一系列战役中，战斗素质、指挥技巧和机遇起到了重要作用。议会军足够幸运，他们在战争疲劳期到来前取得了胜利。但战争胜利并不意味着全部。议会、军队领导人、苏格兰人几方在教会政府、与查理的谈判、军队控制权以及大量军费开支方面，仍然扯皮不止。

克伦威尔与空位时期

1648年，内战战火重燃。苏格兰人以查理的名义攻入英格兰，后者则承认了长老会的地位。此外，保王派还在各地煽动起义，尤其是在肯特郡和南威尔士。不过这些起义都被镇压，苏格兰军也在普雷斯顿被击败。奥利弗·克伦威尔在领导军队取得胜利后，对议会进行了清洗，以阻止其与国王谈判（即“普莱德清洗”）。查理随即受审，并在1649年1月以叛国罪被处决。英格兰历史上唯一一次被宣布成为共和制国家。王室的盾徽和其他象征物遭到拆除，雕像被毁。查理的儿子，后来即位成为查理二世的查理，以及他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斯（即后来的詹姆斯二世及七世），被迫流亡国外。共和革命鼓励了人们对政府新目的及执政方法的想象，也推动了政府的实际创新。

克伦威尔马不停蹄，先是征服了爱尔兰，随后又剑指苏格兰。1649年处死查理，进一步确立了新政权的激进主义风格，与1646年战事结束后没有立即遣散部队异曲同工。

然而，这种激进主义仍是专制的，并没有朝人们期待的宗教或政治自由方向发展。因此，1647年兴起的“平等派运动”（Levellers' movement）被克伦威尔镇压。这一运动致力于实行男性普选，但克伦威尔对民主并无兴趣。

继承“平等派”衣钵的是“真正平等派”（True Levellers），又称“掘地派”。他们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堕

落”（即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后果，要求人们享有共同财产的权利。1649年，掘地派试图在萨里的圣乔治山挖掘公共财产，遭到军队和愤怒的当地群众驱逐，同样的剧情随后在科巴姆(Cobham)又再次上演。掘地派的领袖是杰拉德·温斯坦利，此人的经历表明了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流动性。他出生于威根（Wigan），曾在伦敦做过学徒，后来由于经营上的失败，他又到了萨里，成了一名养牛工。

在邓巴（1650年）和伍斯特（1651年）接连取得对苏格兰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后，克伦威尔首次实现了对苏格兰的征服。苏格兰在政治上不再与英格兰平起平坐，议会和行政会议都遭到废除。苏格兰贵族的权力被削弱，一系列措施在苏格兰落实，确保英格兰法律得到施行。1654年，苏格兰和英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一起，由克伦威尔及其委员会提名议员，参加议会。

克伦威尔在1653年夺取政权，他解散了“残缺议会”（Rump Parliament，由1648年12月大清洗后剩下的议员组成），就任护国公，并在1657年确立世袭地位，其仪式包含先前英格兰君主制的大部分程序。然而，克伦威尔建立的是一个军事政权，其不容异见的造神面目逐渐显露：强调敬畏，而非容忍。他发觉自己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满足他的议会。

1655年，主要是为了应对保王派起义（这说明拥有王位继承可能的查理二世此时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地方权力被移交到将军们手中，克伦威尔指示他们保障地方稳定，建立一个清教徒的、虔诚的、高效的国家。这些显然都是不受民众欢迎

的目标。民众对充满压迫性的清教主义的敌意，跟对这个非法的、激进的、咄咄逼人的政府的不满融合在一起，而为了进一步推行改革和虔诚，清教主义者还对被认为是迷信或褻渎的流行仪式进行管制，包括圣诞节，以及围着五朔节花柱跳舞。1656年允许犹太人在英国定居的做法也饱受诟病，而把将军作为地方代理人，更使得本就脆弱的政府合法性遭到进一步破坏。无论如何，这个政府都因其起源于共和性质的弑君而很难服众。

克伦威尔于1685年去世，他的儿子理查继承了护国公之位，但无力驾驭，亦不受军队欢迎，于是在次年5月便丧失了权力。由此引发了一连串政治危机，从军队内部的分裂，到重新召开“残缺议会”，但最终未果。共和国变得羸弱而动荡，但查理二世的复辟尚未成为定局。实际上，乔治·布斯（George Booth）在1659年8月对“残缺议会”发起的叛乱就被挫败了。有人支持共和制继续下去，但这种支持是分裂的。动荡最终随着复辟的到来而解决：驻苏格兰的军队指挥官乔治·蒙克（George Monck）挥师南下，占领伦敦，恢复秩序，并重建了一个温和的议会，而这个议会则召回了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

君主复辟时期，1660—1688年

较之他的父亲，新国王明显更胜任这一角色。查理二世平易近人，充满魅力，同时也是个灵活务实的人。复辟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能让政治问题自动化解，而且最终也没能办到。查理二世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越过议会施行政令，但也没有着手恢复17世纪30年代的特权税收和司法机构。不过，议会在1641年后通过的立法被废除，克伦威尔领导下建立的与苏格兰的特别联合亦告终止。此外，1662年的宗教协议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重建了圣公会秩序，从而使新教的非正统派被疏远。

新的秩序即将瓦解，部分是由于查理的政策，但更普遍的原因是内战和空位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和宗教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多元主义和意见表达被推向前台，人们期待对政府的决策进行辩论与反驳。

同时，1665年的大瘟疫和次年的伦敦大火凸显了人类的脆弱性，人们对查理的宗教倾向感到担忧，同时又对他无嗣（唯一的孩子是私生子），以及他的弟弟是天主教徒感到担忧。这一切如滚雪球般，最终在1678年酿成了一场危机；反过来，对天主教的担忧则在同年催生了所谓的“天主教阴谋案”

（Popish Plot），进而引发了“排挤危机”（Exclusion Crisis, 1678—1681）：企图利用议会，将詹姆斯排除在继承顺位之外。其支持者被称为辉格党，而反对者则被称为托利党。

排挤最终以失败告终。与1638—1642年不同，王室保留了对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控制权。在英格兰内部，王室则不愿再冒风险发动内战。而1681—1685年间，由于辉格党的失败，托利党采取行动，对辉格党领袖进行迫害，还在1683年废除了《伦敦城宪章》（Charter of the City of London）。

詹姆斯二世（及苏格兰的詹姆斯七世）在1685年登基。但查理的一个私生子——蒙茅斯公爵新教徒詹姆斯起兵造反。他在塞奇高沼战役中被击败，随后被处决。同样，苏格兰的第九代阿盖尔公爵阿奇博尔德反对詹姆斯的叛乱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受这些成功的鼓励，同时也是因为议会中非难的刺激，詹姆斯决心迎难而上，一意孤行。他开始施行更加专制的政策，并坚持自己的天主教化改革。然而，他任命天主教徒为地方大员的举措，最终却徒劳无功，因为这些人不具备传统贵族的声望和人脉。这些政策也令詹姆斯失去了查理在80年代初积累下来的宝贵声望，尤其受到坚持英格兰国教立场的保守派的排斥。本已被疏远的辉格党开始发展自由与同意权的观念，这将直接对王室政府发起挑战。

1686年和1687年，詹姆斯都没有召开议会，局面进一步恶化。1688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天主教徒摩德纳的玛丽（Mary of Modena）生了一个儿子，从而在继承权上超过了他第一任新教徒妻子所生的女儿玛丽和安妮，这无疑雪上加霜。反对派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而这更让詹姆斯的侄子和女婿、玛丽的丈夫奥兰治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 of Orange）看到了坐收渔

利的希望。新教联省共和国（Protestant United Provinces，今荷兰）的领袖威廉，同时也是欧洲新教徒反对法国路易十四的扩张主义的领袖。路易在1685年取消了法国新教徒可以坚持原本信仰的特权，令整个欧洲的新教徒感到紧张。

光荣革命

1688年11月，威廉入侵英格兰。在遭遇英格兰舰队的微弱抵抗后，他的军队于布里克瑟姆登陆。威廉带来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众多攻城武器（还包括几千支火枪，用以武装支持他的新教支持者），显然是打算与詹姆斯大战一番。

这次后来被称为“光荣革命”的事件，是最后一次针对英格兰的成功入侵，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君主被取代的政变。而接下来的一系列政治与宪政变革，则都来源于二者。内战似乎一触即发，但詹姆斯却认定自己没有胜算。他抛弃了自己的军队。随着威廉向伦敦挺进，王室军队士气节节衰退，权力也出现了真空。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世袭继承的传统被打破，威廉最初也承诺自己不会染指王位。但随着形势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詹姆斯被迫流亡，威廉明确地表示，自己将争取王位，但不会把它让给自己的妻子。

1689年，威廉宣布，由于詹姆斯离境退位，王位空缺，他引发的危机也就此解除。但实际上，詹姆斯是被迫离开的。而作为詹姆斯的继任者，威廉和玛丽被宣布为共同君主，只有在两人死后，王位才会归还给玛丽的妹妹安妮。通过宣布“补缺”，而不是重新选举君主，有利于避免任何意外状况。所有天主教徒都被排除在继承序列之外。

光荣革命还导致“雅各布党”（Jacobitism）的诞生，它得名于詹姆斯的拉丁文写法“雅各布斯”（Jacobus）^[5]。然

而，威廉入侵所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给苏格兰和爱尔兰造成诸多苦难的内战，它同时也是与法国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697年。路易十四希望继续维持詹姆斯二世的权力，于是为他提供了庇护与支持，还向爱尔兰派去了一支军队。尽管雅各布党最初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打了几场胜仗，但他们于1689年在苏格兰被击溃，随后在爱尔兰也节节败退，尤其是博因河战役（1690年）和奥格瑞姆战役（1691年）。从1692年起，威廉的军队控制了爱尔兰。这场战争不仅划定了《革命立法》（Revolution Settlement）所确立的政治、宪政和财政形态，也在英国内部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对18世纪的辉格派观察者来说，光荣革命的意义堪比图腾，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差异性的重要起源。他们看到的是1689年《宽容法案》（Toleration Act）带来的宗教宽容、1694年《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确立的定期选举、通过1695年《执照法案》（Licensing Act）废止的出版前审查制度，以及一个由进步知识分子，尤其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组成的英国。

这种观感，在1988年的光荣革命300周年纪念活动中仍在继续。这场革命被定义为自由和宽容精神的胜利，创造出一个适合英国人生活的政治世界。然而，从苏格兰或爱尔兰的角度来看，这种解释从来都无甚意义。此外，那些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英国社会无法抗拒自身对进步和自由普遍渴望的表现，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激烈的断裂，就像当时的人们一样。由于雅各布党的存在，继承权问题一直很棘手，直


到1746年乔治二世的次子坎伯兰公爵威廉在卡洛登取得胜利，这一问题才宣告彻底解决。

然而，议会的作用现在更大了，比查理二世时期更甚，更不用说詹姆斯二世时期。1689年，议会通过《权利法案》

(Bill of Rights)，误导性地宣布詹姆斯抛弃了王国，同时还禁止所有天主教徒继承王位。而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无嗣而终的安妮女王，其王位由汉诺威选帝侯乔治继承，他是詹姆斯一世的后裔，即詹姆斯一世女儿伊丽莎白的外孙。大多数政治活动都通过议会完成，逐渐接受了选举、票决、政党、大臣等一系列规范程序，那个阴谋与叛乱的世界则渐行渐远。即便雅各布党仍是一个潜在的挑战，他们在1715—1716年以及1745—1746年于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掀起波澜，但大多数政治动荡的因素现在已经消除。当时的反对党辉格党成员乔治·利特尔顿 (George Lyttelton) 在他广为流传的作品《英国版波斯人信札》(Letters from a Persian in England, 1735) 中，观察到一种转变，即查理一世时代的那种对于政治和宗教分裂的“热情”，到如今已经烟消云散了：“除了狭隘的个人利益之外，我们对一切事物都漠然处之、毫无兴趣；我们对宗教、美德、荣誉，甚或是国家的利益都无动于衷。”^[6]利特尔顿认为长此以往，英国人的自由会因此受到威胁，而到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英国和美洲殖民地的激进主义者将会专注于这一主题。

帝国初长成

议会还通过订立规则，为海外贸易增长、跨洋势力扩张以及新领土的管理提供了帮助。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欧洲海外活动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英国的表现非常糟糕，尽管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在1497—1498年的航海活动为英国获取了纽芬兰水域的渔业资源，但并未带来多少收益。英国的船队没能找到直接驶向美洲北部的西北航道，也没能找到通往亚洲北部的东北航道，也没有人能像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为西班牙攫取美洲人的赔款那样，为英国带回真金白银。

尽管如此，长距离的航海变得越发重要，尽管途中遭遇的风暴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通过航海与南亚、东南亚以及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建立贸易联系，主要目的是获取香料。这家公司最终成为英属印度帝国的基础。 图像

北美洲似乎是一片不太有利可图的大陆，但1607年，弗吉尼亚公司在詹姆斯敦（Jamestown）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与此同时，1620年，五月花号在科德角登陆，开始发展新英格兰殖民地。法国、西班牙、瑞典和荷兰也先后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但英格兰人在与他们的对抗中占据了优势，比如率先由荷兰人开拓的新阿姆斯特丹，因英格兰人的征服而变成了纽约（New York，“新约克”，以约克公爵詹姆斯的名字命名，即后来的詹姆斯二世）。苏格兰人也曾试图在新斯科舍省和新泽西州进行殖民统治，但不太成功。

英格兰也建立了一些岛屿殖民地。继百慕大（1613年）之后，英格兰在西印度群岛拓展了自己的势力，建立起圣基茨（1624年）、巴巴多斯（1627年）和尼维斯（1628年）三个殖民地。最大的殖民地牙买加，直到1655年才被收购。不过到17世纪末，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已经能够为英国及欧洲其他市场提供蔗糖，成为物资再出口的主要来源；当地的生产工作则由从西非运来的奴隶完成。英国开始成为奴隶贸易的主导国家。

除了资本的可获得性、航运条件的改善，以及制度的发展外，政府对于海外贸易和发展殖民地的支持也很重要。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对殖民地的关注有限，他们更热心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动向。而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都将英格兰定位成海上和商业强国。《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试图对海外贸易进行控制和规范，确立了明确的国家优先权，并且不惜为此与当时已经是海上和商业强国的荷兰开战。与此同时，英国的海外经济也得益于荷兰资本的输入，1689年威廉三世登基后更是如此。17世纪末，新的殖民地相继建立，尤其是在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移民迁入的速度也颇为可观，到1700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了法属北美殖民地。英国的大西洋体系比北大西洋其他殖民国家更加强大。

此外，到1700年，英国的海军实力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海外贸易份额也大幅增加。贸易的增长不仅带来了商业繁荣，烟草、咖啡、茶叶和蔗糖的大量涌入也导致了饮食习惯和时尚潮流的转变。规模经济成为关键因素，而这就需要大量资

本的支持。因此，伦敦作为货币市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对于不断增长的海外经济运作的意义举足轻重，尤其是在当时殖民地往往资本短缺的情况下。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资本的创造、调动和引导的意义上，资本主义对于英国与全球联系的发展，以及更狭隘地，从海外殖民地及其活动与全球经济活动中获益方面，都至关重要。这种资本流动为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从中汲取活力。企业主义则成为英国社会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17世纪后期。

规模经济也改变了英国人的品位，尤其是创造了全新的消费时尚。这些新时尚利用了17世纪普遍存在的消费主义背景，不仅包括购买昂贵的制成品或进口商品，如衣服、书籍和枪支，还包括购买相对普通、价格低廉的商品，如扣子、别针、针织袜和淀粉。

国际贸易也集中在主要港口伦敦，进一步凸显这座城市在全国的重要性：伦敦人口从1500年的5万到6万，增加到1600年的20万，到1800年则已经接近100万。1661年，日记作家、海军官员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乘坐驳船来到布莱克沃尔（Blackwall），“察看了码头和新船渠……以及即将下水的新商船，非常气派”。为伦敦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和补给，成为整个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以伦敦为中心的定期航线网络在建立全国性运输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印刷术、新教和议会的发展，伦敦对国家想象的掌控力比1650年要强得多。伦敦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整个国家

高速变革的源头，同时也成为对这一时期的变革进行定义、阐释和论辩的文字、思想以及形象的源头。

在出版物当中，关于航海的著作对于英国商人意义重大。1699—1700年，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驾驶帕拉莫尔号（Paramour）——他要求威廉三世为他提供的军用帆船——开始对南太平洋进行考察。通过这次远航，哈雷获取了丰富的可供分析与发表的信息。他在1689年绘制出了信风图，1693年绘制出了第一幅科学天文表，1701年绘制出了地磁图，这些都成为航海家的重要工具。

1702—1713年与法国的战争，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为英格兰带来了新的收获。新斯科舍省落入英格兰人囊中，英格兰在哈德逊湾和纽芬兰的地位被法国接受。此外他们还从西班牙人那里得到了直布罗陀、米诺卡和与西班牙新大陆的有限贸易权。国际竞争和冲突有助于引导政府的发展，既可以产生结构性因素，又意味着计划外的压力，尤其是战争资金所带来的压力。这种竞争也提供了一个背景，使得国内的情况可以通过相对的国际效力来评估，尤其是对法关系，从而导致新机构的产生，如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以及周期性改革的爆发。

1707年与苏格兰的议会联合，是这一变革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反映了人们对继承问题的担忧，尤其是安妮死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以及苏格兰在外交政策上可能采取不同路线的紧张局面。除了安全和政治问题，苏格兰还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苏格兰经济的大多数方面都处在低

迷状态，因此有影响力的阶层希望可以从颇为可观的英格兰市场以及不断扩张的帝国所带来的经济可能性中分一杯羹。不过苏格兰内部的分歧也在这一联合达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支持联合的主要是先前致力于《革命立法》的长老会。

但英国海外势力的全盛期尚未到来。1739—1748年与西班牙的冲突——“詹金斯之耳战争”（the War of Jenkins' Ear），以及1743—1748年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对法作战，让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预期收益大打折扣，同时英国在战场上也难求一胜。而东印度公司方面，直到1757年罗伯特·克利夫（Robert Clive）在普拉西（Plassey）战胜孟加拉王公，才正式确立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重要地位。法属加拿大要到1758—1760年才被征服，1759年詹姆斯·沃尔夫在魁北克城外战胜法军，从而攻克了这座城市。

尽管如此，海军的蓬勃发展却已经在集体想象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一进程在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的一首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统辖不列颠尼亚，统辖四海

不列颠人永不为奴。

而在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的清唱剧，如《扫罗》（Saul）中，其主题是把英国看作现代的以色列，一个需要履行圣经式爱国主义的民族，从而使英国光荣而“天选”的命运主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时评者们则把国家认同、政治体制以及海洋性特质联系在一起，如

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yne）在他的《今日大不列颠》（*Magnae Britanniae Notitia: or, The Present State of Great Britain*, 1726）中大肆宣扬道：

大不列颠可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国，而这实至名归，因为它是一个拥有众多商业港口和避风良港的岛屿。天然产品、蓬勃的制造业、国家在关税和税收方面的极大优惠、训练有素的海员、不断提升的航运能力、富于自由气息的宗教、舒适宜人的气候、我们政府所提供的便利与安全保障，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我们海上贸易的发展。

这并不是一个充斥着单纯的服从、依靠秩序运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贵族的霸权仍会被看成是自私和损害而遭到抨击。但是，如果说世袭等级制度已经面临广泛批评，或是紧张关系只是出现或更多出现在不同社会等级之间，而非等级内部，那也是一种误导。18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紧张程度可能有所加剧，但直到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在英国掀起波澜，阶级政治的概念才得以发展出来。偷猎行为（poaching）是社会紧张关系一个更长期的证明。

理念世界

与此同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在其他方面发生着更为深刻的变化。科学变得越发重要，成为创新的源泉。认为人类只需要通过教会的解释或《圣经》了解上帝想法的观点，被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新思想取代，即上帝希望人类可以找回在亚当从恩典中堕落时失去的对自然的掌控。这一思想为17世纪末的科学革命铺平了道路，使得人们在探索自然法则的运作方式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在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领域，而这些大多与1660年成立的皇家学会，以及艾萨克·牛顿爵士（1642—1727）有关。牛顿的运动定律揭示了一个连贯的宇宙系统的存在，它可以在机械与数学层面和谐统一。

培根等人向权威发难，但由于科学革命同时又具有将新的学问与当时的精英阶层及其所关注的问题进行调和的能力，这种挑战便被转化成了新的共识。在早期以宫廷为主导的赞助模式的基础上，皇家学会确保了科学可以为皇室荣耀以及国王领导下的进步做出贡献。

全新的科学与医学模式诞生了：对观察、实验和对规律的仔细推导的强调，与知识的增长以及更进一步理解的信心相结合。这种结合面向现代，不仅让人们有机会重新思考宇宙，而且为理解地球，尤其是自然世界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的发展渐渐从传统的宗教叙事中脱离出来。

宗教多元主义带来的不只是紧张局势和宗派主义，它最终还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宽容，首先是在事实层面，然后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立法上。约翰·洛克的思想启发了一种新的人性观，即允许宗教观念的多样性被认可为一种真诚，而非异端或罪恶。因此宽容取代了迫害（强迫或谴责）。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英国逐渐被接纳，最终导致了宗教多元化和现代性。但欧洲大多数国家都缺乏接受宗教多元化的意愿，认为这只是一种不幸的权宜之计。教会在确定真理方面的作用被更宏大的多元主义取代，后者既提供了机会，也提供了需求，让其他角色行使权利，或者至少是参与其中。

这种情况与英国教会的政治地位有关。英国教会的权力十分受限，尤其是在光荣革命之后，它不得不接受清教徒相当程度的宗教自由。但一些人就此认为英国教会缺乏支持或是能量，却也是不合理的。相反，教会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坚定的，尽管18世纪的主要宗教发展——卫理公会，可以部分看作是对圣公会既定的信仰模式的反动，并且最终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教会。

在迈向科学愿景与宗教虔诚的同时，一种不同于标准现代性叙述的现代性也同步出现。印刷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学识渊博的论文、小册子、印刷成册的民谣集和版画，这些内容中都涉及了对巫术的评论，如雷金纳德·斯考特（Reginald Scot）的《巫术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Witchcraft*, 1584）和约翰·科塔（John Cotta）的《巫术的审判》（*The Trial of the Witchcraft*, 1616）。对魔鬼与灵魂真实性的确信，有助

于让人们相信女巫似乎也真实存在。在威廉·罗利（William Rowley）、托马斯·德克尔以及约翰·福特（John Ford）的剧作《埃德蒙顿的女巫》（The Witch of Edmonton, 约1621）中，孤苦伶仃、饱受欺凌的老妇人伊丽莎白·索耶，在与魔鬼达成协议后，成为一名女巫。

此外，占星读物也大受欢迎，如《星象使者》（The Stary Messenger, 1645）的作者威廉·利里（William Lilly），其作品销量达数千册。1692年的伦敦地震被视为上帝盛怒的警示，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18世纪50年代，尽管当时有影响力的评论家也曾提出质疑。占星术在18世纪渐渐没落，但到18世纪90年代，仍有大量此类作品在市面上销售。此外，对巫术、占星术、宗教天命论的信仰，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的信仰，都被看作是人类与神圣空间持续而密切互动的表现。

这种情况也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当时很多作品都涉及了人与上天的联系。这不仅体现在明确的虔敬、哲学和伦理主题的作品中，也表现在虚构文学当中。其中包含罪恶、救赎以及走向救赎的经典主题，也出现了一些超人类（super-human）对人类过去和现在生活进行干预的情节。这种干预可以是多种形式，主要通过神圣审判，或至少是有目的的、以不同方式呈现的造化弄人。其范围不仅包括历史剧和正剧，还包括“灾星下的恋人”一类的罗曼史，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 and Juliet），或是以反复身份错误造成混乱为主要情节的喜剧，如莎士比亚的《错中错》（Comedy of Errors）。

人们对巫术的越发怀疑——尤其是在18世纪，可以看作心态转变的证据。在苏格兰，1662年后，关于巫术的起诉和处决都在减少，最后一次大规模猎巫行动发生在1697—1700年，最后一次起诉则发生在1727年，而且是在远离苏格兰权力和社会中心的多诺赫（Dornoch）。英格兰各地仍普遍相信女巫的存在。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相信世上有鬼魂和鬼怪，并在日记中收集关于闹鬼的案例，这项工作贯穿他的一生。然而，越发明显的趋势，是将人与施害者拉开距离，使后者非人格化。对邪恶的重新概念化不仅对宗教情感的转变至关重要，还使得人类对自身生活的广泛背景产生了新的理解。对天意和超人类直接干预重视程度的下降，鼓励人类着手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进行改造。人不能再被动地屈从于自然，成为日后革新与通过新方案解决种种问题的重要思想动力，这一点不仅对18世纪的农业、交通和工业革命的发生至关重要，同样也成为对这一系列革命的积极反馈的心理准备。

1772年，一场盛大的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葬礼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伏尔泰将此描述成“一位为他的子民奠定千秋基业的国王的葬礼”。随后，在1731年，为他铸就的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也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科学家们享有的声望，日后被以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为代表的工程师取代，这也再次体现了英国独特的成就文化（culture of achievement）。当时的说法是经验论带来实用性，从而将神圣目的与国家实力联系起来。关于解决海上经度问题的努力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尤其是议会在1714年的立法，带来了一个最

终在1773年颁发的奖项。而通过科学发展带来的对观察、实验和数学方法的关注，鼓励了对信息的收集和数据的使用，这一点也帮助政府决策进一步优化，缩短政策尝试与优化的周期。

对物理规律的更多理解，对制造系统的发展十分关键，因为它的基础便是对物体更多的操控方法，尤其是推动、提升和旋转。创新越发变得可行且可控，这使得人们可以更有效地对自然资源加以利用，尤其是水、煤和金属。可以用于深层采矿的抽水机成为可能。对机械原理的理解则使杠杆和液压的使用更加容易。于是，科学开始指导人类，按照上天的意图，更好地利用大自然的恩赐。

注释

[1] 英国作家，代表作是以托马斯·克伦威尔为主角的历史小说《狼厅》《提堂》。

[2] 此处的玛丽女王指玛丽女王二世（Mary II，1662年4月30日—1694年12月28日），“光荣革命”后，与丈夫威廉三世一同登基，成为英格兰的共治者。

[3] 指两个或以上被国际公认为主权国家，共同拥戴同一位国家元首所组成的特殊国与国关系。

[4] 即制造军舰的税费。长期以来，英格兰只有沿海各郡需要缴纳这一税费，但查理决意越过议会审议，直接向全国征收造船税。

[5] 国内多将“Jacobitism”译作“詹姆斯党”。

[6] Lyttelton, Letters (4th edn, London, 1735), pp. 221 - 2.

第四章 帝国巅峰：1750—1900年

1750—1900年间，英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强国，无论是在领土层面还是经济层面。而作为一个智识强国，英国也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政治制度方面的典范。这些变化是相互关联的，但因果关系往往不甚明晰。在强调英国在变革中的例外主义的同时，变革中其他未被关注的方面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另外，有关英国的发展，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和帝国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更广泛的西方进程的一部分，同样也值得思考。然而在一般情况下，英国人并不会思考这个问题。相反，人们似乎有一种感觉，认为英国这个国家天生便独一无二、举足轻重。在探讨英国历史时，这种感觉也务必加以考虑。

在任何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叙述中，国内政治似乎都被排在工业变革之后。考虑到这一变革在极大程度上打破了此前时间的周期性，这种主次安排是合理的。工业转型使得历史不会再重演。因而这一转型表明，那些基于它产生，并因为长期使用而获得合法性的安排将不再始终有效。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依旧重要，因为它们将帮助这些转型成为可能。经济变革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压力和大规模混乱，但这一时期社会或政治稳定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崩溃。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无论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危机时期，还是19世纪中叶欧洲各地革命陆续爆发之时，英国都没有发生革命。

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之火并没有蔓延到英国。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苦难和不满不值一提，但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应将其夸大。

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体现在工业、贸易、金融、运输和农业等方面。相比其他国家，英国经济不仅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优势。这一阶段的转变给见多识广的外国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他们很容易忽视不时发生的工业萧条的影响——对社会福利体系造成了严重打击。文化变革是诸多创新的核心因素，这种对变革前景的坚信和向往，塑造并反映了一种进步意识。从1759年起，专利数量显著增加，证明了人们对变革的盈利可能性的兴趣。而在生产的同时，消费也得到发展，全国市场的一体化越发影响各地的生产，报纸也不断为消费增长摇旗呐喊。消费有助于推动贸易和工业活动。商业切实地成为英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尤其体现在城市景观上。常设商店开始对流动集市进行补充，进而渐渐取而代之。

工业活动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专业化程度变得更高，同时劳动分工更细，资本增长的速度也越发可观。对持续、定期、可预测的劳动的需求，导致了不同形式的劳动控制，包括工厂时钟的出现。对工业的迅速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资本、运输、市场和煤炭。煤炭让英国避免了有机经济的局限性，即依赖于树木生长的经济。树木可以被砍伐用作燃料，但其供应能力有限。相反，有了煤炭，英国就可以利用储量丰富的化石燃料，获得非常显著的比较优势。在16世纪和17世纪使用率已经大大提高的煤炭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增加了人均可利用能源，使得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可能。先前的背景也

不应忽略，无论是否可以称之为“农业革命”，农业的发展都有助于确保在农业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大大增加的非农业人口可以被养活，无论这些人是工人还是商贩，生活在城镇还是农村。

18世纪的农业发展，包括大规模使用含氮植物，提高了作物产量和土地利用效率；圈地的普及，则使得土地管理模式发生改变。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食物产量的提高有效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成本。农业发展也使得地主及其佃户从中获益。尽管这一时期的工业增长至关重要，人均产出大幅提升，但农业仍是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以及财富的主要来源。它也依旧是国家经济最重要的部门，为税收、政府活动、教会（什一税）和土地所有者（租金）提供经济基础，同时提供了维持社会制度继续运行的大部分财富。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是有限的，较之欧洲大陆国家，英国的土地所有权更加集中。

与交通、工业以及其他方面一样，农业发展的主导因素同样在变革。变革被视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手段。因此，在农业方面，新的机械与新的农作物、选择性的动物繁殖实践相互配合。这些变革通过实验产生，基于实践，而非理论的发展。科学的应用成为关键因素。一些贵族，如绰号分别是“萝卜”汤森（Turnip Townshend）和“诺福克的科克”（Coke of Norfolk）的第二代汤森子爵查尔斯^[1]和日后成为莱斯特伯爵的托马斯·科克（Thomas Coke），都很乐于以地主的身份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农作物改进工作当中，成为当时贵族文化的一个重

要方面。变革与农业、矿业、通信以及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作为一种易于运输和操控的燃料，煤炭提供了比木材和木炭更加高效的动力来源。然而，煤炭必须被开采和运输，这两项要求成为创新和建设活动的动力，尤其带动了运河与铁路的建设。鉴于用驮马和驳船从约克郡的米德尔顿煤矿向3英里以外的利兹运煤的高昂成本，查尔斯·布兰林（Charles Brandling）在1758年获批了一项议会法案，即“铺设一条货车道，以便更好地为利兹镇和附近地区提供……煤炭”，这是第一个授权建设铁路的法案。1780年，一台纽科门蒸汽机被安装在米德尔顿，而到18世纪末，矿坑的平均年产煤量已经达到78500吨。

蒸汽机是新时代的标志。未来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1785年前往伦敦时，参观了采用蒸汽动力的面粉厂新阿尔比恩面粉厂（New Albion Mill）。他还参观了西米德兰兹的工厂，以及英国南部的风景园林。持续变革与寻求进步是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随着气缸铸造和镗孔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在1774年和1781年生产的新镗床，纽科门蒸汽机得到了改进。这些发展使得蒸汽机可以更加高效地使用燃料，运行也更加规律。1769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 1736—1817）成为完善蒸汽机独立冷凝器的第一人，他为这一改进申请了专利，这种改良机器更加节能，因此运行成本更低。1782年，瓦特进一步

申请了创新专利，使旋转运动更加均匀，从而提升了蒸汽机驱动工业机械的能力。

这种潜力的开发，是一个融合了企业主义精神、投资和行为自由的过程，对工业发展意义重大。例如1779年伯明翰的纽扣制造商詹姆斯·皮卡德（James Pickard）在他的纽科门蒸汽机上安装了一个曲柄和飞轮，以便利用它的动力来驱动一个可以研磨金属的磨坊，这一创新极大地扩大了蒸汽机的市场。1828年11月8日的《埃克塞特周报》提到，“蒸汽动力的应用是多么先进，几乎遍及技术的每一个方面”。

人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瓦特建造了一座纪念碑，相关的认购会议在1824年由第二代利物浦伯爵、时任首相罗伯特亲自主持。作为一个显赫且活跃的人物，乔治四世（George IV）捐出了500英镑，占到了所筹款项的十二分之一。而在英国其他地方，如格拉斯哥、曼彻斯特、格林诺克和伯明翰，瓦特的雕像也被竖立起来。

冶金业也有重要发展。焦炭取代了煤炭，用作钢铁冶炼。亨利·科特（Henry Cort）在1784年发明的浇铸和轧制方法，通过煤炭进行生产，比用木炭锻造和精炼成本更低。

对煤炭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交通发展，首先是运河（包括河流的运河化），然后是铁路。1757年建造完成的桑基溪航道（Sankey Brook Navigation），将煤炭从圣海伦斯运往利物浦，从而刺激了默西赛德郡（Merseyside）煤炭消耗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促使了柴郡盐业的扩张，后者需要以煤炭为燃料制

盐。随后1761—1767年，布里奇沃特公爵运河（Duke of Bridgewater's canal）建成，这条运河独立于任何自然河流，其目的是开发兰开夏郡的煤矿。随后布里奇沃特又修建了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运河。

单一的发展是重要的，而变革累积在一起，则创造出一种日新月异的观感。例如，1766—1770年间修建的斯塔福德郡和伍斯特郡运河，使斯塔福德郡的煤和铁得以运往塞文河（River Severn）；1772年第一艘运煤驳船通过新的伯明翰运河抵达伯明翰；1793年蒙克兰运河（Monkland Canal）的开通刺激了拉纳克郡（Lanarkshire）煤田的发展，从而满足了格拉斯哥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再加上蒸汽动力在煤矿开采、高炉，以及新发明的轧钢机和滚切机的应用，这一系列变化带来了经济活动的新地理格局。蒸汽动力将工业从原本依赖水力的河流沿岸地区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煤炭周边的工厂兴起，尤其是英格兰东北部、兰开夏郡南部、南威尔士，以及苏格兰中部，这些原本都是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这也突出了经济变化的区域性特征。

在地方、地区和国家层面，新矿井、工厂和码头的选址则是对运河运输的可能性的回应。1818年，不列颠铸造厂（Britannia Foundry）在德比郡建立，以生产优质的铸铁产品。这一工厂的选址位于德文特河畔，通过德比郡运河与米德兰兹运河网相连，最终通往海外。1827年的《斯玛特商贸目录》（Smart's Trade Directory）显示，从位于伍尔弗汉普

顿的皮克福德运河码头——一个主要的铁制品制造中心——出发，货物可以直接发往73个城镇，包括布里斯托尔、利物浦、伦敦和曼彻斯特。随着伍尔弗汉普顿这样的内陆城镇，与德比郡、斯塔福德郡和沃里克郡这样的郡相互连通，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发生了转变，新的地理格局就此形成。由于水路和工业的相互刺激，西米德兰兹、兰开夏南部以及南约克郡对英格兰境内的交通变得更加重要。

围绕资源、生产、市场和就业的新经济地理格局就此形成。到18世纪90年代，产业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穷人救济支出等指标上。在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活动的郡，如苏塞克斯，或是工业衰退的郡，如埃塞克斯、诺福克和萨福克，按人均计算起来这一支出要高出不少。实际上，这些地区的贫困是19世纪初一个重要主题，它导致了乡村暴乱，如斯温运动，同时也导致了移民流出。

区域产业转移反映的是一系列因素。英格兰南部普遍出现了工业危机，因为以煤为基础的制造业带动了其他地区的工业兴起。从18世纪80年代起，约克郡西区的毛纺织业获得了比德文郡、埃塞克斯郡、诺福克郡和伍斯特郡等地竞争者更大的价格优势。然而，涉及其中的因素不只有煤炭。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劳动力更便宜，当地纺织业也较少受到传统做法的限制。

技术革新和企业主义能量的重要性在德文郡的蒂弗顿体现得淋漓尽致。约翰·希斯科特（John Heathcoat）在当地建立了一家生产网和花边的机器工厂。1816年，他的专利梭网机对工人工作机会的威胁，导致他先前在拉夫堡的工厂被一伙暴徒

破坏，于是希斯科特才把工厂搬进了蒂弗顿的一家废弃棉纺厂。这家工厂的产品对东德文郡的花边生产造成了冲击，但也展示了在没有煤炭的情况下可以取得的成绩。此外，希斯科特的前合伙人约翰·博登（John Boden）于1825年在巴恩斯特珀尔（Barnstaple）东部开设了德比花边厂。到1830年，他雇佣的工人达到了1000人。在工厂的带动下，该镇人口由1821年的5079人上升到1841年的7902人。在这里和蒂弗顿发展起来的生活方式，以及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密集居住区，在英格兰北部——而非南部——更为典型。

工业地区人口增长明显：在煤矿及工业中心达勒姆郡，人口从1700年的约7万人增加到1801年的15万人。在1700—1755年，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3%，而在1755—1801年间，苏格兰的增长率为0.5%，英格兰为0.8%。此外，婚姻和生育之间的关系也不再那么紧密，记录在案的非婚生子女率从1.8%上升到5%。另一方面，婚姻也变得更加普遍，同时也更为常态化，只有不到9%的人保持独身。此外，到1800年，人们从成年到步入婚姻所需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因为这一时期男女的平均结婚年龄分别下降到25.5岁和23.7岁。这一数据反映了一些变化，主要是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自由度有所增加，尤其是劳动者从“家庭成员”向“雇员”的转变。例如农场工人越来越多地不与雇主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因此对早婚的限制也开始减少。

此外，城市就业和城市生活的兴起，打破了婚姻与土地供应之间的联系，而土地供应曾是制约婚姻，尤其是早婚的重要

因素。这一变化也促进了社会自由，导致更多非婚生育产生。结婚率继续受实际工资影响，但18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增长既创造了工作机会，也让人们对婚姻生活的态度更加乐观。此外，婴儿的死亡率在18世纪下半叶也有所下降。35岁以上妇女的已婚生育率在这个世纪中叶开始上升，这一变化可能是死产率下降的结果，而它本身则可以看作是平均生活水平提高的证据。

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不断发展的城市，与制造业或相关的商业、服务业密切相关。在18世纪的东海岸地区——桑德兰、南希尔兹、北希尔兹、泰恩茅斯和纽卡斯尔，都通过煤的产出——主要是流向伦敦，以及以煤为基础的工业，如玻璃制造中收益颇丰。在桑德兰和泰恩河畔，造船业变得非常重要。

贸易是人口增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大西洋沿岸，尤其是利物浦和格拉斯哥。这两个地方的发展都得益于对美洲贸易的扩大和帝国贸易。利物浦的人口从1801年的83050人迅速上升到1851年的375955人。

如果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比较，英国的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城市化也是如此。以百万吨计，1820—1824年，英国的煤炭及褐煤年均产量为18，而欧洲其他工业强国如法国、德国、比利时和俄国，这一数据的总和为2；1855—1859年，这一数据是68比32。而在这样的数据背后，则是巨大变革的生动现实。画家们再现了那些激发人想象力的戏剧性图景，如位于什罗普赛德（Shropshire）的煤溪谷（Coalbrookdale），该地的夜晚

被炼钢厂燃烧的熔炉照亮。记者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830年1月在谢菲尔德写道：

从利兹到谢菲尔德，一路走来，沿途都是煤和铁，铁和煤……没有什么比这些熔炉顶不断涌起的黄色烈焰更壮观、更可怕的东西了……毋庸置疑……其他国家……在钢铁制造业上都无法与英国匹敌……人们称这座城市为“黑色谢菲尔德”，这毫不夸张；但是全世界使用的刀具中，有十分之九都来自这个城镇及其周边地区。

而另一方面，作为维多利亚时代人们观察世界的主要方式，在小说世界里，像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以及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玛丽·巴顿》（*Mary Barton*，1848）、《北方与南方》（*North and South*，1855）等作品，都描写了工业时代人们生活中的问题，尤其是劳资纠纷和工人的苦难。狄更斯注意到工业化导致的功利主义，以及将效率、结果视为唯一的心态。在《艰难时世》中，他把人类的各种经验与这个新世界进行了对比：“工厂里有那么多双手在上下翻飞，蒸汽机里有那么足的马力在持续奔腾。每一份力能让机器做多少活，人们对此心知肚明。”

狄更斯认为，强调事实，强调纸面上的信息和论点，是导致人们和社会问题的真实性质渐行渐远的原因。他的论点预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担忧，即以现代技术为核心讨论转型问题，忽略了社会背景和后果。像其他小说家，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一样，狄更斯也注意到，面对数据增长所带来的统计汇总压力，需要为个人在社会中留出一席之地。这样的关注既把小说家们与18世纪90年代和

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人联系起来，也使得他们与19世纪中期的拉斐尔前派画家们相呼应。

在铁路建设方面，英国同样遥遥领先，这极大地提高了整个国家作为制造和销售系统的效率，从而使得英国的工业化在具有高度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可以辐射全国。铁路的进步也更普遍地体现了国家发展的特征。货车道已经存在了很多年，马匹可以拉着货车在道路上奔驰，尤其是从煤矿到装煤码头。作为世界上第一家铁路公司和公共铁路运营者，萨里铁路公司（The Surrey Iron Railway Company）从1803年起开始运营，经营从旺兹沃思到克罗伊登的路段。自驱式蒸汽机车改变了局面，尤其使得长途运输成为可能。1804年，罗杰·霍普金斯（Roger Hopkins）在南威尔士的彭达伦和阿伯肯农之间修建了一条轨道，而理查德·特里维希克（Richard Trevithick）则在这条轨道上尝试运行了第一台蒸汽机车发动机，其本质是一台移动横梁发动机。由固定式蒸汽机发展而来的机车为铁路革命提供了技术，而工业化满足了这一进程所需的动机、资本与技能。

乔治·史蒂芬逊（George Stephenson）在1822年开通了赫顿铁路。更著名的斯托克顿和达林顿铁路则在1825年开通，旨在将煤炭运往斯托克顿港。机车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1829年，当戈兹沃西·葛尼（Goldsworthy Gurney）的蒸汽喷射泵应用在史蒂芬逊的火箭机车上时，火车速度从每小时16英里提高到29英里。从汽缸和活塞到车轮直接驱动，以及发动机改良提高水的沸腾速度，都提高了铁路的运行效率。它也很快

被证明优于曾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公路上试用的蒸汽客车。

铁路为货运和客运提供了新的选择，缩短了所需时间。18世纪至19世纪初，道路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重大改进，出现了收费公路，路面加固，更多桥梁架设起来，车厢结构进一步改进，客车和货运服务也得到提升。起初，铁路大多由小规模的企业运营，负责提供地方间的联系。煤炭运输对其业务至关重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大胆的铁路干线计划得到了推进和资助，此外，已有的线路也被连接起来，形成了长距离铁路网络。1838年，从伦敦出发的铁路延伸到了伯明翰，1840年到达南安普顿，1847年到达普利茅斯，不过全国性的铁路干线系统直至19世纪70年代才宣告完成。随着桥梁架设、隧道开凿，地理环境本身也在变化，1849年人们便可以跨越麦奈海峡（Menai Strait），来到安格尔西岛（Anglesey）。1830—1865年间，英国境内共建设桥梁3万座。由于铁路发展迅猛，运河建设工程在19世纪30年代偃旗息鼓。

此外，工业和农业也在随交通发展而改变。自19世纪40年代起，铁路发展促成了德比郡特伦特河畔柏顿（Burton upon Trent）的酿酒师缔造了一个啤酒帝国同时也帮助北威尔士的石板瓦进入城市市场。伦敦的报纸可以及时送往全国各地。19世纪70年代，铁路公司为液态奶打开了城市市场，鼓励奶农放弃农家奶酪，转而生产“铁路鲜奶”。1869年，通过铁路运往伦敦的煤炭数量首次与海路持平，不过10年后，尽管每年铁

路运往伦敦的煤炭达到660万吨，仍有350万吨煤装载在船上，驶入泰晤士河。

铁路的发展，使得许多人有机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频率出行。这种影响同时也带来了心理层面的变化。“空间”被征服。新的声音与风景带来了强烈的变化之感，尽管有人抱有怀疑，但大多数人都视之为进步。在短篇小说《呆堡镇》

（Dullborough Town, 1860）中，狄更斯将火车视为纯真丧失的理由，但同时也把它看作新经验的来源：

我们这些来自小地方的人，大部分都来自“呆堡镇”……火车站已经把运动场吞掉了。它消失了。那两棵漂亮的山楂树、树篱、草皮，还有所有毛茛和雏菊，都已经让位给了最冷冰冰的石子路……之前载我离开的那辆公共马车，名字好听极了，叫“蒂姆普森的蓝眼少女”，因为它的主人是上街公共马车行的蒂姆普森先生；现在带我回来的这台机车，大名“97号”，好不严肃。它属于“东南铁”（东南铁路公司），只会一个劲儿地往伤痕累累的路面上吐煤灰和沸水。

进步的感受，有利于鼓励风险投资，这对铁路系统的扩张非常重要。主要火车站，如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ilbert Scott）和W.H.巴罗（W.H.Barlow）设计的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St Pancras, 1873），都是铁与玻璃构成的杰作。这些火车站还改变了当地的景观以及道路规划。

公共马车颠簸、拥挤、光线不足，而火车上则很适合读书。于是，W.H.史密斯（W.H.Smith）和约翰·孟席斯（John Menzies）发展了铁路书店网络，致力于创造并满足一个崭新的市场。1845—1873年间在牛津大学和温彻斯特大学担任主教的塞缪尔·威尔伯福德（Samuel Wilberforce）曾打趣说，有一

本书名“B”打头的书，每位主教理应人手一本，那就是《布拉德肖列车时刻表》（Bradshaw's , the railway timetable）。

在虚构作品里，火车把老练的城里人的举止和风度带到了乡村，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戏剧《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1895）中格温德伦·费尔法克斯（Gwendolen Fairfax）造访赫特福德郡之时，以及H. G. 威尔斯（H. G. Wells）的小说《爱情和路维宪先生》（Love and Mr Lewisham, 1900）中埃塞尔·亨德森（Ethel Henderson）来到苏塞克斯的场景。拜火车所赐，福尔摩斯和后来的赫尔里克·波洛才有机会离开伦敦，到全国各地寻找不法之徒；苏格兰场的警探也有机会出外勤，帮助地方上的同行弟兄。铁路还带来了统一性，英国境内的时间由此需要同步划一。

铁路需要标准时间来制定时刻表，使各地交通成为可能。为了弥补东西时间的差异，铁路采用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标准时间作为“铁路时间”。时钟由铁路沿线架设的电报机来保持准确。火车还改变了邮政服务，流动邮局产生，同时火车站还有了可以不停车取放邮件的系统。1840年，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Penny Black）发行，它是根据重量确定统一邮资制度的组成部分，取代了先前根据距离确定邮资的办法。英国和爱尔兰的信件投递量从1838年的8250万封，上升到1853年的4.11亿封。

铁路旅行本身则反映了社会的财富分层制度。车厢分三个等级，每个等级的票价和条件各不相同。在伦敦至布莱顿的路线上，直到1852年，三等车厢都没有顶棚，因此旅客在全程都要忍受天气和发动机喷出的热煤灰。

希望继续保持经济发展优势的公司和城镇，必须成为并保持住交通中心的地位。在卡莱尔（Carlisle），乔纳森·多奇森·卡尔（Jonathan Dodgson Carr）改装了一台印刷机来切割饼干，取代了手工切割，并借助该市作为主要铁路枢纽的地位，将其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机器的重要性越发显著，机械化带来了利润以及大型工厂。到1821年，曼彻斯特有超过5000台动力织机，而在成为全球精纺羊毛生产和交换中心的布拉德福德，工厂马力在1810—1830年间增加了718%，该市人口则从1810年的16012人，飞速攀升到1850年的103778人。当时布拉德福德有17642台自动织机，用于大批量生产女装面料。

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工业生产越来越集中于工程、造船和化工领域，世纪初的纺织和金属冶炼则逐渐让位。随着工业化脚步的加快，工业化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差异也越发凸显，例如克莱德赛德和苏格兰西南部之间的对比便十分明显。人们的工作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到19世纪中期，在苏格兰中部地带国家拉纳克、中洛锡安和伦弗鲁的就业人员中，只有不到10%的人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不过为了养活工业地区不断增多的人口，农业活动的密度则明显加大。这体现在对许多土地的围垦和重组，以及借助排水系统改进等条件进行密度更大的土地利用。

新社会

经历工业增长的地区，人口也迅速增长。到19世纪30年代，格拉斯哥、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居民人数都超过了20万，这为新的改革派政治提供了背景。达勒姆郡的人口从1851年的390997人上升到1891年的1016562人，仅1861—1871年这10年间便增长了34.7%。在纽卡斯尔，人口从1801年的28294人增加到1901年的215328人。城市景观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变化。绘画作品，如迈尔斯·福斯特（Myles Foster）的《从风车山看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Newcastle upon Tyne from Windmill Hill, 约1871—1872）展示了先前经常表现的建筑——城堡和大教堂，现在中间已经加入了工厂的烟囱和铁路桥。

人口的大幅增长只能通过移民来实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造成的混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一部分，这在基本上满足了劳动力需求，但对个人和社区却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经济有限的地区，如康沃尔和爱尔兰，提供了大量移民。然而，随着城市人口上升，人口密度加大，过度拥挤不可避免。供水和排污能力不足所造成的问题，更加剧了城市拥挤的后果，导致1848—1849年、1854年以及1866年的霍乱大流行。此外，人口身高、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实际收入情况等统计数据表明，人们的生活总体水平并没有随着主要工业部门的飞速增长同步提升。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则表明，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的能力有明显的不足。

1750—1815年的政治

改革受到日益强调国家标准和制度供给的立法行动的鼓励，但同时也受到政治潮流的影响。1775年北美13个殖民地的叛乱，导致了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一直持续到1783年的独立战争，这在英国国内导致了对于激进主义抵制，将其与国家危机联系起来。随后，在1783—1801年和1804—1806年担任首相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的领导下，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一败涂地，再加上1793年开始的对法战争中的长期失败，都使得变革与复兴的压力进一步加剧。

美国独立战争本身暴露了英国在政治和军事力量上的局限性。在政治上，已有的帝国体系无力使新的权力形式概念化，导致了北美的崩溃。而除了数量足够可观的殖民者决心为独立而战以外，1781年军队的疲软以及海军在关键时刻的支援不力，最终导致英国丢掉了13块殖民地。不过，尽管法国（1778年）、西班牙（1779年）和荷兰（1780年）先后对英国发难，但英国海军的辐射能力还是让帝国得以继续保持对西印度群岛大部分殖民地的控制。

1783年的和平谈判表明了英国对丧失北美大部分殖民地的接受，这使得人们对整个帝国的前景，尤其是它的相对实力感到担忧。在皮特领导内阁的18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财政改革上来。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3—1815）期间，激进主义者被怀疑有亲法倾向。相反，拥立王权和教权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加强，这是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英国支持者相关思想的回应。同时，战争也倒逼了改革，旨在使英国能够应对来自法国的挑战。关键内容包括与爱尔兰的国会成立联盟、建立全国人口普查制度、扩大地形测绘局活动对全国进行详细测绘、引入所得税，以及在不采取金本位制的情况下进行国家财务管理。

与法国之间接连不断的战事，更确切地说，是在逆境中的奋战，在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雄主义，尤其是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获胜的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的力战至死，以及1815年英国步兵方阵在威灵顿公爵的带领下在滑铁卢力挫法军的猛烈攻势，集中体现了浴血搏杀的气魄、帝国命运的强势，以及准宗教性质的审判与救赎。

改革与王室，1815—1837年

然而，和国家自由一样，个人自由（一个关键的融合点）仍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定义。而且随着战争结束，政治改革也更顺理成章。然而，托利党的力量确保第二代利物浦伯爵罗伯特从1812年起担任首相，直到1827年中风才主动请辞。实际上，托利党一直大权在握，仿佛无可更改。拜伦勋爵曾在《唐璜》（Don Juan）中写道：

这世上的事没一件能够永恒，
除了辉格党永远掌不了权。

但实际上，到19世纪30年代初，托利党的秩序就已经崩溃了。随着改革作为一桩政治事业的自觉性加强，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国家层面，人们都开始习惯于谴责“陈规陋习”，攻击宗教改革前政治制度的腐败、政府的无能。但这种指责往往是不准确的，其根源在于党派主义，以及对宗教改革前英国的特性、政治文化以及成就的不了解。其实除了一部分骄纵的神职人员，当时的其他教士（大多数）还是能够全心全意地服务于教众。此外，政府的大部分职能也都能够在当时的规则之下得到履行。

但无论改革的压力有多大，对政治秩序抱有敌意都非普遍状况。例如总部位于埃克塞特的《西部先驱与家庭报》

（Western Luminary and Family Newspaper）就曾在1831年1月4日的一篇文章中抨击了“一种不服从和不满的精神”。许多

人会对这份偏向托利党和教会的报纸的观点表示赞同。实际上，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两天，刚刚被祝圣成为埃克塞特主教的亨利·菲尔波茨（Henry Philpotts）就曾投票反对《改革法案》，并于1831年10月在上议院与辉格党首相、第二代格雷伯爵查尔斯发生争执。菲尔波特对改革的反对导致埃克塞特发生暴力事件，他的儿子动用海岸警卫队驻守在主教府邸，以抵御当地激进分子的攻击。尽管布里斯托尔和诺丁汉同时也发生了支持改革的大规模暴动，但这些与1715年雅各布党在西南各郡煽动但最终失败的叛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政治文化脱离了暴力，这一转变带来了持久的影响。但经济转型仍可能引发暴力，成为激进政治的诱因。这使得1381年农民起义、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反封建起义与19世纪上半叶反对新机器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包括19世纪初抵制工业机器的卢德抗议运动，以及后来反对农业机器的斯温上尉抗议运动。

最关键的是，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浪潮中，英国王室对新的挑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尽管这种回应只是权宜之计，但它也没有像20年代的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王室那样，倒向反动事业一边。王室的这一立场对英国保守主义的定义非常重要，它能够对各种倾向做出回应，同时避开极端（极端保守主义）立场的诱惑，最大限度实事求是。

这一时期的君主们值得多加关注。乔治四世（George IV，1820—1830年在位）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庄重而又非常奢侈的游乐场——布莱顿穹顶宫（Brighton Pavilion），以及自我放纵和总是拈花惹草的个性，这些都成为讽刺漫画家的主

题；但他和他的统治活动远不止于此。重要的是，他以最生动的方式扩大了王室的影响范围，让人们可以看到他。乔治认为自己在1821年7月19日举行的加冕礼应该是一个足够奢华的大场面，于是他亲自操刀进行策划。加冕舞台被精心布置，议会为此拨款24万英镑，这是对保守价值观的重大肯定——与先前乔治三世加冕时的7万英镑形成了鲜明对比。王冠因前所未有地借用了大量珠宝而更显璀璨夺目——总共镶嵌了12532颗钻石。已经与乔治四世分居多年的妻子卡罗琳提出自己也应被加冕为王后，但遭到了乔治四世的拒绝。他下令禁止卡罗琳进入教堂，甚至命人在她面前关上教堂大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加冕仪式，但总体上，民众对这场加冕礼的反响还算积极。加冕礼有助于培养民众的忠诚度，而乔治对爱尔兰、汉诺威和苏格兰的访问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点。这些访问同样重要，表明英国王室有能力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适应自己所需要扮演的新角色。

18世纪时的英国君主从未造访苏格兰或爱尔兰。爱丁堡和伦敦联合议会是在安妮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她和她的任何王储都没有访问过苏格兰；都柏林和伦敦联合议会是在乔治三世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他和他的儿子们也都没有访问过爱尔兰。只有征服才会使国王和王子们莅临——威廉三世在1690年到过爱尔兰，坎伯兰公爵威廉在1746年前往卡洛登荒原——但乔治四世出访的原因完全不同。

乔治四世首先前往了爱尔兰，此举意义深远。爱尔兰的人口比苏格兰、威尔士或汉诺威都要多，而且，由于1801年生效

的议会联盟，爱尔兰不仅本身很重要，而且在现在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中也举足轻重。和1707年的伦敦与爱丁堡议会一样，伦敦与都柏林议会实现了合并。这次合并是在镇压爱尔兰起义，以及挫败法国入侵后实现的，两件事都发生在1798年。与爱尔兰联合缺乏共同的新教逻辑和经济转型的润滑剂，这两点在确保与苏格兰联合方面的作用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然而，尽管一开始便前景黯淡，但与爱尔兰联合的失败其实并非不可避免。实际上，直到一战后的风云突变，才使得二者的关系走向破灭。

从爱尔兰归来不久，乔治便动身前往汉诺威，在那里，他受到臣民的热烈欢迎。这是汉诺威国王对其领地的首次访问，它表明了盎格鲁 - 汉诺威国王可能寻求的发展方向。

对苏格兰访问的承诺，在1822年兑现。当时乔治非常高调地穿上了奢华的高地服饰，成功博得了人们的关注。同时，这次访问中对高地元素的强调传递了一个相当微妙的信息，即雅各布主义在现在等同于忠诚，因此先前反对汉诺威的人，现在可以投身到捍卫保守主义、社会稳定，以及反对改革的事业中，而这正是乔治本人所期望的。我们不知道乔治会对苏格兰长老会主席宣讲反对情欲、赞美婚姻和谐的布道作何感想，但他对自己道德秩序公共卫士的角色倒是已经习以为常。他表现出对苏格兰音乐、舞蹈，以及饮品，如格兰威特威士忌（Glenlivet）和阿瑟尔粥（Atholl Brose）^[2]的热爱，展示出非常现代的姿态；同时作为技术革命的标志，乔治乘坐的游艇皇家乔治号在逆风时采用蒸汽拖船拉动。皇家巡游的时代已经到

来，在苏格兰，乔治成功地把自己与浪漫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到1824年，他还会捐助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竖起的詹姆斯·瓦特纪念碑所需资金的十二分之一，宣告他对国家发展的关注。

随着年岁渐长，乔治愈发保守。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反对解放天主教徒（Catholic Emancipation）——赋予天主教徒被选举权——并在1828年坚称政府也不应对此表示支持。然而时任首相、滑铁卢一战的胜利统帅威灵顿公爵却认为解放天主教徒乃必要之举，尤其是在爱尔兰已经成为联合王国一员的情况下，同时向乔治施加了压力。愤怒的国王威胁说自己要退位，但最终还是在1829年签署了《天主教徒解放法案》（Catholic Relief Act），实行了解放。乔治愿意向现实妥协，决定了无论他自己对此有多不上心，这个国家都在他在位的最后阶段向非奉国教国家（non-confessional state）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换言之，这个国家将不再受英国教会地位和利益的支配。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梨形脑袋”路易十八复位，王位重新回到波旁家族手中。但1830年，他保守的弟弟查理十世再次被革命推翻。英国是否会掀起叛乱当时尚不明朗。改革的诉求导致布里斯托尔、德比和诺丁汉在1831年接连发生严重骚乱，直接原因则是议会关于选举制度改革的辩论：涉及投票权，以及议会选区的重新分配。直面这场危机的人已经变成了乔治三世的第三个儿子威廉四世（1830—1837年在位）；乔治三世的二儿子、“约克老公爵”弗雷德雷克已经去世了。

从性格来看，威廉虽不像乔治四世那么保守，但也并不支持大规模的改革。他对激进主义抱有敌意，但仍希望做一名立宪君主，希望可以维持和平，同时也愿意接受辉格党建立新的选举制度的要求。1830年11月，威廉登基后的大选（当时议会会随着王位的更迭而重组），已经宣称反对议会改革的威灵顿领导的托利党政府失败。随后上台的是格雷伯爵领导的辉格党政府。现在纽卡斯尔市中心的格雷纪念碑（Grey Monument）正是为他而建。格雷支持改革的主要原因，是他担心如果不进行改革，英国也会步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后尘，陷入革命的旋涡之中。然而，《改革法案》却在1831年4月于委员会审议阶段被否决。

格雷于是寻求解散议会，为新的选举做准备，希望可以让下议院更具改革意愿。威廉同意解散议会，进而同意立即举行第二次大选，这让他改革支持者中间人气大涨。他本可以拒绝再进行选举，直接任命一位新首相。但威廉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如此主动出击。

1831年9月，格雷在大选中以绝对优势的票数再度当选后，下议院通过了第二次《改革法案》，但该法案再次遭到托利党主导的上议院反对。虽然讨论中一度出现了双方各让一步的可能，但民众方面的反应却十分激烈，甚至出现严重的骚乱。1831年12月，第三次《改革法案》在下议院发表，先前争论的内容都得到了修改，并在二读时以多数票通过。但上议院的态度仍然至关重要，尚不清楚这些修改是否可以确保法案得到足够的支持。国王被要求任命足够多的改革派贵族进入上议院，

以确保法案可以通过。虽然威廉尊重上议院的地位，同时也对改革的内容、倾向性，以及格雷无法将自己的政策与激进的辉格党本身区分开感到担忧，但他还是不愿意地同意了格雷方面的要求。他同意增加改革派贵族，而且还保证会在必要的时候向贵族施压，以确保法案可以通过。上次因为这样的原因增加贵族席位还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当时执政的是安妮女王。为了确保《乌德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通过，她在1711年增设了11个贵族席位，而这份和约最终保证英国在1713年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脱身。

该法案在下议院三读后进入上议院，但在1832年5月7日的一项修正案中再度失败。格雷要求威廉增加50名自由派贵族，但威廉只肯增加21名，于是格雷再度提出辞职。威廉转而向托利党求助，但托利党内部的分歧导致他们无法给出替代方案。威廉不愿意再进行一次大选，从而面对更多混乱和不确定性，于是只好再次找到格雷，并表示接受他增加贵族席位的要求。但实际上威廉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给托利党贵族写了一封通函。最终，在威灵顿的带领下，许多托利党贵族决定弃权，而上议院也只能让步。

在紧要关头，国王之所以支持格雷，一是改革得到了广泛支持，二是如果不选择改革，很可能便要面临大范围的失序状态。此外，因素还包括托利党的分裂，以及格雷同样反对进一步的改革，而且他认为在《改革法案》后，英国政治并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实际上，这份后来又被称为《第一次议会改革法案》的法案中，最大的变革体现在选举权和政治格局方

面。英国选民一举增加了50%，因此当时的选民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约五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席位分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信息化手段被采纳，以制定更合理的制度。应运而生的“德拉蒙德量表”，可以根据人口、房屋数量以及纳税额等标准，对议会各区进行综合排名。

选民较少且出现腐败状况的选区代表资格被取消，以奖励给那些发展中且尚无议员代表名额的城镇，如伯明翰、布莱克本、博尔顿、布拉德福德、利兹、曼彻斯特、奥德汉姆、谢菲尔德和桑德兰等。爱尔兰和苏格兰也通过了各自的相关法案。

《改革法案》有助于强调代表所能够代表民众的程度，从而使民众对政治制度的广泛接受得以有效维持。它提升了英格兰北部的政治重要性，而这一区域已经成为国家的工业中心；此举是在政治制度上对社会变革提出的肯定。

威廉在改革中的作用确保了她的受欢迎程度。1837年，当威廉的侄女维多利亚即位时，格雷曾对上议院宣称：“如果有君主配得上‘爱国者君主’（Patriot King）这一称号的话，那一定是威廉陛下！”在支持选举改革的漫画《改革者大战老橡树疙瘩》（The Reformers' Attack on the Old Rotten Tree）中，威廉被画在“宪法山”上，正在为改革进程鼓劲加油；在1831年的漫画《权力的平衡》（The Balance of Power）里，辉格党坐在跷跷板压低的一端，而为其加持重量的包括王冠，以及报刊（最突出的是《泰晤士报》），另一端的托利党则被跷上了天。以威廉名字命名的酒馆数量远多于乔治四世，这一对比同样颇具启发。

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与社会

1837年，年仅18岁的美丽少女维多利亚继位，成为自1558年的伊丽莎白·都铎之后又一位在未婚状态下继承王位的女性。和伊丽莎白一样，维多利亚的登基之路颇为复杂，体现出王朝政治的变幻莫测。但与都铎王朝时不同，这一路上不再有非自然死亡的阴影笼罩。本来，作为乔治三世第四个女儿的女儿，维多利亚继承的可能性跟1714年汉诺威王朝入主一样微乎其微。但正如经常上演的剧情那般，主角们的过世和不育为原本的配角开辟了道路。尽管私生子众多，包括克拉伦斯公爵——即后来的威廉四世——和女演员多萝西·乔丹（Dorothy Jordan）所生的10个子女，但乔治三世的长子乔治四世、次子约克公爵弗雷德雷克，以及三子威廉四世的合法子女总共只有3个。然而，乔治四世的女儿夏洛特在生下一个死胎后去世了，而威廉四世的合法妻子阿德莱德所生的两个女儿也在婴儿期便夭折。

由于这些原因，1820年去世的肯特公爵的女儿维多利亚突然成为王位继承的不二人选。幸运的亲王，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Saxe-Coburg-Gotha），他跟维多利亚的婚事由他的叔叔、颇具影响力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大力推动。两人在1840年结婚，这桩政治联姻最终成为一段佳话。实际上，维多利亚选择阿尔伯特还违背了母亲的意愿。阿尔伯特是个热情的丈夫，对于那些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意味着性压抑的人来说，他跟维多利亚的生活出奇的激情澎湃。

在政治方面，阿尔伯特的学习速度很快。他迅速掌握了英国政治制度的细节，强调王室必须采取中立立场，并帮助淡化维多利亚由于辉格党首相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而产生的党派偏好。这一点颇为重要，因为在领导人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的带领下，托利党的人气正在复苏。最关键的是，阿尔伯特亲王尽到了自己的王朝责任。他跟维多利亚子嗣颇丰，从而避免了不受欢迎的坎伯兰公爵厄内斯特——乔治三世的第五个儿子、维多利亚的叔叔——继承王位的危险。由于汉诺威王国不接受女性继承，欧内斯特便在1837年成为了汉诺威国王。

阿尔伯特还在公共生活的诸多领域表现活跃。他的声望、魄力和谋略使他成为一个可靠的代表，同时他还通过自己作为多个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积极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因此，在议会大厦遭逢祝融之灾后，阿尔伯特被任命为皇家委员会主席，负责遴选壁画装饰新议会大楼内部。阿尔伯特以这次重建为契机，开始推广英国艺术。

更富戏剧性的是，他对艺术推广的帮助并未止步于此。自1843年起，他开始担任艺术协会的主席，随后还在推动1851年于海德公园举行的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46年，他对一个代表团表示：“将机械技术与高雅艺术结合起来，是值得艺术协会去做的事，也是其职责所在。”相比之下，乔治四世赞助了高雅艺术，但对机械技术却不感兴趣。

万国工业博览会被认为是一个将制造业与艺术结合起来的契机，从而发展出一种人性化的实用性，使英国在这一方面占据领先地位，同时让英国人民及其经济从中获益。博览会本身便是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盛宴、一座由铸铁和玻璃建成的世俗大教堂，同时也是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奇迹。它反映的是创造一个拥抱并引领工业潮流的全新英国的尝试。这种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源于1843年阿尔伯特对伯明翰的访问，这次访问本身是对王室、工业以及现代性之间联系的确认，延续了乔治三世对运河建设以及制造工业的兴趣。由于激进主义骚动，阿尔伯特一度被建议不要前往伯明翰。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出访，亲自参观了五家主要工厂，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阿尔伯特是一位自觉的现代化人士。他愿意亲自钻研，获取必要的知识，从而了解如何才能最好地推动变革。他还是一个现实的家长式人物，热衷于对现行工作进行改进，关心减少社会不满情绪，这种态度同样有利于推动改革。1848年，欧洲主要国家政府纷纷被革命浪潮冲垮，但在英国，宪章派的主张并未对英国的政治制度造成实际挑战。在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协会（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的一次会议上，阿尔伯特明确表示富人有责任提供帮助，进步不会由革命产生，“任何真正的改善必须是工人阶级自己努力的结果”。他致力于公共卫生和治安，而随着改革带来的新制度以及供给标准化，这两方面在19世纪中叶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宪章主义运动是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一次大规模抗议运动，其主要诉求体现在《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的六点要求，包括实行成年男性普选、无记名投票、每年进行一次改选、议会选区分配，废除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议员应获报酬。《第二次宪章派请愿书》（The Second Chartist Petition）在1842年被议会否决，其中提到“人口仅为3902的吉尔福德区议会议员人数，和人口达30万的陶尔哈姆莱茨区一样多”。后者证明了东区人口的急速增长。对于不同的人群而言，宪章运动具有不同的吸引力。在伦敦，穷人们很大程度上把宪章运动看成是取消他们身上沉重的税务负担的运动。

宪章运动中的诸多思想，包括民主问责制，影响了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的自由主义。工人阶级开始成立属于自己的机构，例如众多互助会和俱乐部，还出现了一些通过教育和节制来提高工人健康及道德水平的计划。

尽管宪章运动以失败告终，但这一时期仍有诸多官方认可的改革被推行，涉及范围相当大。1833年、1844年、1847年、1850年、1860年和1874年的《工厂法》（Factory Acts）对就业条件进行了规范，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将穷人救济工作标准化，而1856年的《郡及自治市警察法》（County and Borough Police Act）则是对1839年的《郡警察法》的推进，规定了地方必须建立有报酬的警察组织。

管控成为一大主题。因此，《新济贫法》（New Poor Law）要求需要救济的人必须住进济贫院，这往往是一个残酷的

选择。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在引入欧洲做法之前，现代英国的管控机制都是源于这一时期，例如1837年实行的出生、婚姻和死亡民事登记制度削弱了教会的作用，而1839年则开始由国家负责初等教育。

健康问题也引发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改进努力，包括对公共工程的大规模投资。1848年，《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设立卫生总委员会和一个行政机构，以改善卫生状况，特别是供水状况。新法要求各地方成立卫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也采取了行动。例如，1849年在莱斯特成立的卫生委员会在建立下水道系统、解决屠宰场和烟雾污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卫生总委员会下的监督检查员爱德华·克雷西（Edward Cresy）对德比的一份批评报告，则使得自由党议员开始推行工程计划，包括建立公共浴室和盥洗室。

这是更普遍的行动主义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对改变城市风貌至关重要，有助于抵消发展困境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同时还可以引入更广泛的改善机制。行动主义将地方的主动性和督察员负责的中央监督结合起来，后者也是英国政府性质重大转变的一部分。

要求公共监管的压力，令政府责任产生了观念上的争议，即谨慎责任与自由放任之间的分歧，后者被看作自由和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在当时政治化、价值化的环境中，英国政府走向了扩大监管的道路。通过推进改革诉求，政府扩大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人们也期待它这样做，尤其是当时的评论者。例如1851—1854年，主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在其激

进的编辑托马斯·韦克利（Thomas Wakley, 1795—1862）的主持下，发表了一系列来自卫生分析委员会（Analytical Sanitary Commission）抨击食品和饮料中的掺假问题。反过来，这种压力导致了1855年的议会特别委员会和1860年的立法，开始了英国的现代食品监管。

伦敦的人口从1801年的100多万，增长到1911年的700多万。作为世界帝国的首都，伦敦显然压力巨大。但1859年，在大都市工程委员会（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总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的领导下，伦敦开始修建排水系统。到1875年，该系统全面完工，包含长82英里的截流下水道，可以将早期排入泰晤士河的管道中的污水，输送到新的下游工程，动力来自装有科尼什梁式发动机的泵站。伦敦的防暴雨下水道系统也在19世纪80年代建成。它与新建的地下铁路结合，构成地下建筑景观，反映了工程师们扩展和改变建筑环境的能力。

出于实用、适应、便利和改进的目的，更多并不引人瞩目的城市景观也在悄然改变。其中包括将城镇街道上自发形成的市场，安置到特别规划的集市区域当中，如1830年的蒂弗顿和1836年的克雷顿。霍尼顿高街的混乱无序在1823年得到改善。木材和茅草沦为陈旧、不受欢迎、不实用且越发非城市化的建筑材料。城市设施及其功能还在不断增加。埃克塞特的第一家银行于1769年开业，第一家煤气厂则在1817年建起，而从1769—1819年，有四座城门被拆除。城市已有的干道纷纷铺上了砖石路面，如蒂弗顿在1794年的一项法案中所要求的那样。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新社会创造了更多需求。作为对社会变化的反应之一，城市工人阶级的休闲活动脱离了传统，转向大众化、商业化的新活动。音乐厅和足球俱乐部大量成立。1859年的《娱乐场所法》（Recreation Grounds Act）和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鼓励公共绿地的建设。市政公园和建筑证明了地方身份认同的力量，同时也印证了改善地方环境的诉求与能力。

通过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法案》和1835年的《市政法人法》（Municipal Corporations Act），标准化和规范化延伸到了全国选举的投票权范围中。根据1867年的《第二次议会改革法案》，各城镇纳税的男性户主都拥有投票权，到1884年，《第三次改革法案》将这一权利扩大到乡村，使得全国投票权第一次被纳入到统一的制度之下。然而，直到1918年，妇女才获得投票权，1928年才拥有平等基础。地方政府的民主化随之跟进，通过1888年和1894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s）确立。

尽管在策略和其他方面存在差异，但自由党和保守党都对改革予以支持。《第二次议会改革法案》和1888年的《地方政府法》都出自保守党之手。在自由党领袖威廉·格莱斯顿

（William Gladstone）执政时期，1870年的《教育法》（Education Act）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学区，纳入到教育委员会管辖，并规定了一定的教育经费，这是普及识字率的关键一步；同样是在1870年，他还在公务员制度中引入了公开竞争机制，并在1872年确立了无记名投票制。而到他的保守党对手本

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上台后，1874—1875年的立法使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重要方面的管理制度化，同时扩大了范围；1877年的《监狱法》则巩固了国家管控。作为整体进程的一个例子，1876年的《不适航船舶法案》（Unseaworthy Ships Act）规定全国船只都必须带有载重线：一条水平线，标记船舶最大的载重量，一旦超过这一标记，船舶即视为非法航行。

随着政府越发积极，监管性更强，控制政府的政治团体也越发把自身目标设定为抓住时机推行政策，同时提升个人声望和收益。与前一个世纪相比，社会内部对权力性质的讨论变得更加广泛。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反对《玉米法》（Corn Laws）的大规模民众请愿活动，反映了人们对公共经济中的关键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投入。

更普遍的情况是，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开始期望获得权力和地位，并对那些看上去不具改革性和实用性的既有做法表示怀疑。恭顺意识日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尸位素餐的特权继承者的严厉抨击。保守党的目标由捍卫特权转变成了捍卫财富。中产阶级的观点与财富鼓励了公民社会、道德社会的改良进程，这同时也是改革运动的核心。

这一进程在小说世界中也有呼应，其中的态度是以一种流行的、易于理解的形式加以呈现的。狄更斯的小说，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社会的诸多焦虑，同时响应了改革的呼声，例如《小杜丽》（Little Dorrit, 1855—1857）便是对贵族排他性、官僚主义行政方式以及债务监禁的抨击。

“道德性”与改革的风潮不仅仅是中产阶级的事业，有自我提升意识的工匠同样参与其中，而政党也会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同时，在某些领域，等级制度与尊卑次序依旧根深蒂固。在《他知道自己是对的》（He Knew He Was Right, 1868—1869）中，勤勉的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描绘了仆人们的重负。势利的老处女洁米玛·斯坦伯里笃信宗教，反对改革。她“雇用了三个女佣……但不是每个女孩都能胜任这一工作。她对工作时间、宗教活动以及衣着都有严格的要求，许多可怜的女孩完全应付不来、几近崩溃。但能忍受这些的女孩都清楚，她们得到的这份工作十分宝贵。”

然而，到19世纪末，女性要求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大。女性利益是一个单独问题，无法参照以往经验，而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挑战。妇女参政运动，尤其是潘克赫斯特夫妇领导的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试图让公众关注将投票权扩大到女性的议题，这是对性别角色问题更普遍的明确表达及公开挑战的一个突出表现。但一方面，即便是对中产阶级（更不用说工人阶级）女性，“新女性”思想的实际影响很容易被夸大。但另一方面，“各司其职”的想法，即由女性管理家庭，这一想法表现出了适应性和灵活性。此外，在工作场所，女性大多进入低技能、低工资的“苦力”部门，待遇普遍低于男性，这是工会与工厂管理层合谋的结果。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还是带来了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1899年的《伦敦政府法》（London Government Act）中，女性只在新建的都市区拥有投票权，而到1907年的另一项法案，女性获得了地方选举的投票权。女性在大学中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例如自1878年起，她们可以在伦敦获得学位。

更广泛地讲，这一时期的变革已经不再仅仅是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它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精神的一部分。这对所有机构都提出了挑战，也令很多人感到不安。这种不安的种种表现包括对移民的敌意，以及对国家状况的忧虑。这种忧虑则鼓励了社会分析，以亨利·梅休（Henry Mayhew）、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和西伯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的活动为代表，进一步呼吁公共行动及慈善举措。

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

当这些研究人员在伦敦东区进行调查、提供帮助的同时，整个帝国也在着手类似的工作。通过道德目的，英国传教士在帝国范围内的行为得以正当化，包括社会及经济改良、思想启蒙，以及推进基督教化。但这并不是帝国扩张的主要目的。相反，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帝国的，仍是战争及国际竞争。由于在1793—1815年对法作战期间屡屡在海上取得胜利，尤其是1805年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对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取得的空前胜利，英国可以自由地对非欧洲列强直接掌控的殖民中心展开水陆两栖攻击，也可以通过牺牲非欧洲人民的利益来积累财富。

维也纳会议（1814—1815）承认了这一成功，英国保留了对开普殖民地、塞舌尔、毛里求斯、特立尼达、多巴哥、圣卢西亚、马耳他和锡兰（斯里兰卡）的控制。东半球大部分跨洋欧洲殖民地现在都已落入英国手中，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崩溃则使得到1830年时，全世界皆是如此。不列颠尼亚统治的不只是海上波涛。这种权力的象征是1843年竖起的纳尔逊纪念柱

（Nelson's Column），在摩天大楼时代到来之前，它主宰了伦敦大部分地区的视野，成为圣保罗大教堂的世俗版本。希特勒将这根柱子视为“英国海军力量和世界统治力的象征”，并计划将其作为战利品运往他的首都柏林。

对当时人们对帝国的态度进行批评（像英国的社会状况或妇女境遇一样），仿佛英国可以独善其身，是毫无助益的。而

且从深层意义上说，这种批评和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诸多批评一样，都是不顾史实的。考虑到当时的技术和心态，英国人要比其他欧洲大国的民众更具自由精神。英国对拉丁美洲和希腊分别从西班牙和土耳其的统治下争取独立的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在结束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使得其自身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蒙受了经济损失。《废除奴隶贸易法》（Act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1807）反映了英国公共生活中道德观念的力量。这股力量极大地吸引了公共讨论，而这些讨论又通过报刊、公众集会和会议深入到每一个小农庄。反对奴隶制的文学作品很多，既有福音和天意性质的阐释，也有如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的《奴隶贸易中各类实际证据》（The Substance of the Evidence of Sundry Persons on the Slave Trade, 1788）这样对这一问题展开现实讨论的作品。英国还接纳了诸多移民，以及害怕被其他国家迫害的人，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领土扩张提供了原料、市场和就业机会，再加上福音主义，使得英国人理所应当地感觉自己站在文明的最前沿。实际上，帝国扩张能够得到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它为文明进步提供了契机，尤其是终结了那些被认为不够文明、不够基督教化的殖民地习俗风貌，例如印度的寡妇殉节以及土匪横行。国家的命运越来越显得帝国化和海洋化。英国的资本和各类知识也在世界许多地方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前所未有地在全世界开战。这些战争无关生死存亡，对英国社会也没有造成改变，但它们的累积效应却对英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让英国作为世界大帝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些战争对其他社会的个别影响同样深远持久。英国的角色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但它的“戏份”显然比其他国家都要多，因为它在欧洲强权政治中始终难以介入，但却拥有了空前强大的海洋和商业力量，其帝国特性也早已枝开叶散。

大英帝国无论是疆域还是人口，都已经独步欧洲其他列强。帝国的核心是印度，它拥有最多的人口，也是其大部分力量的来源，尤其是作为陆上力量的潜力。帝国还在非洲进行了大规模扩张，并且在相对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完成了对于澳大拉西亚的开拓。英国与之开战的敌人包括俄国人、中国人、印度的敌人及叛军、新西兰的毛利人、阿富汗人，以及非洲的阿桑特人、祖鲁人、苏丹的马赫迪教徒和南非的布尔人（南非白人）。其中也不乏失败，如1879年在伊散德尔瓦纳

（Isandlwana）败给祖鲁人，以及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开始阶段一系列惨痛失败。然而事实证明，英国军队有能力应对挑战，并且得到了海军、火力优势，以及部署重要资源能力的帮助。如 1896年入侵苏丹时，英国人便修建了一条从哈尔法干谷（Wadi Halfa）到阿布哈米德（Abu Hamed）的铁路，贯穿沙漠。1898年这条铁路延长到阿特巴拉（Atbara），对英军的补给起到了重要作用。祖鲁人和布尔人最终也被英军击败。

19世纪70年代，有两个帝国宣告成立。1871年，让儿子与维多利亚的女儿联姻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I）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将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较小的德意志君主国一并纳入帝国名下。德意志第二帝国（第一帝国是拿破仑重塑欧洲时被废的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将会一直持续到1918年才被击败。更令人惊讶的是，已经成为“温莎寡妇”的维多利亚女王，在五年后加冕为印度女皇——这个帝国将一直持续到1947年，这片次大陆获得独立为止。

称帝是对维多利亚女王重塑工作的一部分。当时担任她的首相的本杰明·迪斯累利把她从一个隐居的寡妇状态中诱导出来，重新回到公众面前。迪斯累利原本是个小说家，后来成为保守党政客。他将帝国政策与社会改革相结合，并试图形成一种国祚绵长之感。他意识到，王室可以成为引导公众、控制投票权扩大后产生的影响的有效途径。这种观点在W. S. 吉尔伯特（W. S. Gilbert）和阿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的喜剧《彭赞斯的海盗们》（The Pirates of Penzance, 1879）中受到了温和的嘲讽。在该剧中，海盗们本已获胜，却在接到女王的宣召后立刻投降。迪斯累利小心地操纵维多利亚，使其接受自己的观点，实现他希望达到的效果。迪斯累利是维多利亚的热情拥护者，尽管也并非不加批判。他既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老练的政客，同时也是一位足够敏锐的思想家，能够围绕身份认同、民族自豪感，以及社会凝聚力大做文章。在他的对手威廉·格莱斯顿鼓吹的自由主义道德确定性之外，迪斯累利创造出另一种政治文化、一个可以赢得民众支持的新焦点。

王室还可以帮忙解决另一个权威及治理问题，即帝国问题。在女王统治下，大英帝国前所未有地扩张，到1900年，有4亿人成为她的子民。第十二代密斯伯爵雷金纳德发起并资助了“帝国纪念日”，日期定在每年5月24日，即维多利亚女王生日当天，尽管这一纪念日直到1916年才得到官方认可。帝国各处的街道、城镇、地理标志甚至一整片土地区域都纷纷以维多利亚的名字命名或更名，包括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加拿大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市、尼罗河上的维多利亚瀑布，以及伦敦一个重要火车站，与滑铁卢站遥相呼应。

然而英国王室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为命名提供方便。它还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政府提供了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可以诠释英国本土所体现的自由程度，同时在某些方面，对于某些殖民地而言，通过拓展自由与权力下放，表现得非常现代化。

帝国的政府是非常多样化的。在一些殖民地，英国会派遣代表进行直接管理，这往往意味着专制和军国主义政府。但在印度，英国人小心地试图在政府中融入当地已有的等级制度，保全既有利益结构及习俗。在那里，随着莫卧儿王朝在18世纪的衰落而获得有效独立的王公贵族，只是被英国人征服。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接受了一套符合英国模式及利益的英国式等级制度，这一制度也会赋予他们相应的角色与荣誉，如“印度之星”和“印度帝国”勋章。同样的进程也在马来亚（Malaya）和非洲的一些地区上演。

其结果是对地位而非种族的强调。这很容易招致批评，尤其是强调特权继承，会对灌输经济、社会及政治价值观起到反作用。但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对大部分由王公统治的印度现实状况的随机应变，有助于加强英国的统治地位，巩固帝国主义的“国内边疆”。另外，在印度和其他地区寻求支持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也延伸到增选或建立能够满足当地以及帝国主义需要的专业及行政队伍。

在定居点殖民地，即白人长期定居的殖民地，随着所谓责任政府的发展，自治的范围从19世纪中叶开始扩大。这意味着，随着又一项重大的自由主义措施落成，殖民地总督在政治上要对当地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负责，而不是对伦敦负责。这一进程反映的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类似议会安排的制度化。这一制度首先在1841年魁北克和安大略合并为加拿大省时采用；1857年加拿大省选定了首府拜城（Bytown，即渥太华），当地议会大楼还借鉴了威斯敏斯特新议会大厦的新哥特式风格。其他殖民地也纷纷走上了责任政府的道路：新斯科舍在1848年，爱德华王子岛在1851年，新西兰在1852年，纽芬兰、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和南澳大利亚在1855年，昆士兰在1859年，开普殖民地在1872年，西澳大利亚在1890年，以及纳塔尔在1893年。

“自治领”（Dominion）地位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为独立提供了一条和平、渐进的道路。加拿大于1867年、澳大利亚于1901年、新西兰于1907年成为自治领。尽管1865年的《殖民地法律有效性法案》（Colonial Laws Validity

Act) 宣布与威斯敏斯特立法机构相冲突的殖民地立法机构是无效的, 但这一法案很少被援引。这一法案与1720年的《宣誓法案》(Declaratory Act) 相呼应, 但威斯敏斯特并没有像对爱尔兰那样对自治领施加压力, 使其议会从属于英国。

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联邦制。在1899—1902年的南非布尔战争期间, 以澳大利亚、加拿大、开普殖民地和新西兰为主的帝国成员纷纷出兵, 使得帝国内部开始培养自治领民族主义, 而非使自治领成为分离主义的力量。从1887年开始的首相会议使自治领在帝国政策中拥有发言权, 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凝聚手段。它的先声是1867年在殖民地主教中间召开的兰贝斯会议, 这一会议提供了一种协商制度, 有助于支持继续承认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精神权威和领袖地位。更有力的是, 君主为帝国提供了重要的凝聚力, 这种作用既是象征性的, 同时又是身份认同的有效来源、效忠关系的实在维系。

维多利亚愿意向其他教派做出和解的姿态, 这在当时的环境下非常重要, 同时也是英国王室及国家现代性的体现。尽管女王本人是虔诚的圣公会教徒, 但她也愿意参加苏格兰长老会及德国路德教会的仪式。她认为自己是所有子民的君主, 无关他们的信仰为何。在1858年发表的对印度人民的公告中, 她明确表示不会对子民们的信仰强加干涉, 并向所有人承诺, 无论他们信仰什么, 他们都将享受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在1861年和1900年对爱尔兰的国事访问中, 维多利亚都会见了爱尔兰天主教會的领袖。1868年, 她参观了瑞士的天主教弥撒。1887年, 教皇利奥十三世获准派遣特使, 祝贺维多利亚女王的金禧

[3]，而女王也十分亲切地予以接见。这位包容各种信仰的女王，与宗教改革时期的君主，甚至是光荣革命后的君主都相去甚远。

维多利亚女王的金禧与钻石禧[4]，分别在1887年和1897年举行。这两次典礼同样展现了帝国已经成为英国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帝国主题非常引人注目，也有很多关于英国是唯一成功的帝国势力的言论，但与此同时，帝国本身也在不断变化。随着老女王在1901年驾鹤西去，帝国大厦便出现了裂痕。这部分要归因于英国的共同体、身份以及政治行动主义观念在帝国内部传播，以及英国的政治化实践，尤其是1884年的民主化，使英国大多数成年男性拥有了选举权，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反对帝国控制的声音。1885年成立的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以及埃及国民党（Egyptian National Party），都对帝国控制的本质发起了批判。但也有相当程度的民众选择顺从英国统治。如在爱尔兰，人们倾向于选择在英国王室统治下的“地方自治”，而非共和独立，后者只是少数人的选择。当时的大英帝国前途未卜，各方都在积极推动不同的目标与策略，但自治领，即在英国王室名下继续保持与帝国的合作关系，同时有效地独立，似乎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可行的选择。

帝国主义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而全球化对英国社会的影响要比帝国本身深远持久许多。大量移民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前往美国的人则要比到任何一个帝国属地的移民都要多。相比之下，移民到非洲、亚洲的新建及已有殖民地

的人则少之又少。英国贸易从帝国市场中获益，但德国等非帝国内部贸易伙伴也很重要，尽管在这些贸易中，英国商品需要承受关税的打击。

19世纪末期的问题

来自帝国的进口商品（澳大利亚羊毛、成羊肉和羔羊肉，以及加拿大小麦），和帝国之外的进口商品（美国小麦、阿根廷牛肉、丹麦培根）在农业大萧条中对英国农业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租金和工作机会都在减少，土地拥有者和农场工人的生计都遭到重创。工业革命中以煤为基础的地区，如东盎格利亚，其他制造业长期衰退，使得一些乡村地区问题更加复杂。

19世纪末的农业危机，导致大部分贵族的财富和权力都有所下降，除非他们能够靠采矿权勉力维持，或是与女继承人联姻，尤其是美国人——她们在现实生活和小说情节里都是很多投机者心仪的对象。这种衰落是土地大变革的一个方面，旧秩序受到新财富极大冲击。这种紧张关系并非前所未有，但却由于农业萧条，加上金融和工业利润随时可以通过购买地产创造出“偶尔光顾”的新乡村豪强而加剧。这种行为冲击了土地延续性，以及农村家长制的观念。特权阶层和土地精英也成为政治激进主义者的主要目标，尤其是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因为那里的农村社会比较分裂，凯尔特民族主义可以发挥作用。

与农业危机恰恰相反，进口粮食对价格的影响对城市工人阶级大有帮助，同时也为19世纪最初20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政治争端搭好了舞台。富裕的工人为消费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而消费主义同时又影响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和休闲活动。旅游业和体育产业作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活动得到了发展，电影

院加入了音乐厅，食品店则成倍增加，第一家固定茶室——里昂茶室，在1894年开门纳客。

然而、低工资、临时工作、就业不足导致很多城市及农村工人无法分享这些福利。此外，到19世纪末，英国工业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作为最早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有一个重大的不利因素，那就是后来的国家可以在起步阶段就使用较为先进的技术。然而，忍受贫穷并不是贫民们唯一的道路。很多人选择移民，包括从英国移居国外。移民身份成为苏格兰人身份认同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爱尔兰人更甚。

民族主义

爱尔兰政治家首先寻求天主教解放，丹尼尔·奥康奈尔发起了一项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随后又提出“地方自治”的诉求。这两点都是对英国政治实践的重大挑战，但很多英国政治家都愿意满足爱尔兰人的这些诉求。

苏格兰人从大英帝国中受益匪浅。他们在联合王国内部保留了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一点对政治层面的民族主义造成了阻碍。苏格兰保有自己的独立教会和成熟体系，以及单独的法律体系。此外，苏格兰事务部和苏格兰大臣在1885年创立，而1880—1935年间，苏格兰的十任首相中，有五位是苏格兰人。

和苏格兰军事、政治及贸易一样，苏格兰身份认同也成为英国身份认同的一个方面。苏格兰同时也是帝国身份地方认同的一种，与作为英国人，或是加拿大人别无二致。实际上，作为一个帝国国家，大英帝国的民族性是多民族的。从个别人的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到在英国这种联系的重要性，例如生于英格兰的格莱斯顿，父母都是苏格兰人，他自然保留了同苏格兰的联系，但在利物浦、牛津、伦敦和霍顿的生活和经历对他也至关重要。他是英国精英的一员。

虽然苏格兰方面也发生了重要变革，但他们赞同盛行的辉格式历史解释，这种解释可以看作是一个公共神话，提供了令人欣慰、充满光荣的描述，似乎颇为适合一个疆域遍布全球，并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其宪法理念的国家。英国人把世界

其他地方的动乱，如1830年和1848年的法国起义、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和1870—1871年的巴黎公社，都看成是这些国家明显的政治制度失败、落后，以及英国优越性的体现。无论在过去还是当时，英国人都看到了一种逐步走向自由的趋势。

对英格兰而言，这种进步趋势体现在一个连贯的网络当中，这个网络可以一直追溯到约翰·理查德·格林（John Richard Green）在他的《英格兰人小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1874）中鼓吹的所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由民主乡村社区。将民主理想化为英格兰人固有的特征，与正在不断扩大选举权的政治进程相吻合。在诺曼征服的挫折之后，英格兰人对自由的成功追求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以及中世纪英格兰其他可以当作宪政斗争的事件，还可以囊括就在前不久的1832、1867和1884年的选举权扩大历程，这些都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自然结果。

民族独立属于另一个范畴，主要强调摆脱外国控制，以及不畏挑战。如J. A. 弗劳德（J. A. Froude）在他的《从沃尔西倒台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all of Wolsey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1858—1870）中对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及伊丽莎白一世的描绘。新教式的做法为后罗马时期英国的讨论增添了色彩。例如1815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该书首版由爱丁堡的一群印刷工人在1768—1771年合作完成——写道：

埃德加（959—975年在位）的统治于后世看来是古英格兰王国历史上最幸运的一段时间。他采取了最有效的方式，既避免了国内动乱，又防止了外族入侵……为英格兰历史学家称颂的埃德加，其伟大之处在于同臣民之间的和谐；这种良好关系的根源，在于国王站在邓斯坦（坎特伯雷大主教，959—988年在任）以及（本笃会）僧侣一边，此二者在民众当中声望极高。国王满足他们最大的心愿，即废除所有修道院在世俗方面的限制。他不仅会在教会事务上求助他们，在国家事务中也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基于这些，他得到了僧侣作家们毫不吝惜的赞美之词；尽管从他的一些行为中也不难看出，这位国王并不受宗教或是人性的约束。

大英帝国被赋予了强大且悠久的历史根基，被描述为自古罗马以来的历史进程的顶点与终点。建筑反映了此类对过去荣耀的引申，但也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所采用的各种文化参照。18世纪末的新古典主义大量借鉴了罗马风格，但19世纪初却开始以希腊复兴风格为主。新哥特式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在教会建筑中。奥古斯塔斯·普金（Augustus Pugin, 1812—1852）大力推崇新哥特式建筑，他认为哥特式是典型的基督教风格。他的观点和设计都恰逢其时，因为在经历了长时间较少建造新教堂的时期之后，英国又迎来了一个兴建教堂的高潮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城市的扩张，以及抵制“无神论”的决心。哥特复兴时期具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包括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威廉·巴特菲尔德（William Butterfield）、G.E. 斯特里特

（G.E. Street）、诺曼·肖（Norman Shaw）以及阿尔弗雷德·沃特豪斯（Alfred Waterhouse）。此外，还有很多世俗建筑也采取了哥特式风格，尤其是在19世纪50年代，包括查尔斯·巴里爵士设计的新议会大厦。在城市景观中，自豪感显而易见。1845年7月5日发表在《生活时代》（The Living Age）上的文

章《访问伯肯黑德》（Visit to Birkenhead）指出，默西赛德已经成为“19世纪为商业与和平的非凡创造树立的最伟大的纪念碑”。

英国的天生优越，也将通过文明领袖的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准则相结合而得到重申。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内在的竞争力导致适者生存，而英国的成功也将由此得到肯定。查尔斯·达尔文本人也体现了英国在科学及其普及方面的作用。他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1859）被认为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

英雄主义式民族主义感染了所有社会阶层，也是所有世代的主题。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是一位神职人员，还曾在1860—1869年担任剑桥大学的近代史教授。他曾写过相当数量的歌颂英国昔日英雄的历史小说。这些作品包括《西进！》（Westward Ho!, 1855），描绘了伊丽莎白时代与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之间的斗争，其中审判所和耶稣会士作为西班牙人残忍行为的代表出现；还有关于反抗诺曼征服的作品《痕迹》（Hereward the Wake, 1866）。

战地记者乔治·阿尔弗雷德·亨蒂（George Alfred Henty, 1832—1902）在他广受当时男孩们喜爱的冒险故事里既追溯了过去，又关注了现实。他的历史题材作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销量仍旧可观，包括小说《在德雷克旗帜下》

（Under Drake's Flag, 1883）、《与克莱夫在印度：或一个帝国的开端》（With Clive in India : or the Beginnings of an Empire, 1884）、《英格兰的圣乔治：克雷西与普瓦捷

的传奇》（A Tale of Cressy[Crécy] and Poitiers, 1885），强调英国跨洋国运的《与沃尔夫在加拿大：攻克大陆》（With Wolfe in Canada : The Winning of a Continent, 1887），以及《为英国坚守：直布罗陀重围传奇》（Held Fast for England : A Tale of the Siege of Gibraltar, 1892），记录了英国在16世纪、18世纪、14世纪与18世纪（两次）的胜利。这些作品都被上世纪60年代我家乡新建的图书馆收录。

当时也有一些“反调”，比如对社会普遍困难群体的关注，以及认为英国的地位正在受到其他强国，尤其是美国和德国经济及海军实力崛起的威胁。然而，在19世纪末，民族自豪感与成就感较之前几个世纪更为强烈。这种自豪表现在帝国首都的中心。白厅建起了宏伟的部级建筑，尤其是新陆军部大楼（1899—1905）和新公共事务部大楼（1899—1915）。重新设计的典礼大道摩尔大街（the Mall）于1913年完工，从修缮一新的白金汉宫，延伸到特拉法尔加广场，成为对维多利亚女王的纪念。女王的雕像则竖立在白金汉宫前半圆形广场的正中央。这表明英国传统的权力仍可远离财富的创造。建于19世纪80年代末，采用了哥特式装饰的塔桥（Tower Bridge）亦是如此。不过这座桥在技术上做到了与时俱进，固定的蒸汽机为液压蓄能器提供动力，使桥的路面抬升。在这一点上，英国似乎很好地协调了过去与未来、历史与技术的关系。

注释

[1] 此人因将饲料作物轮种制引入了英国，推广萝卜种植而得名。

[2] 苏格兰传统食物，在热燕麦粥里加入威士忌和蜂蜜一同食用。

[3] 金禧（Golden Jubilee），即登基50周年庆典。

[4] 钻石禧（Diamond jubilees），即登基60周年庆典。

第五章 帝国黄昏：1900年至当今

20世纪，外部世界对英国历史的塑造作用是巨大的。这不仅是因为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及1939—1945年）中发挥了中坚及引领作用。国际竞争及其意识，包括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竞争，都对政府的决策造成了影响。

对于一些长期的趋势，政府只能有限地控制甚至是干预其影响，例如预期寿命的增加、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世俗化的进程及其冲击。但对于政府各部门而言，国际竞争的冲击显然要比这些因素更加棘手。因此，在20世纪初，社会福祉并不是立法改革的唯一原因。要想在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英国就必须迈向现代化。在南非的布尔战争（1899—1902）中，英国在军事上遭遇滑铁卢，严重刺伤了国人的民族信心。而这种民族信心在当时已经因为与德国的工业竞争饱受煎熬。现代化的诉求使得保守党在20世纪最初20年尝试引入关税，以保护英国工业（及就业机会）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同时加强帝国的经济联系，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由于担心关税会使食品价格上涨，选民们拒绝了保守党。反倒是自由党在1905—1914年间推动了重大改革，包括1906年的《商业纠纷法》（Trade Disputes Act），该法授予工会豁免权，使其免受因罢工行动而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以及1911年的《议会法》（Parliament Act），该法终结了上议院对下议院立法的否决权。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对失业援助做出规定。这一立法对英国政治和社会影响深

远。国民保险的建立意味着每个技术工人都将拥有一个编号及一张编号卡片。对社会的分化及分析通过这样的全面覆盖成为可能。

自由党政府同样迫于压力，花费大量资金建设海军，以期在与德国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对德国的关注，使得英国自1904年起与法国的关系愈加紧密。这使得英国进一步走向与德国的对抗。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

然而，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政府却出现了分裂。德国入侵比利时，计划借此攻入法国，而比利时在当时是受英国保护的中立国。这一事件对英国决定参战至关重要，因为它为敌对行动提供了道义上的必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记忆犹新的是法国和比利时的西线战场上的堑壕战，这些战役虽然并不以重要领土为目标，但对双方造成的伤亡却相当惨重。这场战争也被看作是军事徒劳的缩影。这导致很多评论家，尤其是在2014年一战百年纪念时，低估了英国参战的必要性——防止德国统治欧洲，也低估了英国在1918年成功击败德国的意义。这一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炮兵步兵”配合作战的情况下，英军发展出了能够让二者在发动和维持进攻时有效协调的方法。此外，尽管参战条件非常艰苦，但人们普遍拥有决心，出于良心的反对者并不多见，大多数士兵似乎都能够找到投身其中的某种理由。

战争的持续时间和惨烈程度考验了调动和管理资源的能力。人力和军需物资都对战争的走向至关重要，同时也导致了政府管理权力的扩大。1914年的《领土保卫法案》（Defence of the Realm Act）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权力，政府接管了铁路（1914年）、煤矿（1917年）以及面粉厂（1918）的控制权，还成立了劳动部和航空部，1917年成立了粮食生产部，并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

战争的规模是空前的。位于伍尔维奇的皇家兵工厂雇用了8万多人，其他地区也体现出战争的影响。在伦敦北郊，埃德蒙德建起了大型军医院，而恩菲尔德则成了主要的军需生产中心。1916年，征兵制开始实行。长期以来，没有征兵制都被视为英国自由的一个方面。这使得英国武装部队的规模在1917—1918年扩大到450万人，占男性劳动力的三分之一。

与以往的战争不同，战争期间没有举行大选。尽管联合内阁是在政治争议和分裂的条件下产生的，但提供了相当高的政治凝聚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也遵循了这一模式。为笼络民意，政府成立了信息部（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并在1918年成为固定的政府部门。作为对电影成为宣传手段可能性的回应，陆军部还成立了一个电影委员会（Cinematograph Committee）。

监视工作也变得越发重要，其规模与权限都有了很大发展。特别处的人数从1914年的80人增加到1918年的700人，军情五处从14人增加到844人。国内对战争的反对是有限的，尽管1916年，都柏林爆发了一场民族主义叛乱，即复活节起义，但也很快被镇压。然而，对于这一行动中民族主义领袖和同情者的后续报复，反倒使得他们的事业得到了更多支持。

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战争是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主导力量。传统的权力结构受到质疑，社会观念也随之改变。女性就业率上升，她们也开始扮演新的角色。很多女性出现在工厂中，尽管她们的工资相对较低，同时还要接受男性工头的管理。选举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案》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带来了男性普选权 (21岁及以上男性)，以及有限程度的女性普选权：30岁及以上的女性户主或户主的妻子。战争期间最有可能在工厂中工作的女性由于相对年轻，因此大多没有选举权。但由贵族制到民主制的过渡，到那时已经基本完成。到1928年，女性在与男性相同的基础上获得了投票权，使得1929年的选民人数达到3200万，而1910年仅为770万。战争也帮助工党崛起，尤其是赫伯特·阿斯奎斯 (Herbert Asquith) 的支持者，与1916年接替他成为首相的大卫·劳合·乔治 (David Lloyd George) 之间的矛盾，导致自由党分裂，破坏了战前英国主要的政治力量。作为首相，劳合·乔治依赖于保守党的支持。同时，工党加入了联合内阁。

两次大战之间

尽管英国是一战战胜国，其帝国范围也因此非洲和中东大大扩张，但战争对经济、公共财政和社会力量的消耗都是巨大的。事实证明，英国已无力维持战后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拳脚的野心，尽管在国内，这场战争并没有导致像另一个战胜国意大利那样的政治分裂，更不用说战败国德国的窘境。

然而在英国，似乎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感觉，即让事态激化，是对众多战争牺牲者的背叛。这有助于解释1926年短暂的“总罢工”（General Strike）的相对消极状态。对于1926—1937年的保守党领袖，1923—1924年、1924—1929年以及1935—1937年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而言，这次战争加大了他提供更多服务的决心，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更广泛的国家层面。战壕生活的羁绊则使得1957—1963年的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之时，决心要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在应对战后经济不景气、不成功的总罢工，以及30年代的大萧条之时，自17世纪以来没有任何暴力推翻权威的传统也非常重要。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劳工争端却导致了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担忧。这种担忧进一步演化为对共产主义颠覆的焦虑以及诸如1920年《火器管理法案》（Firearms Act）等限制性立法的产生。根据该法，只有

得到警方颁发的许可证，人们方可持枪，而且许可证需要每年更新一次。这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爱尔兰的情况与英格兰和苏格兰形成鲜明对比。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Sinn Féin）在1918年的大选中赢得了爱尔兰多数席位。由于未能对民族自治运动做出充分的反应，再加上战前本来支持联合的民众的倒戈，与爱尔兰的联盟此时已经岌岌可危。对复活节起义的镇压也成为新芬党获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最初依旧试图镇压爱尔兰民族主义。但在1920—1921年，在爱尔兰共和军游击战及恐怖主义行动的抵抗下，政府让步了。争执最终以民族主义者接受政府提出的分治方案告终。他们获得了爱尔兰自由邦的控制权，即爱尔兰岛的大部分地区。而作为单独的领土，新教占主导的北爱尔兰（历史上的阿尔斯特省的大部分地区，但并不是全部）仍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联合王国也就此更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在大英帝国的其他区域，尤其是伊拉克、印度和埃及，以及帝国之外新获得效忠的地区，尤其是土耳其，都发生了严重的叛乱。尽管英国政府在土耳其选择了放弃，但伊拉克、印度和埃及的反对声音最终都被压制。

英国本土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1926年的总罢工并没有导致广泛暴力或是政府更迭，因为这并非是工会领导层及其成员的意图。倘若果真如此，30年代大萧条时的政治形势也就不会那么有利。实际上，尽管背景

上这个国家在快速变化，但与这种变化相结合的却是政治层面的稳定。这一点颇值得玩味。

随着城市景观的改变以及机动车的普及，人居环境和人口流动都很容易发生改变。这是一种共生的发展：汽车使得住房密度下降。维多利亚时期城市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修建的紧密排屋，此时被绵延数英里的“半独立屋”所补充：带有仿都铎式立面的半独立式住宅，配以红瓦屋顶、红砖墙或卵石墙，以及前窄后宽的花园，每栋住宅还配上了短车道和车库。这些房子不仅出现在伦敦周围，在城市以外的交通干道附近也有大量修建，尤其是经济繁荣的地区，如英格兰南部的很多地方。

郊区的范围在19世纪末便开始随着铁路的发展而扩大，但当时一般不会远离车站。相比之下，汽车运输则使得发展可以以更松散的形式进行。在广告里，汽车身后的背景往往是都铎时期的郊区房屋。在远离城市中心的新址上修建房屋，可以保证廉价土地得到开发。这自然使得住房成本得以降低，但新房也占据了土地。大多数新房都销售给了自住者。他们乘汽车或火车上下班，包括伦敦南部的电气化铁道，以及向城市北部延伸的地铁路线。

这些半独立式住宅因缺乏个性、浪费空间、依赖汽车出行等问题招致诟病。然而，郊区房屋的千篇一律其实是有意为之：可预测性有助于新房的销售，而且房子都是大规模生产的，利用了标准化部件。这反映了砖块作为建筑材料的主导地位，以及预制门窗的使用。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房的价格在400英镑至1000英镑之间。可以以低利率从建筑协会借款，从

而抵押贷款购买房屋，对于住房市场至关重要。新的运输系统有助于降低成本，通过卡车，就可以把住房材料从包括大型砖厂（如彼得伯勒）和预制门窗工厂等中央生产基地，直接运送到建筑工地。

与汽车一样，半独立住宅同样是一种自由的表达。它意味着可以摆脱与他人近距离生活的限制，享受空间上的自由。半独立住宅并不是中产富裕阶级的郊区别墅，但它抓住了数百万人的愿景，为他们提供了体面的生活环境。我和我的父亲生活环境迥然不同，他是在拥挤的伦敦东区长大的。但正是因为他，我才有机会享受半独立住宅的宽敞空间。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公共住房建设，部分得益于贫民窟清理。然而，也还是有很多人需要继续忍受贫困地区恶劣的居住条件。

在两次大战之间（1918—1939），私家车数量增长了10多倍，在1938年达到了近200万辆。汽车产量从1924年的11.6万辆上升到1938年的34.1万辆。此外，由于在此前的铁路世纪中，公路建设几乎停滞不前，因此这时英国开始了一项大规模计划，即改造和修建公路，以便为汽车提供可以全天候行驶的路面。1929年制定的《主干公路计划》（The Trunk Roads Programme），资金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这项计划既提供了就业机会，又确保了道路改善计划的推进。

汽车和公路带来了新的气息，以及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诗《荒原》（The Waste Land, 1922）中的“喇叭和马达声”。生活的视觉背景也随之改变，路标、灯柱和交通信号灯开始出现。公路通向了新的边界和指令信息——

斑马线，以及以交通部长莱斯利·霍尔-贝里沙（Leslie HoreBelisha）名字命名的闪烁交通灯柱——贝里沙指示灯柱（Belisha beacon）。然而，仍有大量司机及其他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在20世纪30年代，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大约有7000人。警方发现，交通执法现在变得非常重要，1900年约有2%的案件与交通有关，而到30年代初，这一数字飙升到超过52%。也正因如此，中产阶级与法律的交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时至今日，我们都已经对公路交通带来的损害与破坏，尤其是环境污染心知肚明。然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汽车所带来的自由都使人们欲罢不能。在两次大战之间，大多数人都无法负担购买汽车的开销，但拥有汽车却成为很多人的奋斗目标，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动力，并导致未来的富裕将进一步拉动汽车产业的繁荣。

电影院也在这一浪漫追求中添砖加瓦：无论是英国电影，还是更具影响力的美国电影，都在创造和传播相关的生活方式与形象。去电影院看电影本身是一种共同活动，给人以集体之感，而后来兴起的电视和互联网则使社会更趋个人化。到1939年，仅伯明翰就有了110家电影院。得到发展的不只有私家车。到1938年9月，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的数量达到了53000辆，它们的出现也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体验。

以牛津考利的莫里斯工厂等新厂区为中心不断发展的汽车工业，是高生产率消费制造业扩张的一个表现，与此前的造船和棉纺织等传统出口工业大相径庭。这一扩张促进了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的提升。2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了1.5%，而1900—1913年仅为0.4%。

然而，贫困与失业问题依旧大范围存在。1926年的总罢工反映了经济机会的地域性差异。这次大罢工的导火索是煤炭工业的劳资纠纷引起的，出口下降带来了削减工资的压力。大罢工在伦敦、大多数煤矿城镇，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城镇（包括伯明翰和利物浦）都得到了坚定的支持。但在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却应者寥寥。政府的坚定态度，包括打算调动部队镇压，使得英国总工会叫停了罢工。

工党政府在1924年和1929年上台，但他们是少数派政府，需要依赖自由党的支持。在20年代的10年间，保守党是得票率最高的政党，同时，直到1929年，保守党都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20世纪20年代的保守主义倾向也在地方选举中显露出来，尤其是在新获得选举权的女性中间。这种保守主义代表的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产者联合的延续，原因则是自由派的激进主义倾向越发明显，导致中产阶级不满，于是越发向保守党靠拢。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工党政府组建于1929年，一上台便要面临同样肇始于1929年经济衰退的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世界贸易下降严重挫伤了英国这个重要出口国的经济，并加剧了先前带来工业增长的因素中业已存在的明显弱点。这些问题导致失业人数明显增加：从1929年的160万，到1934年的340万，约占全国劳动力的17%。政府既无力维持公共

开支，以延续社会福利水平，尤其是失业救济金，又无法支撑英镑稳定，因此政府出现严重分歧，只能在1931年宣布解散。

工党政府被国民政府取代，仍由麦克唐纳主持，但主要由保守党人士组成，这遭到大多数工党人士反对。这届政府是在英王乔治五世（1910—1936年在位）鼓励下成立的，似乎是应对国家紧急状况的必要之举。它在1931年和1935年的大选中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也是这个世纪里仅有的两次政府赢得大多数民众选票的情况。国民政府成为维持稳定的力量，确保英国没有陷入欧洲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政治极端主义泥潭。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的极端困难时期（1938年时仍有220万人失业）的同时，英国也迎来了诸多繁荣。国民生产总值（GNP）在1934年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经济恢复速度超过法国与美国。1933—1938年间创造了约260万个就业岗位，实际工资上涨，物价回落。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24年到1937年平均每年增长2.2%，这个数据与人们普遍记忆中的30年代并不吻合。

这种出入，实际上是伦敦等繁荣地区与萧条地区——尤其是采矿和重工业地区，如威尔士南部、英格兰东北部和苏格兰工业地区——的巨大落差造成的。这些萧条地区见证了苦难，同时也迎来了更多希望充当劳动力的移民。这次大萧条的经验对1945年以后的工党政府而言非常重要。

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倘若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么在按照原计划将于1940年举行的大选之后，可能就不会有工党政府了。除了住房业的繁荣——在30年代带来300万套

新房落成，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政府廉租房——之外，当时还有很多产业在蓬勃发展，主要集中在满足消费需求方面。

这种消费需求自然与物质世界的明显变化有关。根据1926年的《电力供应法》（Electricity Supply Act），由中央电力局控制并发展的国家电力网已经建立，家庭用电供应大大扩展，使得电力逐渐取代煤、煤气、蜡烛和人力。人们认为电力是清洁的、方便的能源，同时也是改善环境的一种方式，动力、热量和光的获取开始越发依赖电力。冰箱对食物储存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也影响了有冰箱家庭的食谱范围。在1938年的侦探小说《看不见的武器》（Invisible Weapons）中，约翰·罗德（John Rhode）捕捉到了英国寻常人家的变化：“这里的一切都是最时髦的……各种新奇的玩意儿——贴瓷砖的浴室、最新款的燃气灶、电冰箱、持续提供热水的焦炭锅炉……一个大大节省劳力的房子。”住房的繁荣意味着很多房屋必须配备相应的设施，接通电力的住户比例从1932年的31.8%迅速提升到1938年的65.4%。这对电力的消耗和电炊具、电熨斗、冰箱、热水器和吸尘器的销售产生了影响。这种需求有助于工业扩张。

消费也反映并有助于界定阶级差异，这成为职场与物质世界的关键因素。收音机、吸尘器和电熨斗被广泛拥有，部分原因是分期购买服务的普及；但另一方面，电冰箱、电饭煲和洗衣机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中产阶级拥有。这些差异体现的是雇用他人者（不过仆人也越发只是提供偶尔的日常帮助，而不再是全职家庭佣人）与受雇者之间主要的社会分化。第一次世界

大战使仆人的数量锐减：从1910年的将近250万人，下降到1920年的将近150万人。

穷人无法充分参与到这个全新的休闲社会当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收音机，也看不起电影，更不用说到新建的布特林斯度假村享受假期了。这样的生活在反映“英国状况”的作品中得到了呈现，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以及《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还包括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在《救济中的爱》（Love on the Dole, 1933）中对失业的残酷性的描述。类似的作品还有沃尔特·布赖尔利（Walter Brierley）的《收入调查员》（Means Test Man, 1935），以及乔治·布莱克（George Blake）描绘克莱德赛德造船厂的作品《造船工》（The Shipbuilders, 1935）。

另外，这一时期大多数文化并不是为了挑战既定的惯例和社会秩序。在一个不安的年代，人们更希望强调秩序，比如妇女的从属地位。多萝西·L. 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笔下的哈莉特·范恩是一个思想独立的女性角色，在婚前曾有过一个情人。然而，她也是众多强调稳定的性关系与阶级地位的女性角色之一，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简·马普尔，或者艾维·康普顿-伯内特（Ivy Compton-Burnett）和达芙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笔下的女主角并无不同。

同样，当时的现代主义作家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其吸引力相比于一些“中产趣味”或

“低级趣味”的作家，也十分有限。不过，现代主义在英国广播电台（BBC）的广播节目中却得到了些许讨论。BBC成立于1926年，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垄断机构。实际上，BBC赋予广播事业以国家特色，凸显了所谓的“BBC英语”，使其成为“标准发音”（PR），从而树立了一个统一标准。同样，在音乐方面，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民歌作品以及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的哀婉曲调在节目、留声机唱片和广播中都大受欢迎。1936年，世界上首次公共电视广播服务由英国广播公司放送。

更普遍的情况是，电影和新闻片都会乐观地强调社会凝聚力与爱国主义。除了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小说《邪恶的肉身》（Vile Bodies, 1930）对反主流文化的性行为与酗酒行为进行了描述之外，D.C. 汤姆森（D.C. Thomson）、米尔斯和布恩（Mills and Boon）这两家最成功的通俗小说出版商也在积极传播保守的社会道德准则：性能量被遏制，而激进主义、社会压力和道德质疑则被忽略。张伯伦勋爵的部门对舞台的审查工作仍在继续，审查的目的在于维持针对性行为、堕胎和节育等话题的道德准绳，从而维护旧日道德及其准则的地位。跨种族的性行为，与涉及上帝的描述一并受到谴责。

这种保守主义反映的是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认为国家认同在本质上应当是保守的，反对任何别出心裁与激进主义。这也是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的政治立场在文化方面的对应产物。1935年，他接替麦克唐纳出任首相，一直担任到1937年。在反对共产党及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的

极右翼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他将这一联盟视为“非英国式”——的过程中，鲍德温强调国家特性、延续性、独特性，以及恒久不变的常识。鲍德温此举并不是要迎合政治反应，而是希望以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方式缓和经济变动，尤其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竞争所产生的紧张局势。鲍德温与猪群和五杆门的合影，有助于强调农村价值形象的认同。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在英格兰相当成功，但在威尔士却收效甚微。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

与20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民主制度的疲软和崩溃相比，国民政府的效率依旧不啻一种胜利，而这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国家最终能够力挽狂澜意义重大。这是一场非常不受欢迎的战争，由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侵略行为引起。鲍德温首相错误地认为可以与德国的纳粹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谈判，而他的继任者、1937—1940年担任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陷入了同样的误区，尤其是1938年，他还就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与希特勒达成了《慕尼黑协议》（Munich agreement）。这一策略被称为绥靖，在日后饱受谴责——因为它既不道德，也不成功。

然而在当时，想办法避免战争似乎是权宜之计，而且张伯伦很受欢迎。他长期致力于削减开支与保持财政稳定。1933年，针对军方要求增加远东防务准备经费的压力，时任财政大臣的张伯伦回应道：“在财政部，我们认为财政状况的风险或许比日本入侵更加紧迫。”

1939年，希特勒的策略粉碎了绥靖的期望，正如日本人在1941年12月将要做的。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被占领。针对希特勒公然破坏《慕尼黑协议》，张伯伦试图通过保护波兰与罗马尼亚来予以威慑。实际上，在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之后，英国随即宣战。

一开始，战局一塌糊涂。对于波兰，英国无法提供任何援助。此外，英国军队在1940年试图阻止德国征服挪威与法国，同样未能成功，一败涂地。这是这个国家需要应对失败的关键时刻，同时也是需要直面德国入侵威胁的至暗时刻。然而，惨淡的现实并没有让英国接受德国开出的和平条件，反而让张伯伦的继任者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坚定地表达了奋战到底的决心。

在1940年8月和9月进行的不列颠战役中，德国本欲借以铺平入侵道路的空袭，被英军一流的战斗素质、干练的指挥决策、优质的战斗机以及英国雷达击退了。英国的城市，尤其是伦敦，在空袭中遭到了严重打击。1940年的经历使得英国形成了一种新的爱国主义。这似乎表明，在没有盟友牵制的情况下，英国独力应对战争其实更加容易，尽管它拥有自己的世界帝国作为后盾。德军的空袭失败似乎也证明了战争的道德属性，并且鼓励了一种意识，即无论贫富贵贱，全体英国人都在承受打击。事实证明，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记忆。

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6月），并在盟友日本对英美两国发动攻击后对美国宣战，英国也因此获得了新盟友。最终，战争的扩大化对盟军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在1941年和1942年初，德军和日军仍旧势如破竹。1942年2月，在经历了一场耻辱的失败之后，英军被赶出马来亚，被迫交出新加坡，让英国在亚洲彻底威信扫地。缅甸不久也被日军攻陷。

然而，德军和日军的攻势在1942年底陷入迟滞，英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埃及击退了德军，还把日军挡在印度之外。盟军开始由守转攻，在1943年初与德国潜艇部队进行的大西洋战役中取得胜利。德军也被彻底逐出北非。接着盟军在1943年7月攻入西西里，当年9月挺进意大利本土，1944年6月夺回诺曼底。在缅甸，盟军与日军在1944—1945年打得难解难分。英军在那里与澳大利亚、加勒比海地区、锡兰(斯里兰卡)、埃及、印度、肯尼亚、西非和新西兰军队并肩作战，全部由英国方面指挥，这是帝国依旧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体现。到1945年，德军和日军的失败几成定局。如果说苏军在陆上战场对德军的阻击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英军的对德作战同样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海上及空中战场。

战争对英国本身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破坏性没有预期那么大，但物质上的损失仍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场战争。有超过 6 万名平民在空袭和导弹袭击中丧生，其中近一半在伦敦。伦敦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破坏，而战后重建工作对建筑的破坏更加严重，因为大多数修复都质量低劣。为了应对轰炸威胁，各大城市都进行了儿童疏散，仅伦敦就疏散了69万，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指挥平民迁移。战乱极大地冲击了家庭生活，影响了社会秩序。然而，尽管存在黑市和罢工等问题，但人们对牺牲的必要性表现出了极高的接受度，士气与民众的决心也比有时认为的要高。

战争也对经济造成了重创，出口市场完全丧失，金融稳定也因大量支出而饱受打击。战争期间英国损失了大约四分之一

的国民财富，对战时贷款（主要来自美国）的依赖使其在1945年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债务国。这对战后的英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战争期间，政府管制无处不在，1939年增设了作战经济部、粮食部、国内安全部、信息部、航运部与供应部。后来又增设了飞机生产、燃料与动力，生产等部门。1939年开始征召男性入伍，1942年开始征召女性。一切都被纳入政府的管控之下。例如从1940年开始实行的食品配给并不受人们欢迎，但它根据营养科学重塑了这个国家的饮食习惯。配给卡提升了国家的存在感，对社会起到了规范作用。但与此同时，黑市的发展也体现出人们逃避制度的普遍决心。医院各部门在紧急医疗服务体系的要求下进行了改组。

战时管控使社会主义在很多人看来越发正常：随着税收的增加，政府规模急剧扩大，民众对计划的信任感增强，生活开支也得到了补贴，英国人一贯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工党在1940年组建的战时联合政府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其地位的恢复非常重要。在战后的大选中，工党获得胜利，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议会中获得明确多数席位。这反映了工党立场和计划的广受欢迎，也反映了由于先前的大萧条和不平等，30年代时的执政党保守党遭到了人们的否定。

战后世界意味着什么，此时尚不明朗。1944年4月，海军部讨论了建造一艘大型重型巡洋舰的计划，新的战列舰和航母也将在5月跟进。然而，战后的政治与现实将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优先事项。

1945年以后的英国社会

自1945年以来，英国与英国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影响比通常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客们的行为更为显著。国家层面的变化，一个明显的驱动力是人口前所未有地大幅增长。与这种增长相匹配的则是对生活方式的期望值大幅提高，因为富足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标准，而个人则需要通过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来表达自己的世界是个人主义的，同时又因为广告与定价的压力而充满顺从。

在移动能力（汽车）和空间（住房）成为刚需的形态下，人口增长导致土地从农耕用地和荒地，大量转化成道路与住宅，这对野生动物的生活，以及人对于乡村的体验产生了多重后果。在并非通勤或养老社区基地的乡村，由于农业活动急剧减少——一部分原因是机械化——人口已经变得十分稀少。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对乡村生活造成了影响，但并未充分听取乡村的意见，例如在2004年对历史悠久的猎狐行为的禁止。

环境压力是英国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例如，对水资源的需求不仅反映了人口的增加，而且反映了更加舒适的生活条件和更充裕的财富，即人们可以更加频繁地洗澡或是淋浴，以及洗碗机的大量拥有。这种变化体现了消费主义的力量，它强调流动、休闲、舒适、自动化，轻易为人们提供了之前生活中得来不易的暖气、水和食物。房屋所有权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在1914年，英国的房屋里有10%是业主自住，而到了2000年，这一

比例大大提高，达到了70%。而在苏格兰，由于工资水平较低，加上当局管控较为严格，这一比例相对较低。

由于人口增长和消费主义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使得野生动物的生活遭受重创。例如在1976—1998年间，灰山鹑的数量锐减80%，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铲除灌木丛导致它们无处筑巢。总体上看，低地物种受住房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影响较之高地物种更甚。而且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乡村地区野生动物的生活，还导致特色景观和声音的凋亡。英国一些地区破晓时的鸟鸣声明显减少（甚至消失），蝴蝶种类也同样锐减。蝴蝶种类的变化是一个特别直观的数据，表明土地使用的变化，以及污染和农药使用造成的破坏。

和很多其他情况一样，这里依然存在区域性的因素。正如英国鸟类学基金会（British Trust for Ornithology）在2007—2010年的调查显示，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林地、农田栖息的鸟类以及候鸟的总体数量都有所上升，而在人口较多的南部，这些数据都呈下降趋势。气候变化是一个原因，但南部地区的发展压力显然更大。

环境压力多种多样。与全球变暖相关的海平面及河流水位上升，是导致2014年初洪水的部分原因，据环境署估算，这场洪水波及了至少520万户家庭。另一个长期问题则是生活垃圾的激增所带来的，这些垃圾同样是消费主义兴起和人口增长的结果。

环境危机同样指向了食品供应问题。疯牛病（牛海绵状脑病）丑闻对英国牛肉产业造成了影响。2001年的口蹄疫爆发则是一个养猪场对受污染的废物处理不当所致，导致英国出台规定，禁止使用厨余废物喂养动物。危机期间，政府禁止牲畜流动，关闭公共人行道以防止病毒传播，欧盟则禁止英国出口动物和肉制品，并大规模扑杀了至少400万只动物。阴燃的动物尸堆成为常见景象。疾病被消灭了，但这场危机对英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造成了重创。

牛结核病的兴起，再次体现了人类食物系统的脆弱，这导致英格兰和威尔士在2012年屠宰了超过38000头牛。关于是否应该通过扑杀獾来应对这种疾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再次反映了国家机构对农民的管控程度。

人口数量的变化也与人口构成的变化显著相关。主要是由于医学的进步，男性与女性的预期寿命都大大增加，这也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趋势之一，尽管冠心病仍是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原因。预期寿命的增加导致人口平均年龄的上升，这在出生率没有相对增加的情况下变得更为突出，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迎来了婴儿潮。预期寿命提高影响了社会格局与政治背景，尤其体现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养老金领取者利益支持的强调上。

此外，大规模的移民——以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南亚为主，但也有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尤其是21世纪初的东欧移民——同样对人口构成造成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在大城市，而苏格兰所受的影响则相对较小。整个国家在种族上更显多样化，对

文化也产生了明显影响。1948年的《英国国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确认了英联邦及殖民地人口可以自由入境的既有立场，从而导致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南亚的大量移民拥入英国。1970年，英国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总共约有37.5万人，而到1993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62万人，其中穆斯林数量的增加最为明显。

社会与文化的变化，也体现在人们越发个人主义，也越来越叛逆。1945年之前的道德规范被逐渐推翻，这一进程始于50年代，随后在60年代意义深远的法律变革中得到确认。堕胎与同性恋合法化，死刑被废除，妇女地位也得到了立法保护。1991年，婚内强奸行为被纳入强奸罪的范畴之内。

在这些变化发生的同时，妇女的就业率也在发生变化。关于妇女就业率的调查始于1971年，这本身便是对这一问题越发感兴趣的一个体现。当时的比例是52.7%，而到2013年12月，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67.2%。男性就业率仍相对较高，达到了77%。社会的广泛、长期变化与更具体的政府决策相辅相成，如试图使男女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相同，以及对单身父母福利的改善，都是重要的举措。到2018年，女性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将从60岁提升至65岁^[1]，并在2018年至2020年间提高到66岁。这有助于大幅提高50岁以上女性的就业率。然而，性别间的薪酬差异仍十分巨大，2013年12月，男性的平均工资比女性高出15.7%。

除了性别与年轻人的期望和角色在发生改变，或者说更加坚定，还有其他更加广泛的潮流在更新这个时代。正式性在各

个领域的下降是一个主要趋势，称呼与谈话方式越发显得随意，衣着方面也是如此，而这也是通过消费主义表达个性的一个面向。

礼仪与行为的变化也体现在社会结构和性行为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离婚率明显上升，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于1949年达到顶峰，随后在50年代开始回落，但仍远高于战前水平。而到60年代，离婚率再次上升，1971年《离婚改革法》（Divorce Reform Act）令这一趋势有所放缓。不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离婚数量，还是从1971年的74437起，上升到1993年的165018起，创下历史新高，随后回落到2002年的147735起和2012年的118140起。这些数字掩盖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离婚意愿的普遍增强，这反映了人们对生活期望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交媒体、约会网站和相关药品的新技术发展之间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离婚，单亲、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明显增加，其占有子女家庭的比例，从1971年的8.3%，提升到1980年的12.1%。

这一趋势也和性与婚姻不可分割观念的终结有关。1967年通过的《国民医疗保健体系（家庭计划）法》（The NHS [Family Planning] Act）没有提及婚姻。2014年，身为法官的卡尔沃思的威尔逊勋爵（Lord Wilson of Culworth）宣称，传统的核心家庭已经被“混合家庭”取代，普遍的离婚导致很多“血统复杂的联合家庭”的出现。

这些转变也与宗教观念的转变密不可分。到20世纪90年代，只有七分之一英国人是基督教会的积极成员。尽管很多人声称自己是信徒，但无论对于大多数信徒，还是那些不那么信

教，或是根本不信教的人来说，信仰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无论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在一些关键节点，尤其是临终时刻。这也是世俗价值观占据优势地位并不断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表现。20世纪，英国国教会参加复活节仪式的人数不断下降。1911年，参加复活节圣餐的有230万人，神职人员超过23000人。1931年，尽管参加圣餐的人数仍为230万，神职人员21309人，但这是在人口明显增加的前提下。到1951年，这些数字下降到190万和18196人，到1966年则下降到180万和20008名神职人员。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的人数却普遍增加，从1911年的170万（其中实际参加弥撒的有91.5万），到1961年的355万（参加弥撒的有210万），1969年的410万，到1976年超过500万。但从人口比例上看，参加教会的人的总比例仍然相对较少。

到20世纪90年代，得到国教教会大力支持的“保持礼拜日的特殊性”（Keep Sunday Special）运动并未能阻止商店在礼拜日开门营业。教会原本在慈善和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这些功能很大程度上都被国家替代，尽管仍留下不少空白。

大多数政治家的生活不再受宗教价值观的影响。尽管格莱斯顿和鲍德温等人对宗教信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威尔逊或希思对此便不再上心了。经政府批准的国家公祷日，原本期望吸引教会之外的普通民众也参与其中，但在1947年为应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举行了一次之后便不再举行。内阁曾考虑在1957年再举行一次，但提议遭到驳回。这一仪式的落幕反

映的不仅是政治气氛的变化，也表明教会领袖们现在接受了世俗化的角色。

在更普遍的情况下，由年龄和经验确立的权威纷纷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对年轻和新奇的强调。这一点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投票年龄已经降低到18岁，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时还曾讨论过要进一步降低至16岁，即2014年苏格兰公投时的年龄标准。在消费领域，随着年轻消费者的崛起，同样出现了对年轻和新奇的强调；在文化领域，流行音乐发生了明显变化。20世纪60年代对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文化延续性的破坏相当普遍。这种破坏反映的是社会和意识形态趋势的影响，尤其是大众对性别、年轻、阶级、地域和种族理解的转变。这些趋势也对建筑造成了影响，许多建筑在60年代时被拆除。开发商、规划师和市议会的合作往往是以善意为起点，却很容易遭到误导，甚至做出败坏之举，认为过去应该被统统抛弃，导致在利兹、曼彻斯特、纽卡斯尔和埃克塞特等城市出现了广泛的破坏和蹩脚的重建。

另一个缺乏对过去兴趣的例子是对重要历史遗迹的处置。通过A303号公路和A308号公路，汽车可以分别在巨石阵和兰尼米德（《大宪章》签署之地）随意穿梭，更不用提纳斯比等古战场了。

在大众文化方面，除了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迪克·弗朗西斯（Dick Francis）的小说，以及电台肥皂剧《阿彻一家》（The Archers）所体现的明确的延续性之外，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向，例如流行音乐方面。在60年代，以披头士乐队

（他们的首支单曲Love Me Do发行于1962年10月）和滚石乐队为代表的流行歌曲，带给英国不同于先前“世界大帝国”的感觉。通过广播一台（Radio One）的建立以及海盗电台的推波助澜，流行音乐蓬勃发展，也将这种感觉推向极致。尤其是来自默西赛德郡的披头士乐队，他们通过演唱歌曲挑战了语言的“标准发音”，提供了地域差异，这也被BBC所接受。从60年代开始，BBC在用词、风格和语调上对整齐划一的强调有所下降。从1967年开始播放的彩色电视节目让人们感受到了进一步的变化：以前的一切都显得灰暗。

立法也对参与变革起到了作用。社会立法至关重要，其中大部分由工党在1964—1970年间推出。“新不列颠”（The New Britain）是1964年工党竞选的口号。实际上，60年代的“解放”一般被认为体现在年轻人、性和社会自由主义方面。

导致消费主义扩张的立法，其意义也同样深远。消费主义与这一时期更广泛文化中的一系列因素有关，包括个人主义以及个人喜好在社会道德与实践中占据的主导地位、拥有房产的风气，以及“精英主义”公共文化的衰落，文化发展越发倾向于用户喜好。在批评者看来，这种对社会关注的脱离，可以看作是公民社会崩溃的一部分。

1964年，保守党政府取消了“转售维持价格”（RPM），使得消费主义得到进一步的改变与发展。先前的转售维持价格要求商家按照供应商制定的标准价格来出售商品，从而阻止低价竞争的出现，有助于独立的小店主抵制大型超市的薄利多销。而在取消了转售维持价格之后，超市就可以凭借自身规模优势

进行大宗采购，进而以更优惠的价格出售，将竞争对手彻底扫清。消费者对超市偏爱，导致购物行为出现了明显的趋从性，随着此前没有出现在超市中的商品，如酒类和汽油，开始上架出售，这种趋从性更加突出。1950—196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0%，成就了一个富裕时代。对此，超市功不可没。

帝国的终结

利物浦之声、摇摆的60年代、伦敦卡尔纳比街、迷你裙，这些元素创造了一个与1956年国际风云当中的英国相去甚远的形象，当时英国正趁着帝国斜阳的最后余晖，试图恐吓埃及，但并未奏效。直到1945年，英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1946年，地中海总司令、海军上将威利斯还对埃及长期局势持乐观态度，尽管已经收敛不少。然而，这支曾经举足轻重的海军正在走向末路。英国最后一艘战列舰于1960年报废。

从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开始，到1964年，帝国曾经的殖民地——尤其是非洲殖民地——大多取得了独立，不过仍有小部分殖民地得以保留。1957—1964年，帝国终结的速度相当迅速。先前，人们以为印度的独立并不会影响到帝国大局，这种想法一直保持到50年代初；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后，政府的态度却起了相当大的变化。次年，即1957年，艾伦·亨特（Alan Hunter）在他的小说《轻轻落地》（Landed Gently）中指出，大国沙文主义与旧世界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撒旦的磨坊”^[2]（satanic mills）和社会不公平，终将走向失败。

摆脱欧洲统治并不只是大英帝国殖民地独有的现象。法国在非洲的大部分殖民地于1960年独立。大英帝国保留下来的人口最多的香港，在1997年结束了对其的殖民统治。不过英国在1982年对阿根廷的一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由于帝国在英国人身份认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逐步终结便成了一个重要的断裂，尽管年轻一代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事实上，这构成了代际之间历史记忆与想象的重大反差。有人试图以英联邦的形式提供一种不同的身份认同，但它无法与现实的其他兴趣与关切抗衡。除了伊丽莎白二世（1952年至今在位），英联邦这个概念鲜有人问津。

随着帝国的迅速瓦解，英国似乎成了一个被削弱的国家。尽管由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1952年），随后又拥有了氢弹（1957年），英国的军事实力实际上得到了补强。这一时期，英国的国防重点是保护西欧不被苏联入侵，而在冷战对抗中，英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国是国际组织的积极成员，尤其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创始成员，英国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英国还是1949年创建的“北约”（北大西洋公约）创始成员，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陆续撤出苏伊士以东地区之后，英国部队在90年代重返了苏伊士，尽管是作为由美国主导的同盟的成员。

英国的政治与经济

在自家门口，英国从1969年起在北爱尔兰派驻部队，以应对迅速成为严重恐怖主义威胁的教派暴力的挑战。事实证明，天主教民族主义势力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 IRA）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恐怖组织。1998年，随着《耶稣受难节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的签署，双方通过和平谈判搁置了“麻烦”，但紧张局势仍在。

相比之下，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基本保持平和。1999年，二者都获得了一个权力下放的议会，得到了相当大的自主控制权。实际上，英国本身似乎也走在同样的道路上，即成为欧洲内部一个获得下放权力的实体，因为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缩写为EEC），即后来的欧盟（European Union，缩写为EU），导致国家主权明显丧失，一部分权力移交到欧洲机构。但自相矛盾的是，当英国因财政疲软不得不退出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时，国家自治权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当英国继续处于欧元体系之外时，这种情况便仍在继续。

在国家层面，政府由工党（1945—1951年、1964—1970年、1974—1979年、1997—2010年）及其对手保守党（1951—1964年、1970—1974年、1979—1997年）交替控制，而且与1915—1945年的大多数时候不同，直到2010年，英国都没有再出现过联合政府。两党的理念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尤其是在执政之时，例如始终保持免费医疗服务的提供，这也是国民医疗

保健体系（NHS）的基础，以及到80年代一直在一定程度上秉持的社团主义。但也有重大的反差，典型的例子便是1979—1990年，作为保守党领袖的撒切尔夫人以首位女首相的身份执政期间，对于社团主义的基本摒弃。

即便是在1945—1975年，撒切尔夫人取代更注重社团主义的爱德华·希思成为党魁之前，保守党也更倾向于个人自由与低税收，而工党则倾向于集体主义的解决方案，更乐于采取国家主导、发挥控制作用的主张。这一点从工党在1945—1951年、1964—1970年和1974—1979年执政期间支持将经济的主要部分国有化便足以证明。国有化有助于元气大伤的英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得到恢复。

大多数领域都在1979—1990年保守党执政时期实现非公有化，这一方针是意识形态与经济政策相结合的产物。而在1997—2010年工党执政期间，这些领域没有被再次国有化。

在工党内部出现了呼吁其推动社会转型的呼声，尤其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工党脱离了欧洲大陆工党普遍采取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在1974年的大选中，该党“骄傲地”宣布了“社会主义目标”，并承诺将在“权力与财富方面采取措施，实现根本的、不可改变的逆转，使之有利于劳动人民及其家庭”。随着该党与激进工人组织的关系越发密切，竞选重点也从60年代的无阶级倾向，转向对工人阶级的强调。

这种强调导致了政治分裂感的突出，无论是在1974—1979年疲软的工党执政时期，还是1979—1997年保守党执政期间。

党派之间的激烈争执与党派内部的分歧相呼应，这种混乱在70年代国家实力总体下滑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社会与工业凝聚力似乎日渐走低，人们开始对犯罪率的上升忧心忡忡。焦虑情绪在社会上弥漫，人们认为英国已经濒临崩溃，行将就木。这种焦虑导致了70年代各种奇谈怪论的出现，认为英国需要寻求议会制度以外的解决方案。

但最终，政治体制得以维持，社会和平也未被打破。撒切尔通过大选上台，随后利用连续选举授权，推动了重大改革的落地。在这个过程中，撒切尔粉碎了战后社团主义社会的诸多“道德经济”，尤其是它在70年代的形式，并对从工会到伦敦城的传统规划等一系列利益集团发起挑战。撒切尔成功的原因，部分在于“道德经济”在70年代的分裂中已经显露危机。在这10年里，人们对既有做法的信心不断下降。撒切尔在1983年和1987年的选举中连续获胜，也要大大归因于工党本身的持续疲软，以及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自身的分裂。社会民主党主要由工党极端主义者的异见者发起，首先与自由党结盟，并最终合并。

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撒切尔克服了矿工工会激进领导层及爱尔兰恐怖分子推翻其政治进程的企图。同时，撒切尔的政策导致英国诸多社区的社会政治与环境发生改变。煤炭行业的崩溃是国际经济趋势的反映，但她对该行业的刻意边缘化，则使很多此前围绕矿坑形成的社区彻底消失。

1994—2007年的工党党魁、1997—2007年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试图调整工党的传统策略，寻求避

免社会主义与工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中间或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在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的领导下，1989年工党的政策检讨《迎接挑战，做出改变》（Meet the Challenge, Make the Change）已经放弃了80年代工党所认可的诸多政策，包括价格和进口管制、高所得税、单边核裁军、财富税，以及对工会法律豁免权的恢复。这次检讨借鉴了撒切尔主义，赞同自由市场的提法，摒弃了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和实质政策。这是一份关于工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文件，也是1992年该党参选时的重要政策参照。

1994年，新晋成为工党领袖的布莱尔在该党的会议中谈到了他的目标：打造一个“经济繁荣富裕、社会公正安全、政治变革自信”的社会，塑造“新工党，新英国”的联系。1992—1994年，在担任影子内政大臣期间，布莱尔就曾承诺要对犯罪采取强硬措施。这一政策先前并不在工党的范畴之内，但却对其重获主动权起到了很大帮助。这也是他对于责任作为社会生活一个方面的强调，在这一点上，他与梅杰异曲同工。两人都力图克制个人主义与放任主义。

但在实践中，政府的干预主张依旧明显。布莱尔的选择受其所属政党性质影响，部分党派对他的政策无法信服。而且他专注于外交政策，尤其是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此外，他所说的自给自足与现实政治也存在极大冲突，后者仍热衷于将立法和政府视为解决问题的手段。种种冲突，加上解决问题的失败，如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尝试，都给人以痼疾

难除之感，民众对政府在海外的武装干涉行径的反对更加剧了这种感觉。

此外，对现代化尝试夸张的宣传，与既得利益集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之间，也存在持续性冲突。作为回应，布莱尔在2000年宣布任命“人民贵族”，让普通民众有机会申请加入上议院。但实际上，除了使女性和少数族裔成员比例明显上升外，任命模式本身并没有任何改变。

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不确定的，即多变的公共政策，是导致英国经济从40年代以来明显衰退的重要原因。这种衰退在制造业方面尤其明显，尽管在某些部门，如制药业，英国技术仍旧可以保持市场领先。战后德国、日本和法国的经济都得以快速增长，这使得英国的不成功愈发明显，并导致英国寻求加入欧共体，即欧盟的前身。这也反映了英国全球角色的衰落，昔日帝国已经沦为无法提供经济替代的英联邦。相反，英联邦国家开始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加拿大与美国越走越近，而澳大利亚则把目光投向日本。英国在1961年提出加盟欧共体，但在1963年的投票中被法国否决，理由是英国仍被视为拥有全球利益。当爱德华·希思政府（1970—1974年执政）愿意放弃大部分英联邦特殊利益时，英国才得以获得欧共体的成员资格。这也是接受欧共体农业保护主义政策进程的一部分，尽管这一政策对英国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英国在1973年正式加入欧共体。

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部分时间里，经济问题导致民族忧患意识加强。尽管威尔逊政府进行了长期抵

制，但英镑还是在1967年大幅贬值，导致该政府威望明显下降，而这本身则反映出英镑作为储备货币吸引力的锐减。在更普遍的层面上，由于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加上人们对这个国家治理的信心不足，社会问题充分凸显，尤其是70年代初煤矿工人的罢工，导致政府工资政策的失败。此后，由于在北海开采出大量石油，经济衰退的影响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掩盖。

不过，1984—1985年之间一次大规模矿工罢工的失败也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后，工会的好战情绪便大大降低。撒切尔对工会这种情绪的坚定立场，对于在经历7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混乱之后政府恢复控制力至关重要。矿工们在1972年的罢工中取得了胜利，并在1974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政府的倒台，因其面对工会激进主义时束手无策。相反，他们在1984—1985年的失败则体现了工会好战情绪的下降，同时也标志着极左翼对于搞垮撒切尔政府的希望的下降。

矿业危机导致了特定地区失业率的上升，这是当地经济与社会财富状态的一部分。如果强调全国总趋势，这种状态便可以轻易掩盖。但全国总趋势也足够糟糕。失业劳动力从1979年的130万左右上升到1983年的350万左右。传统采矿业及重工业，如以钢铁和造船业为重点的地区，不仅仅是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补贴最高，低周薪家庭所占比重同样也是最高的。在钢铁、造船等重工业衰落的同时，化工、汽车等新兴增长领域也开始显露颓势。对经济较低迷地区的转移支付，成为公共财政的关键因素。由于1978年制定的巴尼特公式(Barnett formula)机制，苏格兰成为转移支付的特别受益者。

而与威尔士一样，苏格兰也在议会中占据了过多的席位。这使得在未能根据人口分布情况重新分配议会席位的情况下，工党大大获益。

在制造业衰退的同时，经济结构开始变化，服务业崛起，工作体验也随之改变。管理、研究与开发工作日益与生产任务分离。前者并不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地区，而是集中在英格兰东南部，如伦敦以西、剑桥附近的M4走廊地带。其次是英格兰南部的新市镇（New Towns），如哈洛、米尔顿凯恩斯和斯蒂夫尼奇。在1997—2010年间，米尔顿凯恩斯是伦敦以外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在新市镇中，它是对逃离伦敦的中产阶级吸引力最大的一个，而其他第一批新市镇，如斯蒂夫尼奇（建于1946年，属于第一次规划）和哈洛，则只能用于容纳政府廉租房。

整体而言，“建制派”变得更加关注伦敦及英国东南部地区，金融业与服务业变得比传统产业的利益更加重要，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伦敦金融城打击巨大。东南部原本的纳税比例相当高，因此也得益于撒切尔对所得税的大幅削减以及对激励经济的强调。

在80年代，伦敦码头区的写字楼开发便在全国一骑绝尘。实际上，加拿大广场一号（One Canada Square）已经成为东伦敦码头区发展为以金融服务为重点的现代商业中心的象征。它位于金丝雀码头，是一座拥有金字塔顶的235米高的摩天大楼，建于1988—1991年间，是当时英国最高的摩天大楼。在2001—2012年间，位于金丝雀码头开发区的工作岗位数量翻了两番，

从27400个增加到100500个。而从非常不同的角度来看，犯罪与金融的联系也越发紧密。

东南部的发展将北部远远甩在身后。2013年，北部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为24000英镑，伦敦达到了约28000英镑。2013年，政府前能源顾问豪厄尔勋爵指出，英格兰东北部可以从页岩气开采中获益，因为那里包括“大片无人居住的荒凉地区”，这样的地区即便出现混乱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他的发言招致各路人士抨击。次年，地方政府协会（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报告称，在北部城市地区，16至24岁年轻人就业不足及学习成绩不良的问题很严重，尤其是在谢菲尔德、利兹、纽卡斯尔和曼彻斯特。2005年和2012年GCSE考试成绩最差的地方城市包括南约克郡、提赛德郡、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不过在2012年，也有一些乡村地区的首府城镇进入了这份名单，包括诺福克、萨福克、萨默塞特、多塞特、赫里福德郡和康沃尔。

除了伦敦金融城作为投资资本来源的重要意义，国家在控制与监管方面的角色，也使得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执政，伦敦的重要性都在加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威斯敏斯特和白厅在制定英国统一政策议程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1946年英格兰银行国有化和1948年建立国民医疗保健体系之后。

然而，隐藏在总体指标之下的区域差异仍然显著，这对于理解各地区迥异的变化历程非常关键。在东南部，不仅是伦敦，泰晤士河口沿岸以及梅德韦各城镇，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很多贫困问题。威尔士和苏格兰也有很多地方和区

域性反差值得关注。地方反差一直是英国史的一部分，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反差变得，或表现得更为激烈。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发展，同时也是因为住房政策的变化。根据1980年《住房法》（Housing Act）的“购买权”立法，政府廉租房广泛开放销售，但这种销售也造成了倾斜。富裕地区较好的住房被出售，公共部门名下只剩下“下沉式住房”，被相对贫困的人租用。在绝望当中，地方当局开始从90年代中期起，越来越多地对这些住房进行拆除，例如在纽卡斯尔西部。地方与区域反差也体现在其他一些数据上，比如公务人员雇佣比例，北部总是高于南部，还有健康指标，如心脏病发作率，苏格兰工人阶级的情况尤其糟糕。

服务业的兴起与消费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繁荣，但个人借贷的大幅扩展也不可忽视，而个人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尤其是信用卡以及后来的网购。由于国家提供了免费或补贴的医疗、教育、市政府住房、养老金和失业金，实际收入的增加也反映在消费当中。拥有洗衣机的家庭比例从1958年的25%上升到1964年的50%（1991年为88%），汽车和冰箱的拥有率则分别在1956年到1965年、1962年到1968年实现了这一提升。1953年，随着保守党以富裕和消费需求取代工党的紧缩政策，耐用消费品的购置税已从三分之二降至一半。在布莱尔改变政策之前，工党对经济个人主义和个人富裕持谨慎态度，更愿意注重国家管理和公共投资。

消费与多元文化社会

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遇到了诸多阻碍，包括石油价格上涨以及工会激进主义；但在80年代和90年代，实际收入增加、通货膨胀缓解、税收降低以及信贷放宽，鼓励了消费。撒切尔坚信应降低个人税收的必要性与价值，因此个人所得税标准从1979年的33%降至1988年的25%。和运动一样，消费成为身份的主要体现，实际上也是休闲时间的重要活动。这种转变体现在24小时商店的兴起以及对礼拜日交易限制的取消。市郊购物中心加入到这个属于消费主义与汽车的时代当中。1999年，两个号称“欧洲最大”的购物中心开业：佩斯利占地90万平方英尺的布雷黑德购物中心，以及伦敦肯特郊区的蓝湖购物中心。位于城镇里的商业街逐渐衰落，或者至少发生了某些变化，交通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例如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克雷迪顿及其附近地区。到1999年，英国88%的食品都是经由大型购物连锁超市销售。2003年，拥有20万名员工的乐购成为英国最大的私营公司雇主。

方便（Convenience）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无论是在语言中，还是思维方式上。同时它还成为一种描述方式，例如方便食品。这个概念与特殊的包装形式有关，例如采用塑料包装，还包括对衣物、鞋子的缝补修理大幅减少。这不仅导致了鞋铺及其他相关店铺的倒闭，也导致了诸如缝纫等家庭技能的丧失。这种丧失是女性活动重大转变的一部分。烹饪、保存食

物、编织和针线活等技能的重要性大不如前，这也反映了这些工作作为女性分内事务的传统的衰落。

购物模式对社会模式的反映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饮食发生了重大变化。红肉的重要性开始下降，相对清淡的肉类、鱼类及素食大行其道。来自世界各地的食材和菜品也得到了接纳，反映出英国人在饮食方面变得不那么狭隘，更愿意采取开放的态度。然而，这些仍是全国性的趋势。地方和区域的反差依然不可忽视，更具体地说，就是保守党和“新工党”倾向于低估的阶级问题。在这方面，富裕阶级在新鲜水果与蔬菜，以及鲜鱼（相对于炸鱼）的消费比重更高，而贫困阶级日常食材种类较少，新鲜食材也有限。这是更普遍的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在21世纪初第二个10年的时间里，独立店铺的外卖食品销量下降，部分原因是这些店铺往往位于较贫困的地区。相比之下，超市即食食品的销量则有所上升。

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文化与政治选择也呈现出差异，但没有充分联系。2014年YouGov的一项民调显示，在电视剧喜好方面，保守党选民更喜欢时代剧和不具争议性的剧集，如《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生于富贵人家》（To the Manor Born）、和《战地神探》（Foyle's War），而工党选民则更喜欢城市化的、设定不那么高贵典雅的作品，尤其是《凤凰之夜》（Phoenix Nights）、《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办公室》（The Office）和《罗伊尔一家》（The Royle Family）。

除了对食物的选择，到国外旅行和与外籍人士通婚也是这个相对不再排外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其他的表现方面。旅游是消费主义的主要焦点，受到报纸副刊和电视节目的积极迎合。由于可支配收入足够宽裕，加上携带资金出国没有任何限制，出国度假的人数从1971年的420万上升到1998年的3230万。尽管仍有大部分国民从未踏出国门，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布莱克浦等传统度假地，但国内旅游的重要性正在相对降低。这导致很多人的地方感大不一样，产生了一种国内与国外相互连接的感觉。去马略卡岛而不是拉各斯岛的苏格兰人，或是去塞浦路斯而不是去康沃尔或苏格兰的伦敦人，对自己国家的感受现在也有所不同。

国外生活方式与旅行的发展，也与21世纪初廉价航空线路的显著增加有关，尽管政府通过对机票征税来提高成本。技术、组织能力的进步，与消费主义相结合，使得成本得以降低，而利润则进一步提高。旅行价格降低的部分原因是对航线和机组人员更有效地利用，而对通过信用卡、电话或网络直接购票的鼓励，取消了旅行社这一中间环节，也对航空公司控制成本大有帮助。这也是社会正在越发摆脱当面办理事务的一个表现。此外，低价航空也使得交通地理格局再次改变，作为其枢纽的机场，如卢顿和斯坦斯特德，变得更加重要。这个例子说明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英国的地方与交通线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还在持续、迅速地变化。

部分是由于旅行的缘故，英国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偏见与种族主义倾向，其实远没有批评者所说的那么严重，从国际比较

上来看更是如此。实际上，宽容的多元文化是英国生活的主要特点，尤其是在英格兰，甚至可以看作是其社会的一个定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种名为“多文化伦敦英语”

（Multicultural London English）的新特色口语，即西印度、南亚和本土英语的混合体，在伦敦越发普遍，而在其他移民众多的城市则有类似的变体。

这个社会的开放性，与变化和延续的感受一起，形成了共同的动力。这种动力会受到不同定义的挑战，但在总体上，人们愿意接受这种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表述，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实际上，国家层面的价值观，或者说是其价值观的经典模型，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在公众对1997年威尔士王妃戴安娜不幸去世的反应中，克制悲伤（“咬紧牙关”）明显减少。新教和低调的种族主义在既有的社会实践中都很重要，但正在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宽容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强调，这同时也是国家的目标和手段。如果有59%的英国人在人口普查表上愿意把自己登记为“基督徒”，自然意味着这个国家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恨意已经大大减少。

同时，人们对未来因素的关注也有相当大的空间，而这种关注也与历史学家相关，因为它既是晚近过去（recent past）的一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于晚近过去的评价。关注的范围体现了公众意见的多样性，但可以看出几个主要的主题，包括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这个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成为热门，而在21世纪初随着全球变暖的证据不断增加而再次变得重要。气候变暖可能是2013—2014年冬季大风暴与大暴雨的

原因之一，大风暴暴露出运输和电力系统的脆弱性，而大暴雨则造成了大范围的洪水灾害。

对环境的忧虑还与对空气质量的特别担忧有关，在2006年前后则是对水资源是否充足的忧虑。2003年，积极分子阻止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此外，2013年发生了反对页岩气勘探的抗议活动；这一问题对下次大选造成影响的可能性在2014年继续攀升。

对环境影响的关注也反映了人们对人口数量增长的担忧，尤其是在英格兰南部。因此，对自然环境的忧虑，实际上是对人口/建筑环境忧虑的反映，来自于生活中的拥挤感所带来的压力。长期以来，试图使人们把高密度城市生活当成常态来接受的努力不断遭遇阻碍，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低密度郊区生活的普遍渴望，还在于城市问题的诸种现实，包括对犯罪的担忧，以及许多地区对于教育供给的担忧。

在一些地区，这种担忧与对大规模移民影响的忧虑杂糅在一起。这是现代英国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尽管移民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经验及世界观的核心，但它对于英国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显现。因此，帝国正式“归一”的过程，必然会带来诸多不安。

对于大规模移民的忧虑在21世纪初又有了新发展。特别是波兰在2004年加入欧盟，导致大批移民拥入之后。人口构成变化的影响更为突出，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生人数几乎与死亡和移居海外的人数持平，英国本土的人口一直保持在

5200万人左右。因此人口增长的大部分动力来自海外移民。居住在英国的非本土人口从1995年的480万，上升到2011年的1340万。其中印度裔移民最多，达72.9万，其次是64.6万的波兰裔移民。2013年最后三个月，在英国务工的保加利亚裔移民和罗马尼亚裔移民增加了四成以上，达到14.4万人。由此给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技术工作提供带来的压力，加剧了对新技术的影响。2014年4月，失业率达到6.5%。不过，移民也带来了劳动技术与税收，并且对本土人口的老齡化有所抵消。此外我们也应注意到，欧元区在2014年5月的失业率为11.1%，美国在6月的失业率则是6.1%。

移民影响还为英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主题，无论是电视上越来越流行的家谱节目，还是小说或戏剧中相关的作品。2009年在国家剧院上演的理查德·比恩（Richard Bean）的话剧《英国人都挺好》（England People Very Nice），便涉及了伦敦东区一个聚居区——贝瑟尔格林的历次移民潮：胡格诺人、爱尔兰人、犹太人、孟加拉人和索马里人先后登场。从某种角度上说，该剧的主题是种族同化，移民都变成了英国佬，所以酒吧女招待最后由一个爱尔兰－法国血统的女人担任，她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而她的孙子则拥有一半孟加拉血统。与此同时，这部作品也追溯了一些更深刻、更隐秘的主题。首先是排外者的无端愤怒，他们愤怒于胡格诺人抢了工作，爱尔兰人信仰天主教，犹太人制造了开膛手杰克血案（对此只是有一些捕风捉影的证据），还辱骂孟加拉人是“咖喱猴”。极右翼的英国国家党也成为作品的一个元素。更阴暗的则是作品最后一幕孟加拉新一代年轻人的登场。他们无意像长辈那样接受英国

价值观，而是把其他英国人当作异教徒来痛恨，崇拜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甚至不惜以不容忍和流血为代价，寻求建立一个英国哈里发王国。比恩的作品抓住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英国是否能继续应付它的多样性。

由于移民增加，国家的特性也在发生变化。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少数族裔中，只有小部分人愿意给保守党投票。此外，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看作英国人，而不是白人本土居民更愿意坚持的英格兰身份。此外也有人指出，随着移民继续增加以及相对较高的出生率，到2050年，英国少数族裔占人口的比重就将达到三分之一。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人们也对当前政府承诺责任的持续性予以关注，无论是面临着人口寿命越发延长以及由此带来的老龄化压力的养老金发放形式、对于足够住房的许诺，还是英国能够，或者说理应发挥的国际影响力的预期。借贷程度是引发人们对持续性关注的主要原因。2014年，英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为1117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预算赤字则占到4.6%。

经济前景面临的问题更大。2008—2009年，国家产出明显下降，尽管出口有所恢复，但仍未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与此同时，每位工人的产出下降了近4%，在2014年经济回暖之前，实际工资下降了7.8%。这造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贫穷感，与之相应的则是为了应对预算赤字而需要削减政府开支所造成的社会资本危机。借贷使得英国的信用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甚至危害到其本身。到2009年9月，英国国债高达8044亿英镑，相当于每个英国家庭都要分摊到25000英镑。

这种情况引发了强烈的不满，使得各政治派别中的民粹主义者都将其当作政治优势。高税收策略和专注于控制价格——例如能源——的策略，实际上是对全球经济压力和英国的投资需求的视而不见。

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欧盟显然无法满足大多数人对欧洲政策的期望。再加上对于社会是否有能力满足不同选民需求的焦虑，都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担忧。这些问题无法用顺理成章或传统固有的国家历史阐述来解答。实际上，这正是这段晚近历史的重要组成。

注释

[1] 本书出版于2014年。

[2] 出自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者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句，后被库尔茨引用，具体为：资本所具有的自律运转的机制决定了它为了自身可以冒一切风险，在权力的支撑下它更是勇气倍增。它绞尽脑汁也要将劳动力作为原料投入到自己的运行中，并榨干他们最后的一点能量。为此，它可以将那些轰鸣的工厂变成“魔鬼的磨坊”，暗讽资本主义劳动剥削。

第六章 结语

不确定性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重要主题。不确定性涉及了英国在欧盟以及不列颠诸岛内部的关系、恐怖主义的挑战，以及以前所未有速度涌入的移民对英国社会本质造成的极大影响。人们对环境状况及其前景也越发关注。更普遍的问题是，目标与成果不相匹配，政府的愿景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反差。这是前者过度夸大，而公众又对失败充分了解，并且十分敏感共同造成的结果。一系列涉及议员的腐败丑闻，尤其是2009年浮出水面的大规模虚报政府开支事件，进一步打击了人们对议会的信心。

同时，人们担心政府，实际上是任何政党执掌的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定义和维持国家诸种利益的可行阐释，因此国家认同也受到很大挑战。这造成了不确定性，也导致对于如何才能最好地呈现国家历史的紧张感。后者不仅出现在对于具体问题的讨论上，如对奴隶贸易、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叙述，还涉及对国家历史的一般解释和表述的问题，以及英国历史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辨识出一个民族、国家，乃至联邦的整体痕迹。

这一问题的主要关注点，因为支持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的论点而染上了浓厚的历史主义色彩，并且部分地建立在英国性是英格兰性的延伸，或者是被英格兰人所利用的观念之上。然而，这种说法无论对于英国性的定义还是重新定

义都意义寥寥。此外，英国性是多重意义上身份认同的一个方面，而非对于其他身份认同的排除。在探讨这些问题时，眼下及更遥远的历史都一再被重新讨论和修正。

此类争论并非新鲜事，也不仅限于这一问题。例如很多读者应该还记得，1979—1990年担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拒绝接受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先前30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规划与管理，以及对近代史的分析观点。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尤其是赤字财政（政府借贷），因其愿意接受危险的通货膨胀水平而饱受谴责，被认为会对社会造成破坏。此外，撒切尔还认为保守党和工党都未能限制工会的力量。但到了21世纪头10年后期，尤其是布朗政府时期，明显的凯恩斯主义补救措施却得到了认可，因为它帮助政府有效应对了这一时期的经济与财政危机。

从撒切尔本人的声誉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记忆缺乏固定性这一现实。撒切尔在担任首相期间饱受批评，但随后，到2013年辞世之时，她却被诸多不同的政治派别视为榜样。2013年4月8日，布莱尔在英国独立电视台（ITN）发表评论：“我认为工会框架、某些行业的私有化，以及她在税收和支出方面所做的一些事情，是我们当前普遍的政治共识的一部分。”不过在2013年，对于她施政的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

政府与其他公共历史（如电视上提供的历史阐释）长期存在，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倾向是，它们在提供一个整体描述的同时，不愿意接受其他可能的解释。这是一种存在误导性

的不良倾向。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乐意接受简单明晰的历史阐释，这种倾向也是错误的。存在争论的余地，不仅是对近代历史截然不同解读的结果，同时也是对英国历史进行长期解释的企图带来的紧张关系所造成的。

有四个特别的主题值得关注，其中每一个都可以将长期历史与近期的争议联系在一起。第一是英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欧洲国家，这一认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以及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看到不同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独特的分析框架。第二是英国、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关系。第三是被视为英国独有的自由所造成的紧张局面，尤其是这种自由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后者对于诸种自由（liberties）以及自由（freedom）理论和实践都构成了挑战，有时甚至是威胁。最后一个宗教在国家认同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对种族和民族问题的讨论联系在一起。

无论如何，这些问题都不可能达成一致，这种不一致本身就是英国历史的一部分，尤其是自18世纪镇压雅各布党人以来，辩论的相对自由一直都是英国政治的一个特点。自由本身的定义显然也不同，一些现在被视为合理的表达，早先是不能轻易公之于众的，舞台审查制度便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实际上，政治和社会讨论的允许范围变化很大。不过，英国向来拥有言论自由的传统。英国的出版前审查制度在1695年便随着《执照法案》的废止而入土。尽管社会舆论在18世纪90年代因欧洲大陆的革命危机受到了严重限制，但人们仍可以表达尖锐的观点，例如19世纪末迅速传播的共和主义观点。

同时，到20世纪，由于对社会尊卑等级强调的减弱、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扩大，以及社会进一步繁荣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表达不同意见的趋势更加突出，例如这些因素使得希望获得新闻信息的人可以及时得偿所愿。到1994年，99%的英国家庭拥有电视，其中96%的家庭拥有彩色电视。2011年，92%的英国人拥有手机，80%的英国家庭可以上网，60%的家庭可以接入超高速宽带。

近几十年来，由于人们对昔日可以作为正统的观念和机构，尤其是教会、君主制、法治原则、工会和政党的尊重不断下降，对不同意见的表达变得更为突出。所有这些都使围绕价值观展开的讨论变得越发不可预测。对过去做法的弃若敝屣成了人民与政府之间契约的一部分，而这契约正越发成为英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一系列政治和法律斗争，政府透明度不断提高，而这也是梅杰政府（1990—1997年执政）及其继任者所支持的明确契约的一部分，借以推动公共部门的改革。绩效目标被视为指导机构改进和个人选择的一种方式。满意度调查与市场研究以及焦点小组的使用相结合，以促进企业和公共服务的反应效率与民主意识。市场调研则被应用于政府及政治领域。到2012年，有关学校成绩、大学生满意度、犯罪模式、交通延误和医疗绩效等方面的信息都可以自由获取。国家统计局在2010年发行的手册，将2011年英格兰及威尔士的人口普查作为一种赋权形式：

是时候填写您的人口普查问卷了。人口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需要您参与其中，以便您所在地区的公共服务——如学校、医院、住房、道路交通及紧急服务——可以得到精准的规划和足够的资金。让我们一起构建未来。

其中也有直白的权威提醒——“法律要求您对人口普查做出回应”——还有两页纸的内容，提供了如何获得从阿坎语到约鲁巴语各种语言问卷副本的详细指导。没有人会被遗漏，尤其是在市中心区可能会因为登记不足，拨款请求被驳回的情况下。

尽管有关现在的信息不断增加，但公众对于过去的延续性感受却有所减弱。布莱尔政府（1997—2007年执政）的许多政策都反映出一种意识，即过去可以，实际上应该被轻易抛弃，未来则可以在不考虑历史延续性的情况下轻易构建。实际上，历史延续性已经变得不合时宜，是过去发明的产物：“新工党”试图用“新不列颠”和“一个年轻的国家”这样的口号，重新包装国家认同。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格林尼治千禧年穹顶的建造过程中，布莱尔政府一位非常高级的部长决定不考虑将任何历史元素加入其中。长期以来的宪法、政治和政府实践被改变，尤其是在上议院的组成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治理方面。

由于1997年的全民公决，苏格兰在1999年成立了议会。这个议会可以主持国内事务的实际立法，并拥有改变税收的权力。威尔士则成立了立法机构。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迅速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尤其是通过2001年的《研究生及学生资助法案》及《护理管理法案》，明确了具有明显差异的政府支出方案。反过来，伦敦的全国新闻广播对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报道也随之减少。苏格兰被称为一个“地区”，令苏格兰人大为光火。从苏格兰人的角度来看，这延续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苏

格兰被地区化的趋势，因为英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帝国、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而只是由英格兰人主导的“小不列颠”。与维多利亚时期相比，英格兰人对苏格兰文化的兴趣也明显减少。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和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仍是英格兰学校课程里非常重要的作家，但到60年代，他们却都被剔除了。而在苏格兰方面，文化封闭的倾向同样明显。

“新工党计划”（New Labour project）从一开始就很肤浅。而随着它越发黯淡，其框架和建议都显得越发多余。尤其是在对英格兰性的强调上，政府对此并无兴趣，反而试图提供一种地区主义（regionalism）和英国性并举的双重性。不过，工党在英格兰引入地区性议会的尝试并不成功，尽管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Assembly）得以成立，可以看作是对撒切尔时期废除的大伦敦委员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的复兴。因此，体育运动，尤其是足球，在表达和强化英格兰性方面肩负了更加广泛的政治作用，因为它传递了对于英国国家认同缺失的关注，在工党领导下，这个国家越发受制于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观念和利益。

地区主义对于英国想象并无多少促进作用，与英格兰地方主义（localism）并不相同。后者含有对于各郡县自身延续性的强烈承诺，而郡县正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然而，这种地方主义也已经被中央政府对公共生活的控制，乃至对私人生活的影响而削弱。这与美国形成了巨大反

差。在美国，各州本身仍可以提供具有延续性的旧英格兰根基，然而在英国，这一根基已经难以寻觅。

地方主义也因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被削弱。在艾伦·亨特的小说《轻轻落地》中，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物登场的诺森布里亚地主萨默海斯勋爵，对于地方与人的历史怀有强烈感受：

“北欧佬就是从那边来的！”萨默海斯用一种古怪的响亮声音喊道，“就是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大风，在没有甲板的船上，他们在那片海上航行，詹特里先生。一千年前有人看到了他们的龙帆，乘那些船来的人，他们最后的几个后裔现在还在北郡的河上航行。只要到这一带任何一个渔村去看看，你就能看到北欧佬……我们费弗雷尔人拥有诺曼血统，但诺曼人是什么时候在法国站稳脚跟的？”

这样的议论发表于1957年，现在看来仍然是陈词滥调，尤其是在英国；尽管在苏格兰民族主义的论点中，涉及一些民族起源的内容。

“新工党计划”的失败，使人们注意到既要恢复对国家历史的理解，同时又要避免对于这一历史过于肤浅的批判。无论是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工党政府（2007—2010年执政），还是他的继任者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领导的保守党联合政府（2010—2015年执政），都试图强调英国性，鼓励国家历史教育。这一进程存在争议，但对英国历史的诸多批判，无论是调性还是内容，都颇富历史气息，尤其是那些对爱国主义的刻意挑战。

实际上，英国与英国人的历史总是很有趣，在过去一千年里重要性越发显著，而在最近四分之一千年里变得至关重要，而且往往充满光荣、值得称赞。这不仅指其在过去创造的价值，还建立在比较之上。无论是法国、俄国等国革命的残酷与破坏，美国内战的巨大牺牲，还是德意志帝国主义酿成的种族灭绝等恶劣行径，很难不让人感觉，尽管英国作为帝国势力也曾犯下一些罪行，但总还是相对温和的。

此外，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对法律和个人权利的尊重，既提供了历史叙事，也提供了分析。这种分析并非是辉格式历史方法的阐释，而是对其中重要情节进行分析，便足以为当下，为整个世界提供值得关注的范例。英国历史特殊的伟大之处，在于那些为国家独立而奋战的人们，最具史诗意义的是1805年和1940年的抗争。但同时也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其中的人们也坚持了比国家的敌人们更崇高、更关键的价值观。

然而，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这种观念所传达的信心似乎越发摇摇欲坠。21世纪头10年尾声的经济有所复苏，金融危机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对住房和就业的忧虑，对他们造成了影响。人们普遍感觉，自己孩子将面对的前景，肯定不如自己父母时代那样好了，尤其是难以获得像样的住房，甚至连是否能有片瓦栖身都会成为问题，而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事实确实如此。2013年，有300万年龄在20至34岁的英国人仍与父母同住，而有28.9万个家庭，他们的屋檐下还要容纳另一个家庭，通常是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年轻夫妇。

2011年的伦敦骚乱已经表明了人们的不满可能会酿成怎样的后果，对警察的泄愤和对商品的劫掠都出现在其中。不过到2014年，这种不满的表达得到限制，更值得注意的则是犯罪率的下降。骚乱也表明了技术对人们选择的影响。骚乱者通过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进行组织协调，并对通话加密，给警方的应对造成了极大障碍。

对很多英国人来说，代际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及对身份认同的焦虑，后者主要集中在对移民以及欧盟其他国家关系的担忧上。老年人对此的表达更为突出。这个在人口统计上越发增多的群体，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时开始表现出对政治更多的关心。信心不足有时显得偏执，有时几乎是神经衰弱的表现，但这也表现出一种感受，即对于国家伟大光荣传统的既定说法，无论多么武断或片面，都已经很难迎合许多并非政治激进分子之人的经验，也难以为他们提供承诺。这是21世纪国家历史确定性明显不足的部分原因。

参考阅读书目

下面是一份例行公事的参考书目清单，主要是近期出版的一些书籍。通过这些书籍，你也可以找到其他值得参考的书籍和论文。

1. 英国史：前世与今生

T.Bartlett, Ireland: A History (2010).

T.M.Charles-Edwards, Wales and the Britons, 350 – 1064 (2013).

A.Cronin and L.O’ Callaghan, A History of Ireland (2nd edn, 2014).

M.Lynch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Scottish History (2011).

F.Pryor, The Birth of Modern Britain: A Journey into Britain’ s Archaeological Past, 1550 to the Present (2011).

I.G.Simmon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2001).

K.Tiller and G.Darkes (eds), An Historical Atlas of Oxfordshire(2010).

2. 公元1400年之前的历史

J.L.Bolton, Money in 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 973 – 1489(2012).

A.D.Carr, Medieval Wales (1995).

K.J.Edwards and I.B.M.Ralston (eds), Scotland: Environment and Archaeology, 8000 BC – ad 1000 (1997).

B.Goldring,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The Normans in Britain, 1066 – 1100 (2nd edn, 2012).

H.Hamerow et al. (eds), Oxford Handbook of Anglo-Saxon Archaeology (2011).

J.Huds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Laws of England, II. 871 – 1216(2012).

W.M.Ormrod, Political Life in Medieval England, 1300 – 1450 (1995).

M.L.Prestwich, English Politic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1990).

N.Vincent,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1066 – 1485* (2012).

3. 帝国崛起：1400–1750年

G.Burgess,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1500 – 1660* (2009).

S.J.Connolly, *Divided Kingdom: Ireland, 1630 – 1800* (2010).

I.Gentles, *Oliver Cromwell* (2011).

W.Gibson,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 1660 – 1851* (2012).

S.Gunn, *Early Tudor Government, 1485 – 1558* (1995).

A.Hughes,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2nd edn, 1998).

J.G.Jones, *Early Modern Wales, c.1525 – 1640* (1994).

D.MacCulloch, *The Later Reformation in England, 1547 – 1603* (1990).

A.Walsham, *The Reformation of the Landscape: Religion, Identity and Memor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and Ireland* (2011).

4. 帝国巅峰：1750年-1900年

E.Biagini, Gladstone (1994).

J.Black,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2nd edn, 2008).

P.Buckner (ed.), Canad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2010).

T.A.Jenkins, Sir Robert Peel (1999).

J.MacCaffrey, Scot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98).

I.Machin, The Rise of Democracy in Britain, 1830 - 1918 (2001).

J.Mokyr, The Enlightened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 - 1850 (2009).

A.Murdoch, British History, 1600 - 1832: National Identity and Local Culture (1998).

M.Pittock, Jacobitism (1998).

5. 帝国黄昏：1900年至当今

J.Black, Britain Since the Seventies (2004).

D.G.Boyce, The Irish Question and British Politics, 1868 – 1996 (2nd edn, 1996).

C.Brow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2006).

S.Bruley, Women in Britain since 1900 (1999).

W.H.Fraser,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 1700 – 1998 (1999).

D.Gladstone, The Twentieth-Century Welfare State (1999).

H.Goulbourne, Race Relations in Britain since 1945 (1998).

B.Harrison, Seeking a Role: The United Kingdom, 1951 – 1970 (2011).

B.Harrison, Finding a Role? The United Kingdom, 1970 – 1990 (2011).

A.Jackson, The Two Unions: Ireland, Scotland,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United Kingdom, 1707 – 2007 (2011).

B.Jackson and R.Saunders (eds), Making Thatcher' s Britain (2012).

R. McKibbin, *Parties and People: England, 1914 - 1951*
(2011).

A. Thorp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2nd edn, 2001).

索引^[1]

- 1900 House (1999) 8
- 1960s 148
- ‘Abolition of Suttee, The’ (1839) (Westmacott) 8–9
- 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 [to Rome] (1533) 59
- Act of Settlement (1701) 82
- Acts and Monuments of Matters Most Special and Memorable Happening in the Church (Book of Martyrs)* (1563) (Foxe) 64
- Adelaide (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111
- Aethelbert (King of Kent) 6
- Aethelred the Unready (King of England) 26
- Agincourt, Battle of (1415) 51
- agriculture 42–3, 55, 68–9, 93 *see also* farming
 - crises and 144–5
 - Great Agricultural Depression, the 124
 - improvement in 93
- Ailred (Abbot of Rievaulx) 31–2
- air travel 159–60
- Albert (Prin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29, 111–12
- Alexander II (King of Scotland) 36–7
- Alexander III (King of Scotland) 37
- Alfred (King of Wessex) 12, 24–5
- Alfred the Great in the Camp of the Danes* (1852) (Maclisc) 12
- America 40–1, 83, 84, 103–4
- Angles, the 19
- Anglo-Saxons 19–28
- animals 72, 143–4
- Ann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82
- anniversaries 73
- Appeasement 140
- Aragon, Katherine of (Queen of England) 58
- archaeology
 - Roman 17, 18
 - wealth and 20–1
- architecture 127, 128, 148, 156
- Argyll, Archibald, 9th Duke of 49, 80
- aristocracy 124 *see also* nobility
- Arthur (legendary king) 12, 19, 32, 41
- Asquith, Herbert (Prime Minister) 132
- astrology 89
- Athelstan (King of Wessex) 24
- Augustine, Saint 6
- Bacon, Francis 87
- Bacon, Nathaniel 60
- Balance of Power in 1831, The* (1831) 110–11
- Baldwin, Stanley (Prime Minister) 132, 139

- Balliol, Edward 38
 Barbour, John: *Brus* (1375) 41
 Barnstaple 96–7
 Barry, Sir Charles 127
 Bastard Feudalism 52
 Battle of Britain, the (1940) 140–1
 Bazalgette, Joseph 114
 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38–9
 Bean, Richard: *England People Very Nice* (2009) 162
 Beatles, the 148
 Beaumont, Francis: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 The* (1607) 69
 Becket, Thomas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33–4
 Bede 23, 31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731) 23
 Belisha beacons 135
 Bible, the 62–3
 Bill of Rights (1689) 82
 Bishops' Wars (1639–40), the 75
 Black Death (1348–51), the 44, 55, 62 *see also* plague
 Blair, Tony (Prime Minister) 153–4, 168–9
 Blake, George: *Shipbuilders, The* (1935) 138
 Boden, John 96–7
 Boer War (1899–1902), the 119–20, 122, 129
 Boleyn, Anne (Queen of England) 58, 59
 Bonnie Prince Charlie (Charles Edward Stuart) 49
Book of Martyrs (Acts and Monuments of Matters Most Special and Memorable Happening in the Church) (1563) (Foxe) 64
 Books of Orders 72–3
 Booth, George 79
 Boudicca (Queen of the Iceni) 16
 Bovine tuberculosis 144–5
 Bradford 102
 Brandling, Charles 94
 Bridgewater, Francis, 3rd Duke of 95
 Brierley, Walter: *Means Test Man* (1935) 138
 Britannia Foundry 95–6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138–9
 British Empire, the 83–7, 104, 118–23, 126–7 *see also* imperialism
 decline of 149–50, 154
 Britishness 125, 166, 169–71 *see also* identity, British
 Bronze Age, the 14
 Bruce, Robert 12, 37, 41
Brus (1375) (Barbour) 41
 Burgundy, Charles the Bold, Duke of 53
 Burgundy, John, Duke of 51
burhs 25
 Cabot, John 83
 Cade's Rebellion (1450) 52
 Caesar, Julius 15–16
 calendar, the 73
 Canada 83, 87, 122
 canals 95–6
 Canterbury 22
Canterbury Tales (c. 1387 and later) (Chaucer) 47
 capitalism 84
 Carlisle 102
 Carr, John Dodgson 102
 cars 133–5
 castles 28
 Catholic Gunpowder Plot, the (1605) 73

- Catholic Northern Rising, the (1569) 65
- Catholicism 6, 64–5, 67, 76, 80 *see also* Christianity; Church, the religion
- Emancipation and 4, 108
- Prayer Book Rebellion (1549), the 63
- censorship 139, 167
- census, the 168
- Cenwulf (King of Mercia) 23
- Chamberlain, Neville (Prime Minister) 140
- Charles I (King of England) 75–7
- Charles II (King of England) 77, 79–80
- Charles VI (King of France) 51
- Charles X (King of France) 108
- Chartism 112–13
- Chaucer, Geoffrey: *Canterbury Tales* (c. 1387 and later) 47
- childbearing 69, 97
- Christianity 17, 20–1, 29, 64, 147 *see also* Catholicism; Church, the; Protestantism; religion
- identity and 23–4
- Lollard movement, the 46
- Third Crusade 34–5
- Christie, Agatha 138
- Chronicle of the Scottish People* (1380s) (Fordun) 41
- Chronicles* (1577) (Holished) 73
- Church, the 23, 29, 32, 42, 88 *see also* Catholicism; Christianity; religion
- membership 147
- Puritanism and 67, 78
- Reformation, and the 6, 50, 57–65
- cinema 8–9, 135
- civil war 29–30, 31, 36, 39, 49–50
- English Civil War (1642–51) 75–7
- Wars of the Roses (1455–87) 52–4, 56–7
- Clarkson, Thomas: *Substance of Sundry Persons on the Slave Trade, The* (1788) 119
- class *see* society
- Claudius (Emperor of the Roman Empire) 16
- climate 13, 55 *see also* environment, the
- clocks 46–7 *see also* timekeeping
- cloth 55–6
- Cnut (King of England) 27
- coal 92–5, 97–8, 100, 152–3 *see also* mining
- Coke of Norfolk (Earl of Leicester) 93
- Cold War, the 150
- College of St George 41
- colonialism 50, 83 *see also* British Empire, the; imperialism
- Comedy of Errors* (Shakespeare) 89
- Common Law 32 *see also* law
- Commonwealth, the 150, 154
- communication 21–2 *see also* transport
- Compton-Burnett, Ivy 138
- conscription 131, 142
- Conservative Party, the 116, 129, 136, 139, 151–3 *see also* Tories
- conservatism 106, 139
- Constantine III (Western Roman Emperor) 18
- consumerism 84–5, 124, 137, 143, 148–9
- borrowing and 157
- cars and 135
- shopping and 149, 158–9
- travel and 159–60

- convenience 158
- Copper Age, the 14
- Cornwall 19
- Cort, Henry 95
- Cotta, John: *Trial of the Witchcraft, The* (1616) 88–9
- Cranmer, Thomas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59, 64
- Crecy, Battle of (1346) 40
- Crediton 72
- Cromwell, Oliver 76–9
- Cromwell, Richard 79
- Cromwell, Thomas 61, 62
- Crusade, the Third 34–5
- Culloden, Battle of (1746) 49, 82
- culture 148, 162
 - cinema 8–9, 135
 - drama 67–8, 69–70, 89
 - fiction 98, 101, 116, 127–8, 138–9
 - literature 89 *see also* fiction
 - music 139, 148
 - Scottish 169
- Cumberland, Ernest, Duke of 112
- Cumberland, William, Duke of 49, 82, 107
- curiales* 30
- Cuthbert, Saint 31

- D. C. Thomson 139
- Darwin, Charles: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The* (1859) 127
- David I (King of Scotland) 30
- David II (King of Scotland) 38, 39
- Death of Nelson, The* (1864) (Maclise) 12
- Declaration of Arbroath 37
- defence 150 *see also* military power
- deference 116–17, 145, 167–8
- Dekker, Thomas
- Roaring Girl, The* (1610) 70
- Shoemaker's Holiday, The* (1599) 69
- Witch of Edmonton, The* (c. 1621) 89
- demographic expansion 43–4
- Denmark 26–7
- Derby Lace Works 96–7
- Diana, Princess of Wales 160
- Dickens, Charles 98–9
 - Dullborough Town* (1860) 100–1
 - Hard Times* (1854) 98
 - Little Dorrit* (1855–7) 116
- diet 158–9 *see also* rationing
- Digger movement, the 9, 78
- Discovery of Witchcraft, The* (1584) (Scot) 88
- disease 70–1, 72
- Disraeli, Benjamin (Prime Minister) 116, 120
-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60–1
- divorce 146
- Domesday Book* 29
- Dominion status 122
-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 (Orwell) 138
- drama 67–8, 69–70, 89
- Drummond Scale, the 110
- Du Maurier, Daphne 138
- Dudley, Edmund 57
- Dudley, John (Earl of Warwick/Duke of Northumberland) 63
- Dullborough Town* (1860) (Dickens) 100–1

- Eadred (King of England) 24
- early man 13
- East India Company 83, 86
- Easter Rising (1916), the 131, 132

-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731) (Bede) 23
- Ecgrith (King of Northumberland) 22
- economy, the 52–3, 92–102, 132, 137, 163 *see also* consumerism
- British Empire, and the 84
- decline in 154
- Great Depression, the 136, 137
- Keynesian economics 166
- money economy 43–4
- plague and the 55
- South East and the 155–6
- World War Two and 142
- Edgar (King of England) 24, 126
- Edmund Ironside (King of England) 27
- education 116–17
- Edward ‘The Black Prince’ 45
- Edward ‘the Confessor’ (King of England) 27, 31–2
- Edward the Elder (King of Wessex) 24
- Edward I (King of England) 36, 37
- Edward II (King of England) 37–9
- Edward III (King of England) 37, 39, 41
- Edward IV (King of England) 53–4
- Edward V (King of England) 54
- Edward VI (King of England) 63
- EEC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151, 154
- Egbert (King of Wessex) 23
- elderly, the 171
- electoral reform 108–10, 115–16, 117, 131–2 *see also* Chartism
- electricity 137–8
- Elgar, Edward 139
- Elizabeth I (Queen of England) 59, 62, 64–8
- emigration 125
- employment 146–7 *see also* labour; unemployment
- Empson, Richard 57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26
- England 2, 32, 68, 169 *see also* Old English kingdom
- civil war and *see* civil war
- identity and 23–5, 31–2, 41, 66
- as a republic 77
- England People Very Nice* (2009) (Bean) 162
- environment, the 71, 143–4, 160–1
- Essex, Robert, 2nd Earl of 67
- EU (European Union) 151
- Europe 167
-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151, 154
- European issues 50
- European Union (EU) 151
- evacuation 142
- Exclusion Crisis, the (1678–81) 80
- Factory Acts 113
- Falklands War (1982), the 150
- farming 14 *see also* agriculture
- feudalism 29, 52
- fiction 98, 101, 116, 127–8, 138–9 *see also* literature
- film 8–9, 135
- financial services 155–6
- fire 71–2
- Fisher, John (Bishop of Rochester) 59
- Fitz Osbert, William 35
- foot-and-mouth disease 144
- Ford, John: *Witch of Edmonton, The* (c. 1621) 89

- Fordun, John: *Chronicle of the Scottish People* (1380s) 41
- foreign policy 154 *see also* war
- Foster, Myles: *Newcastle upon Tyne from Windmill Hill, Gateshead* (c. 1871–2) 103
- Four Feathers, The* (1939) 8
- Fox, Charles James 7
- Foxe, John: *Acts and Monuments of Matters Most Special and Memorable Happening in the Church (Book of Martyrs)* (1563) 64
- France 33, 38, 53, 108
 war with 50–2, 64, 81, 85, 86 *see also* Hundred Years War, the; Napoleonic Wars, the
- franchise, the 5 *see also* Chartism; vote, right to
- freedom x, 12 *see also* liberty
- freedom of speech 167 *see also* censorship
- Froude, J. A.: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all of Wolsey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1858–70) 126
- Gaskell, Elizabeth
 Mary Barton (1848) 98
 North and South (1855) 98
- Gaveston, Piers 38
- genealogy 8
- General Strike (1926), the 132, 136
- Geoffrey of Monmouth 32, 59
 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 (c. 1136) 32, 59
- geography 9–10, 13–14, 96, 156–7
- railways and 100
- George I (King of Great Britain) 82
- George III (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 7, 107, 111
- George IV (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 7, 94–5, 106–7, 111
- Germany 120, 130, 140
- Germanus, Saint (Bishop of Auxerre) 18
- Gilbert, W. S.: *Pirates of Penzance, The* (1879)
- Gladstone, William (Prime Minister) 115, 125
- Glorious Revolution (1688), the 7, 81–3
- Glyndwr, Owain 46
- gold 20, 21
- Gothic Revival, the 127
- Gough Map, the 46
- government 26, 30, 32–3, 136–7, 151 *see also* Magna Carta; Parliament
 British Empire and 121–2
 Cromwell, Oliver and 76–9
 House of Lords 130, 154
 powers 130–1
 Provisions of Oxford (1258), and the 36
 records and 34, 46 *see also* regulation
 regulation 113–15, 142
 Rump Parliament 78–9
 tyranny and 34
- grain 72–3
- Great Agricultural Depression, the 124
- Great Depression, the 136, 137
- Great Exhibition (1851), the 112
- Great Famine (1315–17), the 44
- Great Fire of London (1666), the 71
- Great Plague (1665), the 70

- Great Revolt (1381), the 44–5
 see also Peasants' Revolt
 (1381), the
- Green, John Richard: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1874) 126
- Greenwood, Walter: *Love on the Dole* (1933) 138
- Grey, Earl (Prime Minister) 109–10
- Grey, Lady Jane 63
- Gunpowder Plot, the 4
- guns 132–3
- Gurney, Goldsworthy 99
- Habeas Corpus Act (1679) 40
- Hadrian's Wall 16
- Halley, Edmund 85
- Handel, George Frederick 86
 Saul 86
- Hanoverian dynasty, the 13
- Harald Hardrada (King of Norway) 27
- Hard Times* (1854) (Dickens) 98
- Harold Harefoot (King of England) 27
- Harold II (King of England) 27–8
- Harthacnut (King of England) 27
- He Knew He Was Right* (1868–9) (Trollope) 117–18
- health 114 *see also* medicine; plague
- Heath, Edward (Prime Minister) 154–5
- Heathcote, John 96
- Held Fast for England: A Tale of the Siege of Gibraltar* (1892) (Henty) 128
- Henry I (King of England) 30
- Henry II (King of England) 31, 32–3, 34
- Henry III (King of England) 35–6
- Henry IV (King of England) 45, 53
- Henry IV, Part 1* (1597) (Shakespeare) 9–10
- Henry V (King of England) 50–1, 53
- Henry VI (King of England) 12, 52, 53
- Henry VII (King of England) 56, 57
-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56, 57, 58–62, 67
- Henry VIII* (1613) (Shakespeare) 6
- Henty, George Alfred 127
 Held Fast for England: A Tale of the Siege of Gibraltar (1892) 128
 St George for England: A Tale of Cressy and Poitiers (1885) 128
 Under Drake's Flag (1883) 128
 With Clive in India: or the Beginnings of an Empire (1884) 128
 With Wolfe in Canada: The Winning of a Continent (1887) 128
- Hereford *mappa mundi* 42
- Hereward the Wake* (1866) (Kingsley) 127
- 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 (c. 1136) (Geoffrey of Monmouth) 32, 59
- historic sites 148
-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all of Wolsey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1858–70) (Froude) 126
- Hitler, Adolf 140
- Holinshed, Raphael: *Chronicles* (1577) 73
- Honiton 72
- Honorius (Western Roman Emperor) 18

- Hopkins, Roger 99
- Hore-Belisha, Leslie 135
- House of Lords 154
- household structure 69
- Houses of Parliament 127
- housing 71, 133–4, 143, 157
- Howard, Katherine (Queen of England) 62
- Howard, Charles (11th Duke of Norfolk) ix
- Hundred Years War (1337–1453), the 38, 40
- Hunter, Alan: *Landed Gently* (1957) 150, 170
- identity 1, 11
 - British 31, 86–7, 123, 125, 166, 170–1
 - Christianity and 23–4
 - English 23–4, 31–2, 41, 66
 - national 11, 25, 41, 139, 165–7
 - Scottish 36, 41
- illegitimacy 69, 97
- immigration 30, 145, 161–2
- imperialism x, 8–9 *see also* British Empire, the; colonialism
-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The* (1895) (Wilde) 101
- independence 126, 149–50
 - Scotland and viii, 37, 74, 169
- India 121, 149
- industry 71, 92, 94–9 *see also* manufacturing; railways
 - decline of 155
 - population and 103
 - society and 103
- information retention 34
-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50
- Interregnum, the 77–9
- Invisible Weapons* (1938) (Rhode) 137–8
- Ireland 15, 68, 107, 123
 - Easter Rising (1916), the 131
 - nationalism and 125, 131, 133
 - population 68
- Irish Free State, the 133
- Iron Age, the 14–15
- Isabella (Queen of England) 39
- Isandlwana, Battle of (1879) 119
- Isles, Lord of the 54
- Jacobitism 49, 81–2
- James I (King of England) 73–4
- James I (King of Scotland) 54
- James II (King of England) 7, 49, 77, 80–1
- James II (King of Scotland) 54
- James III (King of Scotland) 54
- James IV (King of Scotland) 54, 57
- James VI (King of Scotland) 73–4
- James VII (King of Scotland) 7, 49, 77, 80–1
- Jefferson, Thom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4
- Jews 41, 78
- Joan of Arc 51
- John (King of England) 34, 35–6
- Jordan, Dorothy 111
- Jutes 19
- Katherine of Aragon (Queen of England) 58
- Kent 22
- Kent, Edward, Duke of 111
- Kett's Rebellion (1549) 63
- Keynes, John Maynard 166
- kingdoms 22–7
- Kingsley, Charles 127
 - Hereward the Wake* (1866) 127
 - Westward Ho!* (1855) 127
- Kinnock, Neil 153
-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 The* (1607) (Beaumont) 69

- labour 55, 92, 96 *see also*
employment
- Labour Party, the 132, 136, 142,
151–3
*Meet the Challenge, Make the
Change* (1989) 153
New Labour 168–70
- laissez faire* 114
- Lancaster, Thomas, Earl of 37–8
- Lancet* 114
- land, ownership of 29
- Landed Gently* (1957) (Hunter)
150, 170
- Lanfranc 29
- Langland, William: *Piers
Plowman* (1362–92) 47
- Langton,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42
- language 47, 139, 148, 160
- Laud, William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76
- law 26, 32–3, 40, 57, 135 *see also*
Magna Carta
- legislation 148–9
- Leicester, Robert, 1st Earl of 74
- Leicester, Thomas, Earl of 93
- leisure 55, 115, 124, 138–9 *see*
also cinema
- Leland, John 59
- Leo XIII (pope) 123
- Leopold I (King of the Belgians)
111
- Letters from a Persian in
England* (1735) (Lyttelton)
82–3
- Levellers movement, the 77–8
- Liberal Party, the 129–30, 132
- Liberalism 113
- liberty 7, 80, 125–6, 167 *see also*
freedom
- life expectancy 68, 145
- Lilly, William: *Stary Messenger,
The* (1645) 89
- Lincoln, John, 1st Earl of 56
- lineage 8
- literature 89 *see also* fiction
- Little Dorrit* (1855–7) (Dickens)
116
- Liverpool, Robert, 2nd Earl of
(Prime Minister) 94, 105
- living conditions 71–2, 103, 114,
171 *see also* electricity;
housing
- Lloyd George, David (Prime
Minister) 132
- Locke, John 88
- Lollard movement 46
- London 17, 84–5, 128, 156–7
dialect 23
London riots (2011) 171
as a port 21
sewage system 114–15
World War One and 131
World War Two and 141–2
- longitude 90
- Louis XI (King of France) 53
-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80,
81
- Louis XVIII (King of France) 108
- Love and Mr Lewisham* (1900)
(Wells) 101
- Love on the Dole* (1933)
(Greenwood) 138
- Lyttelton, George 82–3
*Letters from a Persian in
England* (1735) 82–3
- MacAlpin, Kenneth (King of the
Picts) 26
- MacDonald, Ramsey (Prime
Minister) 136
- Maclise, Daniel
*Alfred the Great in the Camp
of the Danes* (1852) 12
Death of Nelson, The (1864)
12

- Wellington and Blücher at Waterloo* (1861) 12
- Macmillan, Harold (Prime Minister) 132
- Magna Carta ix, 1–2, 12, 35–6
Parliament and 39–40
- Malcolm III (King of Scotland) 30
- Mall, The 128
- Manchester 102
- Mantel, Hilary 61
- manufacturing 55, 90, 135–6, 154
see also industry
- maps 9, 42, 46, 73
- March, Earl of (Roger Mortimer) 39
- Margaret, Maid of Norway (Queen of Scotland) 37
- market research 168
- marriage 69, 97, 146
- Mary, Queen of Scots 65
- Mary Barton* (1848) (Gaskell) 98
- Mary of Modena (Queen of England) 80
- Mary I (Queen of England) 59, 63–4
- Mary I (Queen of Scotland) 65
- Mary II (Queen of England) 70, 81
- Massinger, Philip: *New Way to Pay Old Debts, A* (c. 1622) 70
- Matilda (Holy Roman Empress) 31
- Means Test Man* (1935) (Brierley) 138
- Meath, Reginald, 12th Earl of 120
- medicine 70–1, 145 *see also* health
- Meet the Challenge, Make the Change* (1989) (Labour Party) 153
- Menzies, John 101
- Mercia 22–3
- metallurgy 95
- Methodism 88
- middle class, the 116
- Middleton, Thomas: *Roaring Girl, The* (1610) 70
- migration 103
- military power 26, 29, 74–5, 119–20, 150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and 104
World War One and 130
World War Two and 140–1
- Mills and Boon 139
- Milton Keynes 155
- miners' strikes 154–5
- mining 155
- Modernism 138
- modernity 4
- monarchy, the 57, 58, 106–7, 121
see also Restoration, the
- monasteries 60–1
- Monck, George 79
- Monmouth, James, Duke of 49, 80
- Montfort, Simon de 36
- moral code 145
- More, Thomas 59
- Mortimer, Roger (Earl of March) 39
- Mosley, Oswald 139
- multiculturalism 160
- music 139, 148
- Napoleonic Wars (1793–1815), the 104
- narratives 5–10
- National Government 136–7
- national histories 73, 165–6
- national identity 11, 25, 41, 139, 165–7
- National Insurance 130
- national values 160

- nationalisation 151–2
- nationalism 59, 125–8, 127–8, 151
 - Ireland and 125, 131, 151
- navigation 85, 90
- Nelson, Admiral Horatio 104, 118
- Nelson's Column 118
- New Albion Mill 94
- New Labour 168–70
- New Towns 155–6
- New Way to Pay Old Debts, A* (c. 1622) (Massinger) 70
- Newcastle upon Tyne from Windmill Hill, Gateshead* (c. 1871–2) (Foster) 103
- Newcomen engines 94
- Newton, Sir Isaac 87, 90
- Nibley Green, Battle of (1470) 57
- nobility, the 30, 38, 52, 65, 74–5
 - see also aristocracy
- Nonsuch Palace 60
- Norfolk, 11th Duke of (Charles Howard) ix
- Normans, the 28–32, 41
 - castles and 28
- Norreys, Lord 74
- North and South* (1855) 98
- Northern Ireland 133, 151
- Northumberland, John Dudley, Duke of 63
- Northumbria 22
- Offa (King of Mercia) 22–3
- Offa's Dyke 23
- Oh! What a Lovely War* 9
- Old English kingdom 24–6
- Order of the Garter 41
-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The* (1859) (Darwin) 127
- Orwell, George
 -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 138
 - Road to Wigan Pier, The* (1937) 138
- Parker, Matthew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6
- Parliament 39–40, 47, 67, 73
 - Charles I and 75–7
 - Glorious Revolution, and the 82
 - Houses of Parliament 127
 - Rump Parliament 78–9
- Paulinus, Gaius Suetonius 16
- Peasants' Revolt (1381), the 9, 44–5
- Philpotts, Henry (Bishop of Exeter) 105
- Pickard, James 94
- Picts, the 19, 22 see also MacAlpin, Kenneth
- Piers Plowman* (1362–92) (Langland) 47
- Pilgrimage of Grace (1536), the 61–2
- Pirates of Penzance, The* (1879) (Gilbert and Sullivan) 120
- 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Prime Minister) 104
- plague 44, 55, 62, 70, 79
- Plymouth, Other, 5th Earl of 72
- police forces 113
- politics 38, 67, 82–3, 91–2, 103–4 see also government; Parliament; reform
- neutrality and 110–11
- poor laws 61 see also National Insurance
- poor relief 72, 96, 113
- popular culture 148
- population 43–4, 45–6, 55, 68, 97, 143
 - composition of the 145
 - environment and 161
 - immigration and 161

- industry and 103
- of London 85
- trade and 98
- postal services 101–2
- poverty 157
- Prayer Book Rebellion (1549), the 63
- printing 62–3, 85, 88–9
- propaganda 131
- protest movements
 - Chartism 112–13
 - Digger movement, the 9, 78
 - Levellers movement, the 77–8
 - Lollard movement, the 46
 - suffragette movement, the 117
 - Tolpuddle Martyrs 9
- Protestantism 6, 66 *see also*
 - Church, the; Christianity; religion
 - anniversaries and 73
 - European 80
 - Prayer Book Rebellion (1549), the 63
 - Reformation, the 6, 50, 57–65
- Providence 89–90
- Provisions of Oxford (1258), the 36
- public works 114
- Pugin, Augustus 127
- Puritanism 67, 78

- radicalism 103–4
- radio 138–9, 148
- railways 94, 99–192, 120, 134
- rationing 142
- reality television 8
- rebellion *see* unrest
- records 34, 46
- reform 103–11, 113–17 *see also*
 - electoral reform
 - Albert (Prin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112–13
 - World War One and 131
- Reform Acts/Bills 109–10, 115
- Reformation, the 6, 50, 57–65
- Reformers' Attack on the Old Rotten Tree, The* (1831) 110
- refridgeration 137
- regions 156–7, 167, 169–70
- regulation 113–15, 142
- religion 17, 46, 66, 67, 146–7 *see also* Christianity; Church, the; Protestantism
 - heterodoxy and 58
 - national identity and 167
 - Prayer Book Rebellion (1549), the 63
 - Reformation, the 6, 50, 57–65
 - science and 87
 - tolerance and 4, 88, 108, 122–3
-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149
- respect *see* deference
- Restoration, the 79–80
- revolution *see* unrest
- Rhode, John: *Invisible Weapons* (1938) 137–8
- Richard of Wallingford (Abbot of St Albans) 46–7
- Richard I (King of England) 34–5
- Richard II (King of England) 45, 46, 49
- Richard III (King of England) 54, 56
- riots *see* unrest
- Road to Wigan Pier, The* (1937) (Orwell) 138
- roads 17, 100, 135 *see also* trackways; transport
- Roaring Girl, The* (1610) (Dekker and Middleton) 70
- Robert the Bruce 12, 37, 41
- Robert I (King of Scotland) *see* Robert the Bruce

Robert II (King of Scotland) 39
 Rolling Stones, the 148
 Roman Britain 15–18
Romeo and Juliet (Shakespeare) 89
 Rowley, William: *Witch of Edmonton, The* (c. 1621) 89
 Royal Society, the 87–8
 RPM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149
 Rump Parliament 78–9
 rural society 46, 143–4

St George for England: A Tale of Cressy and Poitiers (1885) (Henty) 128
 saints, cult of 32
Saul (Handel) 86
 Saxons, the 19
 Sayers, Dorothy L. 138
 science 87–8, 90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e 87–8
 Scot, Reginald: *Discovery of Witchcraft, The* (1584) 88
 Scotland 19, 26, 36–7, 53, 155
 Bishops' Wars, the 75
 colonialism and 83
 conflict in 54
 Cromwell, Oliver and 78
 culture and 169
 economy of 86
 George III and 107–8
 identity and 36, 41
 independence and viii, 37, 74, 169
 nationalism and 125, 151
 Normans, and the 30
 Parliament in 41
 Population of 68, 97
 Reformation, and the 65
 theatre in 67
 union with England 86, 107
 unrest and 37, 52, 80
 service sector 155–7
 sex 69, 146 *see also* censorship
 Shakespeare, William 6, 67–8
 Comedy of Errors 89
 Henry IV, Part 1 (1597) 9–10
 Henry VIII (1613) 6
 Romeo and Juliet 89
Shipbuilders, The (1935) (Blake) 138
Shoemaker's Holiday, The (1599) (Dekker) 69
 shops 149, 158–9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1874) (Green) 126
 silver 21
 Simnel, Lambert 56
 Simon of Sudbury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and Chancellor) 45
 Sinn Féin 133
 slave trade, the x, 84, 118–19
 smallpox 70
 Social Darwinism 127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52
 social politics 69
 Socialism 142, 152–3
 society 46, 68–73, 87, 143–9, 158–63
 diet and 159
 industry and 103
 middle class, the 116, 138
 tolerance and 160
 unrest and *see* unrest
 variations in 159
 Victorian 111–17
 wealth and 102
 working class, the 113, 115, 124–5, 138
 Somerset, Edward, Duke of 63
 Spain, war with 66, 67, 85, 86
 Spanish Armada, the 66
 sport 169

Stary Messenger, The (1645) (Lilly) 89
 Statute of Purveyors (1362) 40
 steam power 94–5 *see also* railways
 Stephen (King of England) 31
 Stephenson, George 99
 Stewart, Robert 39
 Stiffkey Hall 60
 Stone Age, the 13
 Stonehenge 14
 Strafford, Thomas, 1st Earl of 75
 Stuart, Charles Edward (Bonnie Prince Charlie) 49
 Stuart dynasty, the 7–8
Substance of Sundry Persons on the Slave Trade, The (1788) (Clarkson) 119
 suffragette movement, the 117
 Sullivan, Arthur: *Pirates of Penzance, The* (1879)
 superiority 125, 127
 Surrey Iron Railway Company 99
 surveillance 131
 sustainability 162–3
 Sutton Hoo 20
 Sweet Track 14
 Symeon of Durham: *Tract on the Origins and Progress of this the Church of Durham* 31
 tariffs 129
 Taunton 7
 taxation 40, 44, 57, 157
 Chartism and 113
 income tax 104, 158
 mercenaries and 26
 records and 34
 South East, and the 156
 unrest and 35, 38, 44, 45, 61
 war and 38, 40, 44, 60
 technology 157, 167, 171
 television 8, 139, 159, 169
 Thatcher, Margaret (Prime Minister) 151–3, 155, 166
 theatre 67–8, 69–70, 89
 timekeeping 46–7, 101 *see also* clocks
 Tiverton 72, 96–7
 tolerance 160 *see also* religion, tolerance
 Tolpuddle Martyrs 9
 Tories, the 80, 105 *see also* Conservative Party, the
 Tower Bridge 128
 Townshend, Charles, 2nd Viscount, ‘Turnip’ 93
 trackways 14 *see also* roads and transport
Tract on the Origins and Progress of this the Church of Durham (Symeon of Durham) 31
 trade 17, 20–1, 50, 98, 124 *see also* British Empire,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he
 trade unions 129, 155
 transparency 168
 transport 21–2, 25, 42, 44, 94
 air travel 159–60
 canals 95–6
 cars 133–5
 railways 94, 99–102, 134
 roads 17, 100, 135
 travel 159–60
 Trevithick, Richard 99
Trial of the Witchcraft, The (1616) (Cotta) 88–9
 Trollope, Anthony 117
 He Knew He Was Right (1868–9) 117–18
 True Levellers, the *see* Digger movement, the
 Tyler, Wat 45

- uncertainty 165
- Under Drake's Flag* (1883) (Henty) 128
- unemployment 136, 137, 138, 155, 161–2
- universities 42
- unrest 23, 28, 35, 105–6, 132
 - see also* civil war; protest movements; war
 - Bishops' Wars (1639–40), the 75
 - Cade's Rebellion (1450) 52
 - Catholic Gunpowder Plot, the (1605) 73
 - Catholic Northern Rising (1569) 65
 - Digger movement, the 9, 78
 - Easter Rising (1916), the 131
 - General Strike (1926), the 132, 136
 - Great Revolt (1381), the 44–5
 - Jacobitism 49, 81–2
 - Kett's Rebellion (1549) 63
 - Lollard movement, the 46
 - London riots (2011) 171
 - miners' strikes 154–5
 - Montfort, Simon de and 36
 - Peasants' Revolt (1381), the 9, 44–5
 - Pilgrimage of Grace (1536), the 61–2
 - Prayer Book Rebellion (1549), the 63
 - Scotland and 37, 52, 80
 - taxation and 35, 38, 44, 45, 61
 - Tyler, Wat 45
- Upper Palaeolithic period 13
- urbanisation 97–8, 114–15, 127, 133
- Vaughan Williams, Ralph 139
- vernacular culture 47
- Victoria (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Empress of India) 111, 120, 122–3, 128
- Vikings, the 24, 26–8
- Vile Bodies* (1930) (Waugh) 139
- violence *see* unrest
- Virginia Company, the 83
- visual images 9–10
- vote, the right to 108–10, 115, 117, 131–2, 147 *see also* Chartism; franchise
- Wakley, Thomas 114
- Wales 19, 23, 46, 151, 169
 - population 68
 - union with England 62
- Wallace, William 12
- Walsingham Abbey 60
- Walter, Hubert 35
- Walworth, William (Mayor of London) 45
- war 31, 49–50, 60, 119 *see also*
 - civil war
 - Bishops' Wars (1639–40), the 75
 - Boer War (1899–1902), the 119–20, 122, 129
 - Cold War, the 150
 - English Civil War (1642–51) 75–7
 - Falklands War (1982), the 150
 - France and 50–2, 64, 81, 85, 86 *see also* Hundred Years War, the; Napoleonic Wars, the
 - Hundred Years War (1337–1453), the 38, 40
 - Napoleonic Wars (1793–1815) 104
 - Spain and 66, 67, 85, 86
 - taxation and 38, 40, 44, 60
 -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1775–83) 104

- War of the British Succession (1685–1745) 49
-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1701–14) 85, 109
- Wars of the Roses (1455–87) 52–4, 56–7
- World War One (1914–18) 130–2
- World War Two (1939–45) 140–3
- Warwick, Edward, Earl of 56
- Warwick, John Dudley, Earl of 63
- Warwick, Richard, Earl of 53
- Watt, James 94–5
- Waugh, Evelyn: *Vile Bodies* (1930) 139
- wealth 20–1, 44, 102, 138, 156–7
- Wellington, Arthur, Duke of (Prime Minister) 104, 108–9
- Wellington and Blücher at Waterloo* (1861) (MacLise) 12
- Wells, H. G.: *Love and Mr Lewisham* (1900) 101
- Wesley, John 89
- Westward Ho!* (1855) (Kingsley) 127
- Wessex 23, 27
- Wessex, Godwin, Earl of 27
- West Indies, the 83–4
- Westbury 12
- Western Isles, Lord of the 54
- Westmacott, Richard: ‘Abolition of Suttee, The’ (1839) 8–9
- Whigs, the 7, 80, 109, 110–1
- Whig approach, the 3–5
- white horse 12
- Whitchall 128
- W. H. Smith 101
- Wilberforce, Samuel (Bishop of Oxford/Winchester) 101
- Wilde, Oscar: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The* (1895) 101
- Wilhelm I (King of Prussia, Emperor of Germany) 120
- Wilkinson, John 94
- William I (King of England) 27–8, 30
- William I (King of Scotland) 34
- William II (King of England) 30
- William III (King of England) 66, 80–1, 107
- William IV (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 108, 109–11
- Windsor Castle 41
- Winstanley, Gerrard 9, 78
- Winstanley* (1975) 9
- Witch of Edmonton, The* (c. 1621) (Rowley/Dekker/Ford) 89
- witchcraft 88–9
- With Clive in India: or the Beginnings of an Empire* (1884) (Henty) 128
- With Wolfe in Canada: The Winning of a Continent* (1887) (Henty) 128
- Wolsey, Thomas, Cardinal 58
- women, rights of 117, 131–2, 138, 145–5
-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the 117
- wood 13, 14, 18
- wool 21, 22, 43, 55–6, 96
- Woolf, Virginia 138
- working class, the 113, 115, 124–5
- World War One (1914–18) 130–2
- World War Two (1939–45) 140–3
- Wycliff, John 46
- York, Richard, Duke of 52, 53
- youth 147–8

注释

[1] 本索引页码为英文原书页码，原样保留。

读史就读不列颠——《大英帝国3000年》出版后记

世界级大都市伦敦的市中心有个特拉法加广场，中央是喷泉，四角是镶着金边的四个大狮子；正对着广场的是英国国家美术馆。第一次去伦敦的时候曾纳闷这广场为什么叫“特拉法加”——因为感觉上这不是个英文名。后来在别处看到这名字果然不是英文，而是来源于西班牙特拉法加角。那是一场海上的恶战，英国据此粉碎了拿破仑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就像多年前伊丽莎白女王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一样。这一战导致英国海军中将纳尔逊将军战死海上，但却拯救了大英帝国的命运——让人惊叹英国贵族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那种真正的荣誉感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这也正是英国史迷人的地方，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有英雄人物挺身而出，扭转事件的走向而达致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我们不能说那结果是最好的，但从后见之明看，却也是相当不坏的。最近的例子就是二战时的丘吉尔，力主与纳粹作殊死搏斗，让英国成为二战抵抗德军的中流砥柱，让大英帝国的旗帜始终飘扬在被德军飞机狂轰滥炸的伦敦废墟之上。远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13世纪的大宪章运动，硬生生地迫使国王签下条约，实为人类历史上限制王权的第一份纲领性宣言；更不用说光荣革命的辉煌成果，各方协商妥协，最后达成一个不流血的结果，是人类历史上处理政治争端的成功范例。

这也就是英国历史特别耐看的地方，每当关键时刻，总能达成一个不致让后人“扼腕叹息”或“猛拍大腿”的糟糕结果，且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彼时彼地的那种处理或争斗最终都经得起推敲。

但英国史并不是很容易就能梳理得很清楚的，尤其是诺曼征服以前的历史，中间还包括一段与北欧挪威人的缠斗和互相融合渗透的关系，以及更早的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征服不列颠的早期历史，还有本土的阿尔弗雷德大帝与传说中的亚瑟王的真实与传说的种种记载。实在来说，大英帝国是从都铎王朝开始奠定其雄厚国力的，先是亨利七世的各项强国政策起了作用，然后是亨利八世的对外张扬，最后在伊丽莎白女王这里达到了英国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本书作者是英国史资深教授，从远古时代开始为我们梳理英国史的基本线索，一直讲到二战结束后的英国社会；为我们展现了大英帝国从孕育、崛起，直至从顶峰衰落的完整历史，并为我们分析了这其中英国民族性格的形成和一代一代人的英国集体记忆。全书夹叙夹议，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闪露出作者的深刻洞见和作为英国史专家的独特视角。

不容否认，英国史不单是英国史，大英帝国是近代以来对世界历史施加最多影响的国家；英国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世界史，或者说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作者学识广博，且论述英国史的相关问题不拘泥于英国人的视角，而是有现代关切。这使我们英国人以外的读者读起来颇不会有那种

“他说他话，我辈旁观”的感觉，并出现那种“本国人讲本国史”的偏颇之处，这是本书特别难能可贵的地方。

读者诸君若能将我们先前策划出版的《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落》《大英帝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维京时代与英格兰》，再加上妙趣横生的《温莎王朝》，这几本书进行对比阅读，庶几可通透掌握大不列颠的全部历史概况了，而这本书也是我们奉献给英国史粉丝的一本极具思考挑战的最新读物。

本书付梓之际，英国由于新型变异新冠病毒的再次发作，又被推到了国际事务的最前台——无疑地，英国历史一如世界历史一样，又到了一个至暗的时刻……但愿全世界，这当然也包括英国，能尽快渡过这一难关。而我们作为出版人，又能参加一年一度的春季伦敦书展了……是为所愿，亦为后记。

本书策划人 申明

Table of Contents

[大英帝国3000年](#)

[版权信息](#)

[前言](#)

[第一章 英国史：前世与今生](#)

[第二章 公元1400年之前的历史](#)

[罗马人之前](#)

[罗马不列颠](#)

[公元400—800年](#)

[公元800—1066年](#)

[公元1066—1200年](#)

[13世纪与14世纪](#)

[第三章 帝国崛起：1400—1750年](#)

[对法战争](#)

[15世纪的分裂](#)

[宗教改革](#)

[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

[英国社会](#)

[詹姆斯六世及一世时期的英格兰](#)

[查理一世与内战](#)

[克伦威尔与空位时期](#)

[君主复辟时期，1660—1688年](#)

[光荣革命](#)

[帝国初长成](#)

[理念世界](#)

[第四章 帝国巅峰：1750—1900年](#)

[经济转型](#)

[新社会](#)

[1750—1815年的政治](#)

[改革与王室，1815—1837年](#)

[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与社会](#)

[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

[19世纪末期的问题](#)

[民族主义](#)

[第五章 帝国黄昏：1900年至当今](#)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

[两次大战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

[1945年以后的英国社会](#)

[帝国的终结](#)

[英国的政治与经济](#)

[消费与多元文化社会](#)

[第六章 结语](#)

[参考阅读书目](#)

[索引](#)

[读史就读不列颠——《大英帝国3000年》出版后记](#)